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50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中共党史资料 (第50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北京1929信箱 邮编: 10009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 (01)2581570 传真: (01)2581532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6.25印张 150千字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ISBN 7-80023-669-2/K · 622

定 价: 4.50元

目 录

文 献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刘少奇(1)

回 忆 录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历史回顾 何启君(12)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李 静(41)

人 物 介 绍

人民航空事业的开拓者
——常乾坤和王弼 韩明阳(69)

专 题 资 料

抗战初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 杨德修(87)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李东朗(105)
毛泽东与信访工作.....	
.....	中共中央办公厅 信访局(116)
.....	国务院办公厅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	宋金寿(132)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	
几个问题	郑 谦(158)

史 实 考 订

也谈东南局与中原局	
合并的时间	陈广相(182)

小 资 料

“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限及该称	
谓的正确使用	正 平(189)
《中共党史资料》(41—50 辑)目录索引.....	(192)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①

(1948年9月13日)

刘少奇

毛主席的报告和同志们讲的都很好,我都同意。

毛主席的报告,对今后战争前途的估计,大约五年^②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歼敌五百个旅。这种估计,是稳健的、谨慎的、实际的估计,不是冒险的估计,有过去两年做根据。过去这两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现在虽然在军队数目上,我们还比较少,但把各方面的优劣总算起来,特别是我军士气旺盛,是国民党万万比不上的;总算起来,现在已是大体平,并过渡到超过它。敌现已处于被动,我已取得主动了。另一方面,敌人也学乖了,仗更难打了,可能第三年更困难了。(毛主席:今后三年,不一定更顺利,但也并不一定更困难。)也许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如果济南、太原打了胜仗,打下来了,东北也获得大的胜利,那么,就在九、十、十一三个月中,可能就过了最困难的一关。

我们估计应该是最稳健的,但也要估计到最好的可能。从第三年起,这两三年内,可能有一种突然事变,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利的突然事变,如西安事变之类,而不是皖

①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 这里讲的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

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对我们不利的。自卫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有起义的，中期少些，后期可能多的。残敌五百个旅，不一定是那样平均的，每年一百个旅，可能后面更快些。我们的计划不摆在这上面，但可以力争，争取缩短痛苦，早日胜利。自然，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多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圆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毛主席：全国胜利恐怕还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国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实行减租减息。）

我们是为统一全中国而斗争，为党内统一，为国内统一。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现在是由我们统一全中国。过去十年内战中，我们没有这样提，而现在我们提出统一全中国。统一这个口号在党内党外都应强调，这个统一是以我们为领导的统一。这次战争初期，我们曾估计大、中、小三个前途，结果是按照我们的理想越打越大了。因此，我们提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毛主席：我们的口号是民主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国家就是那五百个旅，打掉它五百个旅，就可能统一。现在已搞掉了它两百个旅，所以，统一全中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以前这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以“一个县五十个干部”，“十万新兵”来计划了，这个计划是有条件保证胜利的。

自然，要达到胜利，还有些任务要完成，就是这次提出的那些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中间，也有些困难，要重视这些困难，当提出解决具体任务时，是要重视困难的，但总的方面，前途是光明的。自然，要防止骄傲，但也要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会比第一第二两年更困难。（毛

主席：第一年的困难是敌人进攻，第二年的困难是到大别山。）而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们是最有利的。（朱总司令：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过了这两关，那就解决了。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朱总司令：这就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现在想来，加上许谭兵团就解决了。）

现在困难虽多，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定可克服，定可胜利。列宁说，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演习，中国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内战，就是这次的演习，没有第一次的演习，就不能教育人民，也不能教育全党，有了第一次的演习。才会有经验。有了第一次演习，这次有些地方还重复了第一次的错误；不过，领导上有经验了，所以很快就可以克服。第一次合作和内战失败了，就是由于党犯了重大错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那种重大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了，即使犯了若干原则性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只要有了这一条，胜利就有保证了。至于具体困难，中国党历来是能够克服的，即使用霸蛮的办法，也总算解决了。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今年二月工委召集的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十一月扩大会议。但二十年学会了，二月会议未

如十一月扩大会议去发展“左”倾，而是极力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没有1933年文件，也就没有该大纲的第一行第一条。（毛主席：有大法，而无详细说明、分析和具体规定，下面就没有办法。）整党问题，讨论虽然较多，但偏重于思想，也没有具体办法。土地会议，也提出防止“左”倾，也反对了一些“左”倾错误，如杀人、扫地出门，也不赞成动工商业（但不够坚定）。当时会场上的精神状态是包含许多不健康因素的，但没有注意到，没有予以严厉的批评，也批评了，但批评得不够，惩办主义也批评了，但大家听不进去；有个别人提出些不正确的口号，如“贫雇农路线”、“干部路线”等等。做结论时也未加批评或批评得不够。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做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面，两面都要分析。譬如，这次写代表会的决定，本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把集中写了很多。这是在以后的工作方法上要学习的。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毛主席：这次会开得很好，把去年一年的工作也总结了。象土地会议那样的大会，会后应迅速做出决议。这形式上是个技术问题，而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在土地会议以前，也有些“左”，有些与我也有些关系。这是反右中所引起的。现在“左”已成过去，右也防止了。这一年来，既反对了右，又反对了“左”，路线已走上了健全的道路，胜利已有保证。

在新的情况下,新的问题上,是否又会发生“左”的或右的偏向呢?我看那是可能的。经济建设问题就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这次会上已经提出来讨论了,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总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讲过了,具体系统地讨论是在这次会上开始的,要在这个问题上不犯重大错误,就要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这与革命胜利也密切相关。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一)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毛主席: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20%,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毛主席:按企业讲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按政权性质讲,按政策的性质讲,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决定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生产者合作的工农民主专政,陈瑾昆^①等不是决定的,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成分问题,过去是有所考虑的,现在东北有八千多公里铁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手里,政权又是无产阶级

^①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法学家,1946年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领导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就提出来了。二七社论中已讲了这个问题，全国劳动大会决议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点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文化中有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列主义，但是国民教育方针、小学课本，不是共产主义的，演剧不是演打倒资本家，而演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国家经济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整个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机关生产有许多可以归入合作社经济的范畴，又有许多是国营企业的组成部分，基本上机关生产可以属于国营经济一类的。

(二)还有陈伯达同志讲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名词不通俗，也可以讲。

(三)合作社经济。现在要系统地建设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消费的、运销的，下层是农业变工合作，合作社还可以开办一些工厂和作坊。所以，合作社经济要分别看。象这样系统地搞起来的合作社发展起来，有很大的财产，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领导之下，甚至于有50%以上的资金是国家投资，其方向是照顾劳动人民的，这种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就多了。(毛主席：合作社既有退股自由，股票可以转让，就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它是两重性的，小生产者加入了合作社，就带有两重性了。)合作社发展起来，搞了工厂、煤矿、汽车等类的财产，那么，社员退股就不能影响到合作社了，这种合作社的财产就是社会主义的了。(毛主席：还有一种合作社，是在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组织起来的，如变工互助组，它的基础

是私有财产，其等价交换的原则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它已有社会主义的萌芽，集体农场的萌芽。)所以，这种合作社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但它已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萌芽。

(四)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其中有的是资本家的，有的是小生产者的。资本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者在国家帮助他以机器的条件下，可以走向合作，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的发展，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但小生产者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就已结合起来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自然，就全国来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还未打倒，今天主要的矛盾还是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被这第一个矛盾掩盖着。等到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取得上海和内地省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解决，民主革命的阶段已经结

束了,封建势力没有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官僚资本也没有了,人民与这些东西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没有了,这时候,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就解放区来说,今天对外还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其它因素除外,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列宁讲过,二月革命后的斗争性质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如犯重大错误,还是可以失败的。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毛主席: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夺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

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毛主席：这就是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去年下半年有些地方是失去这种领导权的，但尚可恢复，而且已经恢复了。如何恢复？就是向小生产者承认错误。）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如何去团结他们？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有了合作社，还有一个经营合作社和经营国营经济的路线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组织广泛的合作社网，建立合作社的系统，训练干部，搞好合作社，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去经营合作社。如果不按照新民主主义路线去经营合作社，而按照蒋、宋、孔、陈^①一样去经营，按照日本人的合作社一样去经营，按照延安妇女合作社一样去经营，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毛主席：这是带着共产党员番号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党内很有一批人是这样的。贸易公司总不愿起调剂市场的作用，不愿作解放区人民对内对外货物交流的桥梁，为人民服务，而是总想赚人民的钱。这就叫做带着共产党员番号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工作中，在这一点上完全清

① 蒋、宋、孔、陈，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

醒的干部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问题搞不清，没有清醒的头脑，就是打倒蒋介石，也还是空的，也不能胜利。

（毛主席：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但是发展到一定的時候，就要发生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象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毛主席：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只有在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具备的，国家政权、国家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巩固的工农联盟，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但另一方面也有困难：文化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国营经济数量很小，党员干部

不善于经营经济事业，理论水平不高，有些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钻进党内来，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如果糊涂盲目，犯重大错误，未能成功地争取小生产者，那就要失败。

因此，和平转变有极大可能性，但也有困难条件，仍须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取得胜利，如果盲目糊涂，犯重大错误，则仍有失败之可能。

今天提出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找出具体办法，那是很值得的。有些并且应该广泛宣传，解释清楚，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又糊涂起来。但也有些不宜过早宣传，以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利用，而不利于打倒蒋介石。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历史回顾

何 启 君

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重新建立青年团组织。任弼时首先倡议重建青年团,并且主持了中央关于重建青年团的讨论。我在任弼时领导下,参加了建国前后的建团工作。我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篇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历史回顾,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青年团的创建及其发展历程

任弼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是先有团,后有党。这个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呢?

早在1920年8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俞秀松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倡导下,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建立团组织,逐步辐射到其它省市。1920年,在欧洲勤工俭学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等同志,也在酝酿成立少年共产党,并于1921年底正式宣布成立。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章程》。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1925年1月26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在后来的红军中，苏区里都作出了突出成绩。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这时，得知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有一个指示，各国的共青团应改为人民战线组织，即广泛的青年组织，中共中央决定改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4月12日，第一次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西青救会组织，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作为各地青年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人有：冯文彬、胡乔木、李昌等。从此，共青团就从狭小的关门主义的状态中走出来，成为中国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团体。

共青团取消后，党中央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凯丰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敌人后方，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本地区的青年救国会，例如，山东解放区就有山东青年救国联合会。在这时期里，各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中，在武装斗争中，在参军、支前、生产、减租减息等各项活动中，青救会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白区，1935年秘密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就取消了。后来，在党的领导下于1936年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也是一个比较狭隘的革命青年组织，它于1938年

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经中共中央的决定也被解散了。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青救会在新形势下改变名称，叫民主青年联合会，只是活动不多。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反蒋的民主斗争中，出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组织，比如：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以及民联等等。

1946年，山东青年组织到延安汇报工作。这以后，任弼时同志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考虑应重新建立青年团。

党中央决定重新建立青年团，经过了从1946年到1948年近3年的历史过程。

二、任弼时倡议重建青年团

1946年5月间，山东解放区青年工作领导人奉华东局之命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任弼时指示中央青委组织这个汇报会。汇报是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的窑洞里进行的。山东来的有杜前、马仪、李云洁和李诚四位同志，他们在来延安前，做过调查研究，汇报的情况是有根据的。任弼时指定由我和黄若曦负责主持日常的汇报工作。那时，冯文彬同志不在延安，到南方巡视去了。

汇报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讲了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工作情况。山东解放区青年工作机构——青救会从上到下很健全，干部很多，只是没有日常工作，大家很苦闷。中央也不来个指示，几年都听不到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声音。

杜前等人讲述了沿途所见所闻，所调查的各解放区的情况。我们得知：“冀南地区（宋任穷、王任重等同志所领导）没有青年机构，没有青年团体，没有青年工作的干部；太行地区（薄一波同志领导），太岳地区（安子文同志

领导)都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所辖范围,在这个大范围里,全都没有青年工作机构、团体和青年工作干部,从上到下,从1942年以后一律取消了;晋察冀地区(聂荣臻同志领导)上面还保留着民主青年联合会的牌子和机构,也有几个干部,但是,下面没有青年团体,没有青年组织,没有日常的青年工作;晋绥解放区(贺龙同志领导)也是上面有一块青联的牌子,有几个干部,其它都是空的;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所在地)也是这种情况。

我先后到延安枣园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作了口头报告。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情况,面临着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决定,要么是干脆明令取消青年组织和机构,不要空招牌,免得大家没具体工作可做;要么重新发一个指示,有个新办法,把青年工作好好搞起来。

任弼时听了这些情况,引起了 he 深沉的思考。这年六月,他对我说:“你们可以讨论一下,研究一下,是否重建青年团?这件事,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时,冯文彬、李昌他们曾经提议过,要建立青年团,当时党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可是,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去研究一下。”

按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习惯,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和指示用与人商议的口吻说出来。任弼时同志更是有一种民主作风,他善于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善于进行深刻的思考,而不轻易采取硬性的指示。因此,任弼时这次所谈,实际上就是他的一种倡议,一种主张,一种决心,青年工作必须好好地搞,要建

立青年团。他的这个倡议，就成为后来实现青年团重建的明确决断。没有他这次的谈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建团。

我即时在中央青委的讨论会上传达了任弼时的意见。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就是否建立青年团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马仪同志陈述了要建立新的青年团的理由。他说：“自从老的共青团取消以后，青年工作的任务是广泛的发动青年，参加到革命行列里来。现在，绝大部分青年已经组织起来了，只是现有的青年组织都是一般、泛泛的群众组织。在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运动里，近年来的确出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这部分青年愿意更进一步靠近党。他们的政治觉悟更高些。青救会这个团体，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又暂时还不能参加党。我以为要有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有这样一个组织，则青年积极分子的作用可以得到更大、更好的发挥，可以把一般的青年群众更好地带动起来。

王治周和杜前等同志也都认为，有了青年团，会有如下的好处：可以推动先进青年，帮助落后青年，整个青年工作可以活跃起来；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就能保证党的各种活动在基层的青年群众中开展时，有个核心；青年积极分子的力量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使那些政治觉悟高一些，可是又暂时还不能入党（如年龄的限制）的青年，在这个组织中受到训练，以便为党补充新的血液。

大家还研究了在新解放区是不是也要建立青年团以及在有了青年团以后，还要不要青救会和青联的组织等问题。最后，大家得到共同认识：凡是有青救会的地方，要

是完全取消它，这不好。青救会的存在，同新建立的青年团并不抵触。凡是老区，已经没有青救会的，也就不必同时又是建立青年团，又是建立青救会。在建立了青年团以后，无论有青救会的地方，还是没有青救会的地方，青年工作的根本任务，都必须是进一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

经过几天讨论，大家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必须建立青年团。这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是打破当年青年工作沉闷局面的唯一道路。在讨论中，我们特别请了陕甘宁边区青联主任王治周来参加。这样，会议的参加者是：王治周、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黄若曦和我。我是讨论会的主持人和记录。隔三差五，我即将讨论会情况向任弼时汇报。整个讨论，实际上是在任弼时领导下进行的。

明确了必须建立青年团之后，大家又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建立怎样的青年团的问题。发言十分踊跃。

马仪说：“重新建立的青年团，它是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有自己较严格的纪律和组织生活。对团员要有经常的阶级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它具有相当的群众性，不太狭隘，不是第二党。对于一般党的任务，团组织要保证干好。团员是完成党的诸项任务的骨干力量。”

王治周认为：“要建立的这个青年团，应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章程。目前，还不能标榜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长远的革命目标，但也必须明确提出要为新民主主义奋斗到底，而在思想、政治上它是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走的。青年团的任务是：为党锻炼一批批的革命后备队。团员，要有一定的责任和一定的义务。团的组织是统一的整体，而不能是分散存在的小组。”

杜前说：“青年团是政治组织，是新民主主义的非党青年的组织，是介于党和青年群众之间的桥梁组织。团的名称，我提两个供讨论：一个是“毛泽东青年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响亮。再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组织，要有自己从上到下的垂直系统。在组织上要有自己相当的独立性。但要受党的领导。团员的年龄，可以定为从15岁到21岁，到23岁可以仍然保留团籍。团员要男女并收。团员在青年中所占比例可为25%到30%。团员要编小组，团要有纪律”。

同志们在讨论中都充分地发表了关于建团的意见。最后，由我将大家讨论的意见和建议草写成中央青委《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草稿)》。为未来的青年团的建立描绘了一个基本轮廓。

《建议草案(草稿)》综述了各解放区的青年工作状况之后，提出解放区的青年工作主要任务有三：(1)根据实际，根据经验，青年工作是党、政工作的辅助工作。其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的积极性诱发而组织起来，在各种党政所决定的工作中、运动中，事业中，起带头作用；(2)教育青年一代，为党培养后备军，为党训练各种事业的后备干部，为党不断补充健康的新血液；(3)青年生活的特殊福利，特殊爱好的各种工作与活动。

《建议草案(草稿)》阐述了建团的充分根据后提出，建立的青年团是一个政治性、教育性的基本组织，是青年群众的先进分子的核心组织。它以新民主主义相标榜，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主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又一时不可能入党的优秀青年，都可以加入。团在党的各项事业中，

领头去干，不是与党并列，而是介于党与一般群众之间的、党的后备青年组织。

团员条件，比入党条件要宽。团员与青年群众的比例，可为25—30%。不分性别，男女并收。团员年龄是15至22岁，可保留团籍到25岁。团，相当注意成分，以工农青年为基本力量。

团的组织系统：团支部和区、县、分区、大区（省、边区）、中央的各级团委员会。

团的名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建议草案（草稿）》还详细说明了青年团与党的关系、与政府有关系、与工会关系以及与妇女会关系等等。

我们的讨论先后用了一个多月。六月底、七月初，我把建团建议书送到枣园，面交任弼时，并口头报告了讨论情况。他给予嘉许，并说：“中央书记处要座谈座谈。”

三、任弼时主持中央书记处会 讨论建立青年团

1946年8月盛夏的一天，弼时从枣园打来电话通知我们：“你们关于成立青年团的书面建议已经看过了。很好！我想见见山东来的同志们。同时，中央书记处要开个会，座谈一下关于建设青年团的问题，请你们一齐来一下！”

8月26日，风和日丽，我们一行人，骑马驰向十多里外的枣园。在小会议厅里，一一同弼时同志握手问候。任弼时逐一问了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许多关于山东、烟台、鲁中、鲁南青年工作的情况。

接着，朱德总司令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来了，刚刚调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来了，毛主席政治秘书胡乔木也来了。书记座谈会开始，弼时主持会议，他先简短地说明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他说：现在，山东解放区有青救会员 150 万人，青年工作专职干部近 3000 人。全国各解放区有两种情况：现在还有青救组织，还有青救会员的解放区，是山东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和晋察冀边区。已经没有青救会组织、也没有青救会员的地区，是晋冀鲁豫边区和陕甘宁边区。今天要商量一下，在青年中所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否要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的问题。

然后，他要我汇报中央青委讨论的种种意见和情况，他又请杜前讲了山东情况，王治周讲陕甘宁情况，黄若曦讲了张家口情况。

朱德积极赞成建立青年团。他说：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一定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青年团的经常工作内容，主要是教育，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对青年的教育，除了学校以外，就是实际行动教育。例如，动员他们努力参加生产，参加土地改革等等，都是教育，不能单纯认为只有学校才搞教育。

朱德还认为以前取消青年团是对的。他说，陕甘宁边区前一阵取消青年团组织，是因为当时青年组织天天集中开会，遭到群众反对。陕甘宁边区的农村，人少，地广，居住分散，实际上天天那样搞也搞不起来。当时的取消是有理由的，是对的。当时取消的是教条主义。但实际上青年工作是发生了作用的。他话锋一转，说道：现在又出了

毛病，搞以党代政，以党代替青年组织。当然，边区工作的基本情况是好的。今天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方面分工，要分工合作嘛！

朱德认为组织青年团，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基础。现在需要青年组织，以后还要青年组织，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也少不了青年组织。成立青年团，团员不要图多，要办好。团的工作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到处一般模样。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就要用钱，这要靠青年自己去搞生产，去建立自己的家务。现在的青年党员，要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划到青年团中去，好把青年团领导起来。他还有针对性地说，大家所顾虑的是，会不会犯先锋主义和第二党的错误。现在是党组织统一领导，不同于以前了。建立了青年团，也不是任意由你自己搞，党组织不管，而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来搞。

康生也积极支持建立青年团。他认为要不要建立青年团，首先应从青年团的方向、方针、任务，方法上去考虑。过去由于青年工作方向不对，脱离群众，因而就说组织不好，就不要了。他说，原先取消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少共国际从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上考虑的。为了扩大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我们改建成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在历史上，我国青年团的方向、方针正确的时候，作用就大。现在的方针是要在生产、土地改革等斗争中去成立青年的核心组织，并且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发挥青年、青年团的作用。那样，建立青年团就很有必要了。

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和老青年工作者胡乔木也都发

表了中肯的建议，积极支持建立青年团。

会场的气氛始终是活跃和热烈的。对于重建青年团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课题，已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思考研究。这次中央会议上，诸种论述已经不少，最后，任弼时兴奋地作了总结发言。

弼时说：“大家一致意见，同意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建立青年团。这样，对于青年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帮助的。”

接着，弼时讲述了中国青年工作的历史及现状。他说，青年团曾犯过第二党的错误，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中国革命在历史上曾经是，先有青年团，后有共产党。他还说，共青团犯第二党的错误，另一个原因是抄袭了党的一套，而未去研究青年的一套，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这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今后，也还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我们用不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没有前途。如果做得好，青年团就大有可为。

弼时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他说：“按实质来说，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党在目前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青年团的名称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们不为名，所要求的在于本质。实质上，其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从团的任务讲，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他还谈到关于一般青年组织问题。他说，除了青年团以外，必须有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团要在这些广泛的青年团体中起先锋作用。

如何开始建立团组织？弼时说：“不要忙于先搭空架子，一开始，可以先在小范围里建立青年团，采取示范的办法，而后逐步推广，波浪式发展。”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陕甘宁边区选定延安模范县冯庄，丰足火柴厂和延安行知中学这几个单位进行了建团试点。后来，又选定了绥德县作为另一个建团基地。各解放区也随之先后选定了自己首先建团的据点。

弼时还说，建立青年团，基本上要从下而上地成立团组织，不能由上级党派出工作组去建团，同时，上面也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

后来，中央要求各地调集优秀的领导骨干来从事重建青年团的工作。荣高棠、韩天石、胡克实、李新等同志都先后从不同地区，响应党的召唤而到了建团第一线。宋一平、蒋南翔、李昌这些老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都重返青年团领导工作岗位。

这次会议结束前，弼时说：“关于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和意见，还要报告毛主席！”

中央第一次的小型会议，意见很一致，明确议定建立青年团。

四、任弼时主持第二次中央 会议讨论建团问题

同年9月11日，任弼时从枣园乘破旧的救护车，来到杨家岭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他向主席讲了关于成立青年团的事情，毛主席也当即作了表态：“好的！但要征求各解放区的意见，也要首先试建一下。”

过了两天，任弼时召集了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举行第二次讨论会。这次会议和前次的情况不相同。会议规模大，主张也不一致。

9月12日，弼时电话通知我，要我们次日早晨到枣园，中央书记处再举行一次讨论青年团问题的会议，要我们几个人到延河边集合，同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一道乘汽车（延安唯一的老式救护车），到枣园参加会议。并要我预备好在会上作口头汇报。

9月13日上午，中央第二次关于建团的会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厅举行。到会的有当时留在延安的中央和西北局工作的各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他们是：朱德、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政治局委员）、徐特立（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中央委员，刚从重庆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蔡畅大姐（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委员，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央委员、西北局副书记）、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饶漱石（原为华中局书记，到延安后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陈伯达（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胡乔木（中央政治局秘书兼毛主席政治秘书）、黄敬（原冀中区党委书记）、刘宁一、李颀伯（都是中央职工委的负责人）。再有就是我们7个青年工作者：王治周、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黄若曦、何启君。

会议已经把青委的建团建议书印发给大家了。弼时主持开会。他首先以肯定的语气就为什么要建立青年团，以及建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在各解放区，现在有两千万男女青年，其中青

年积极分子约有四百万左右,占全体青年的20%。青年积极分子里,约有10%的人入了党。对于这些青年积极分子,是将他们组织起来,对革命有利,还是让他们期待着好?看来,把这四百万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以进一步提高,再通过他们去推动广大青年,更加充分地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要好些。建立青年团是必要的。”

接着,弼时讲述了青年工作的历史状况。他说:“过去,青年工作中有缺点。但是,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后来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青年工作都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以前的毛病是先锋主义,曾经犯过第二党的毛病。现在情况不同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党有力量领导青年的组织。过去的错误,不至于再重复发生了,但在今后的工作方法上,必须要注意。”

他还说道:“从形式上说,现在要建立的青年团,比过去的青年团要广泛些!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加入。青年入了团以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随后,弼时要中央青委的同志作汇报。我就按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把情况、问题、意见向与会同志作了陈述。

我汇报之后,徐老首先发了言。他从青年具有特殊性,说明青年团这个特殊组织一定是需要的。他说:“党要领导青年。青年的教育,是多样性的,毛主席说过,教育分三个阶段,一是文化教育;二是政治教育;三是理论教育。青年要求学习,就要有领导。”

“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接着发言,赞成建立青年团。曾在历史上担任过青年团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陆定一

说，在城市和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搞青年团很需要，会起很大作用的，但在人口分散的农村里，搞青年团，作用不大。接着，会议就如何建立青年团，特别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蔡畅大姐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见解，她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女革命家。她说，建立青年团，在平原地区和城市可以先搞。在分散的农村，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青年妇女，她是青年，也是妇女，可能还是个年轻女党员，如果她还是个劳动模范，那么她就要参加这个会、那个会，老是开会她就应付不了。在实际工作中，要估计到这种情况。各个地区的工作如果千篇一律地去搞，是值得考虑的。

很显然，蔡畅的意见是不大赞成马上在农村建立青年团。

马明方说建团工作要先试建、取得经验，然后推广。他还认为，名称很重要，就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样更明确。

被任弼时特别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黄敬同志直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抗战前曾任党的北平市委书记，是抗战时期敌后平原游击战的开创者之一，担任过冀中敌后根据地的党委书记，对于青年运动是很有发言权的。他以敌后根据地的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的活动为依据，分析了青抗先和青救会的积极作用，然后说道，以敌后平原根据地来说，青年党员占党支部的比例相当大。还有相当数量的不够入党年龄的青年，青抗先已经给予解决了。这中

间,如要再增加上青年团这一层组织,问题就多了。我看,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要带有些军事性质会更有好处。

黄敬还说:青年工人、青年妇女,如何参加青年团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农村,女青年和男青年搞到一块儿过组织生活也是个问题。

徐老说:“农村的青年工作,不是不可以做,而是我们不会做。”

胡乔木说,在多数解放区的青年工作领导机关已不存在的形势下,如何着手建立青年团组织,要研究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只谈工作方针问题是不够的。

徐老又说:许多活动的垮台,是由于这些活动不是群众自己的。但只要有个核心,就可以坚持下来。

陆定一又一次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在大城市里,可以把民主青年团组织起来。另外,搞个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积极分子加入民主青年团,青年联合会是各界青年的广泛群众团体。在乡村里,不一定要搞青年团。

康生说,建立青年团这个积极分子组织是必要的。他指出了过去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第一,城市与农村问题。把人口稀少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当作上海来工作,就根本不对头了;第二,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那时,过分强调特殊性、独立性,在教育工作上也是脱离实际;第三,不但脱离解放区的建设,而且也脱离了青年群众。

康生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新形势,他说,新的情况是: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有了新的土地革命。在新的情况下,青年工作怎样做法?采用什么组织形式?青年积极分子要不要单独组织起来?他肯定说,要建

立这个组织。它不是青救会那样的组织，而是政治性的组织，如同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比那时的共青团要较为广泛些。这样的组织，大家一致认为在解放区城市可以搞。有点不同的意见是解放区的农村要不要搞？这就要从解放区的新任务方面来考虑。康生说，我们是有了政权的党，建立青年团，对于组织、教育广大青年，做好工作，以及青年团可以成为党的后备组织等方面都会有很大作用。他还就怎样建立青年团发表了长篇的意见。

朱总司令掩盖不住自己的激情，再次讲话，他说：“我们今天的会，是讨论如何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而不是讨论要不要建立青年团。搞青年团，这是一个教育后代的大问题。要做好培养后代的工作，没有青年组织，不建立青年团不成。”

会议主持人任弼时听了与会同志的踊跃发言后，以书记处日常工作负责人的身份，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大家的意见，都谈到应当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青年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建立青年团，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他还说，青委的建团建议草案发下去，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意见，要征求一下各地的意见，再作出最后决定。怎样去建立青年团？要研究的问题还不在于城市。过去，大部分是在城市里搞青年工作的经验。今天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要在青年团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上，去创造出新的一套来！他说，去农村建立青年团组织，一定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因此，先作典型试验是很必要的，以便取得经验。青年团的名称，可以提出两种：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青年团”，再请各地考虑。

弼时最后说：“会议之前，我去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建团。他认为要征求一下各地的意见，并且，先要试办。”

五、青年团试建成功

中央会议之后，我们根据中央领导的意图，抓紧进行试建青年团的工作。我们在杨家岭青委的窑洞里进行了有关试建青年团的讨论和具体计划的研究。参加讨论的人有马仪、李云洁、王治周、黄若曦和我。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在延安选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根据王治周的想法，选点是：冯庄（农村）、丰足火柴厂（工厂）和行知中学。还计划在陕北绥德县进行试建工作。我们认为，一定要把中央的愿望作为我们工作的准则，千万不要先搭架子，不要为建团而建团，一定要在青年的实际活动中培养积极分子，自下而上，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

我们的分工是：王治周、李云洁去绥德，马仪到冯庄，黄若曦负责工厂和学校两个试点。

在冯庄，马仪代表中央青委，并且由中共延安县委派一个青年干部一同进村。他们一开始没有打着中央要建团的旗号，只是开展青年活动，主要是找娃娃们来识字、唱歌，吹、拉、弹、唱，每天夜晚在一间大型窑洞里活动，像个青年俱乐部，全村大部分青年都欢欢喜喜地聚拢在这里。白天，他们去搞冬季生产，在生产中搞青年互助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引导青年们反对村里原有的一些歪风邪气，比如：调戏妇女、破坏生产、二流子习气等等。在这些活动中，马仪成了青年们的好朋友和老师，威信很高。通

过实际活动，注意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带动一般青年。启发引导优秀青年自己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先进青年的核心小组。经过一段时间，各种活动开展得很好，优秀青年的核心小组，越来越起作用，在这个小核心组织中，马仪逐渐启发他们是不是要起个名字？要有几条规矩吗？在七言八语的讨论中，就有了不同的主张。青年团、毛泽东青年团等名称和团的章程逐渐酝酿出来。所以，青年团这个组织不是从上而下官办的，而是青年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由于青年们生产互助活动好，风气好，村中党支部、老党员和家长们对青年团的组织都极为满意。

这样，冯庄青年团支部正式诞生了，成为我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

延安行知中学青年团的试建工作，最初是黄若曦负责的。他在1946年9月去学校传达了中央建团意图和初步设想。我在10月15日去学校与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卢勤良和党总支的同志具体研究了试建团的工作。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贾芝同志是当年延安行知中学的党总支委员和政治教员。他在当年的日记中对建团工作有详细的记叙：“上午，中央青委何启君来谈办青年团。……中央选取延安（行知）中学、一个农村、一个工厂单位试办青年团，任务确实重大，而且是件极新的工作，是个百年大计的问题。”为了建团工作，我先后去该校三四次。学校对试建团十分重视。卢勤良同志30年代做过共青团县委书记，又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有丰富的青年学生工作经验。他亲自领导了试建团的工作，

费了许多心血。该校试建团的成功，与他强有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党总支决定各班党支部指定两、三名优秀党员参加建团工作，他们分头找积极分子谈话酝酿，组织政治学习，参加学校的社会活动，并逐步建立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但，不说要建团，不打这个旗号。

不久，这些积极分子在党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以青年党员为中坚开始成立起一些进步组织。如“党章学习组”，“政治学习组”等，推动了学生中的政治学习与各项活动。

经过党员的启发、引导，青年组织的成员自觉认识到有成立青年团的必要性。当我在11月8日到延中听取了各班的详细汇报时，有的班已成立了团的组织，如十三班在11月5日成立了“泽东少奇青年团”，这是该校第一个团支部。

11月，各班团小组和团支部先后在实际活动中成立了。并在战备等项工作中发挥了模范作用，团的威信有很大提高，团组织也比较巩固。统一全校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于是筹备召开全校青年团成立大会，自下而上地订立了团章，经团员广泛讨论，民主决定团的名称，定为“毛泽东青年团”。

1946年12月9日，学校统一的团组织——延安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党总支产生了。我在大会上说：“同志们自己发起，自己动手搞起来的这个组织，是解放区的一个创举。西北局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注意，并且决定把青年团组织推广到全边区去，这是件大喜事。”团员们自

己写了誓词,表示了决心。表示必须起模范作用,当工作模范,当生活模范,当学习模范,要遵守团的纪律。大会选举王黎明任书记。

团总支创办了团刊《团内生活》油印小报,由苏红、王黎明,鲍克明,张珍编印,一年多出了13期。团刊在教育团员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团刊是当时解放区9种团刊中的一种。

延中的团员们响应学校的号召,在各方面发挥了模范作用。团员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当时的备战、军事训练、坚壁清野,行军转移中,团员们处处带头;在军训打靶、投弹比赛中,获奖的大多是团员。

延安行知中学的青年团组织,是全国第一个学校团的组织,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反动军队进攻延安。上级决定,延安行知中学一分为二,大部分师生组成西北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一小部分师生留校转移。延中青年团员有2/3到了医院,成为解放军的第一批团员。离校前学校团总支决定,学校与医院分别成立各自的团总支,苏红任医院团总支书记。西北第四野战医院团总支,是解放军的第一个团组织。副校长卢勤良任医院院长,他对团的工作十分重视,始终关心与支持医院团的工作。延中青年团的多数领导骨干到了医院,团的领导是很强的。医院的团组织与团员经受了严峻的战争考验,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该院团总支很重视团的发展,结合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结合新式整军的教育,发展团员。医院成立时,只有团员40名,到1949年4月,团员发展到

140名，加上被调走和入党后退团的团员，全院团员总数曾达到204名。1948年1月，团总支做出了关于公开吸收团员的规定，在院报《健康报》上公布了吸收团员的五项条件。这个规定在发展团员中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团组织很重视在各方面发挥团员的模范作用，严格组织纪律，因而在三年解放战争战火中，对广大青年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许多青年为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在工作中积极努力，奋发上进。不少青年人加入了团组织。

该院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很突出的。团员年龄很小，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十四五岁。他们十分热爱解放军伤员，在救护伤员时奋不顾身，个个不顾长途行军疲劳，不分昼夜地救护伤员，不时地送水送饭，打针上药，端屎端尿，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许多团员在艰苦条件下把自己的衣服、被褥、物品送给伤员使用，在情况紧急时扔掉自己的背包，翻山越岭，抢先背伤员，抬伤员。在沙漠地带行军艰难，水异常缺少，在炎热的夏天团员们忍着干渴，把节省下的水给伤员喝。当时的团员们诚心诚意地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因此，受到了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嘉奖，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表扬了该院的青年团员。1949年4月21日边区《群众日报》发表了苏红的文章《哪里有团员，事情就好办》，报导了该院团的工作。两年中，全院197名功臣中，就有团员82名，充分说明了解放军的第一批团员、第一个团组织在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很突出的。

黄若曦代表中央青委，到延安丰足火柴厂指导青年

团试建工作。我在1946年9、10月两次到工厂了解情况，并做了详细调查。

他们这里是在搞好生产与备战的实际活动中，在青年群众中自下而上，逐步酝酿，自觉自愿逐步建团的。通过党员与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加强联系，研究如何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问题。组织了青年积极分子11人，分为两组。他们在生产中起了带头作用。通过竞赛，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青年工人好逗好闹，既影响生产，又不利于团结。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后，就主动找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也使生产秩序正常起来，因而提高了生产。

不久，又有6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小组的活动，组织得到了发展。后来，大家说组织应有一个名义，经过讨论后，决定叫“青年先锋队”。由于怕马上公开会脱离群众，就先公开了组织，不公开队员名单，这样便于工作。在会上民主选出了大队长和副队长，成立一个队务委员会。

“青年先锋队”成立后，队员的积极性更高了，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他们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队员们还带动青年工人积极参加厂里组织的时事课和读报组的学习，了解了形势任务，提高了政治觉悟。

当时备战很紧张，要打仗，要搬家，有些人就害怕，队员们就深入到青年工人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证完成生产和搬家的任务。因为这是边区的唯一的火柴厂，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因此，必须边生产边搬家。当时把职工分成两队，一队先搬家，到新厂址后立即组织生产，另一队在老厂坚持生产。这样，有一段时间，两个人的活要

一个人完成。由于队员处处带头，团结群众，胜利完成了边生产、边搬家的任务。这样，队员在搬家中成了党支部的得力助手。

1947年春节前，“青年先锋队”开全体大会，经过大家讨论，改名为“毛泽东青年团”，通过了团章，公开了团支委名单，团员发展到近20人。

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很顺利。我把以上几个试点的情况报告了任弼时。我说：“建团成功了！”弼时非常高兴，命我通知西北局，听取汇报，讨论青年团的建团工作。

到11月，作为中央青委领导人的冯文彬从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回到了延安，他很高兴地听了关于建团的全面情况汇报，并且和我同去参加西北局的会议。西北局按照任弼时指示，召集了会议，由习仲勋主持。西北局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我被指定作汇报。我把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的试点情况一一如实报告。西北局领导同志们很满意，他们认为，冯庄的实例，说明在陕北人口分散的农村，可以建团，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委、各重要县、市都要选派干部去开展试建青年团的工作。

我在12月奉冯文彬的指示到了绥德，向绥德地委传达了中央建团的精神，然后，又向绥德县委作了同样的传达。在绥德新店区白家峪村，我见到了王治周、李云洁等同志，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了解，他们的工作活动也很好，他们也训练了各县的青年干部来从事青年团的创建活动。

同时期，任弼时草拟了一个指示电文，要求各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都要进行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冯文彬

又亲笔致函各地区的领导同志,要求选派干部进行建团工作。他自己还编印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青年工作通讯》,指导各地建团工作。

1947年春节之后,冯文彬、荣高棠等中央青委的大队人马(多是从国民党地区撤回延安的青年工作干部)一起到达了绥德。接着,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任弼时通知中央青委过黄河,东去晋察冀边区。我们一行在这年的四五月间到达平山,这之后,中央青委直接受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领导。

六、中央决定在全国各解放区扩建青年团

1947年的5月,我们中央青委到了河北平山的封城村,少奇和朱德当时住在这里。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指示我们停止前进,开始工作。不久以后,中央工委召开了全国的土地会议,各地领导干部都参加。冯文彬受少奇指派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讲话。他的讲话很长,讲到历史上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问题,讲了反对第二党的工作作风,以及对青年的特殊性和特殊要求的问题。

冯文彬说,根据在陕甘宁、晋绥、山东较大规模地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建议是正确的。怎样建团呢?少奇同志指示:应该确实地审查一下建团的干部。建团干部应该真正具备有经验、有威信、作风正派,特别是与群众有联系的条件。在团员中,特别是在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中,一定要提倡眼睛向下,而不是向上,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是人上人。他还说:“不能把加入青年团看成当官,做老爷。相反的,加入青年团以后,

更要比一般青年能牺牲自己，能刻苦地学习和工作，成为一般青年的表率，要更善于为人民、为广大青年服务。”

在此期间，中央青委举行了全国各解放区的青年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试建青年团的经验，决定扩大建团的工作规模。建团要公开进行，因为土地会议已决定在解放区党要公开。另外，会议指出，建团中间的自报公议作法和群众推选入团的作法都是需要纠正的尾巴主义的偏向。会议期间，少奇给全体代表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对建团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他首先肯定建团工作必须进一步展开。他认为，团的干部要高质量，第一批团员要高质量，他把共产党比作包公，而把青年团比作侠客，要求青年团敢于同损害群众利益的种种坏人坏事作斗争。

少奇说：“你们讨论的青年工作方针、办法我都赞成，你们要制定一个青年工作纲领，大家可根据它进行工作。”他还说：“青年团经过了四个时期，大革命前好；大革命后犯了先锋主义；抗战时期青年团取消了；现在又建团，是第四个时期。”“青年团除纲领外，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问题。年轻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团体，作风不好要害很多人，作风好有很大益处。青年工作的任务，最大的是教育、学习”。“团的一切工作，团员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为自己”。

在讲话中，少奇反复强调：“现在开始搞，宁缺勿滥。特别开始时，团员条件要高些，要纯洁。明年要办训练班，中央要办，各地也要办。”

根据少奇的指示，要训练团的干部。于是开始成立中

央团校，校长是冯文彬，教育长是荣高棠，地点在平山县的两河镇，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先后都来讲过话。

之后，中央青委从冯文彬起都是按少奇的意思组成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平山全县搞土地改革和整党，同时，以一部分精力指导各地建团工作。

1948年夏天，弼时和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在转战陕北取得决定性胜利，收复了延安以后，来到了平山，住在西柏坡。弼时指示中央青委加紧建团工作。按照当时战争的形势，胜利在望。弼时统筹全局，预见到全中国的解放就在眼前，在三大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刻，他要求中央青委替中央拟草一个答复中原局关于建团问题的请示。这时候由于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新的解放区一个又一个，迅速扩展。中原局要求中央指示如何在新区建立青年团。讨论起草这个电文的有：冯文彬、黄华、荣高棠、杨述、陈家康和我。先由我拟一个草稿，然后讨论，再根据冯文彬的结论意见写成正式电文，交弼时以中央名义发出，给各解放区，包括东北解放区。这个电文的影响很大。东北解放区就是在这个电文到达之后才正式大范围开展建立青年团的。

接着，弼时要求青委准备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准备北平解放。他要青委代中央草拟两个文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决定，二是青年团章程。前者由杨述写成，后者由我执笔。完成后交冯文彬、黄华审议修改。

我在草拟团章时，收集了各地自下而上送来的不同的团章草案，再根据延安中央讨论时的一些重要指示和

中央青委建团建议书,并参照党章写成的。这份团章后来经毛主席、少奇修改过,成为以后团的章程最早的蓝本。毛主席在解放后曾说过,团章要求太严,义务很多,权利很少,这是后话。

不久,三大战役先后胜利进行,北平解放。弼时命令中央青委迅速进入刚解放的北平。

我们中央青委机关在1949年2月到达北平城内,在东单附近临时住下。新的紧张工作开始了。本来,在1946年延安中央会议上,朱德曾说过军队里可以建团。到1948年在平山西柏坡,冯文彬命我去见邓小平征求他的意见。小平同志是来中央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在会议的后期,我到他的临时住处,一家民房去拜见他,当时他那里没有警卫,也没有传达,我径直走进去同他说明了中央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意见。问他对于解放军在战争中建立青年团是否合适。他明快地答复说:“现在解放军伤亡很大,战斗激烈,俘虏兵、解放战士成为解放军的主要兵源。这些俘虏兵本是农民,是被强迫送上战场的,他们头一天被俘,经过两三天教育之后,就成为解放军战士,调转枪口打老蒋,其数量很大,占解放军战士的百分之七八十。所以,在连队里很难建党,而连队里没有党支部,问题很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建团是非常需要的。”我记下他的话,向领导作了汇报。2月间,冯文彬让我为军队建团一事进城去找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傅钟和黄镇(以后的驻法、驻美大使)具体的研究了军队建团的方法、步骤等等,然后拟成电文指示发到全军。从此,军队先后普遍地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北平西郊香山。这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全国即将解放，毛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4月，春回大地，百花争艳，毛主席和朱德在这里先后接见了来自各解放区和蒋管区的学生代表、青年代表和青年团的代表。在香山的密林浓荫中，青年代表们见到了解放战争的统帅毛泽东和朱德，人们激动地欢呼跳跃，扭秧歌。毛主席非常高兴，他对北平、上海等地来的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感情尤其炽热，因为在解放战争中，整个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反独裁、要民主、反饥饿的斗争，震撼着蒋家王朝，毛主席曾赞许地称之为“第二战场”。

三个大会（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先后在刚解放的北平举行。全国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是在当时的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的礼堂召开的，任弼时此时因劳累成疾身患重病，但是，他对青年团的诞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抱病亲自写了讲话稿，到会向全体代表作政治报告，但是，讲话不多久，他就支持不住了，临时由荣高棠替他读完他的讲稿。这篇讲话，是他对青年团的一次告别辞和遗嘱。

1950年10月27日，这位伟大的老一代共青团的领导人、新一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世长辞了。终年仅46岁。

1957年5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决定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李 静

1953年6月,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敌在我夏季反击战的打击下,李承晚的战争叫嚣有所收敛,板门店的谈判也出现了转机。停战初步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工作接近完成,即将签署停战协定。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二〇〇师师长,部队正转移到金城以北的风堂、束沙洞、地岘里地区休整。

激战前夜

为了促进停战的实现,联司于6月15日19时发布了命令:“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这时我们收到六十七军转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的电报,从中了解到朝鲜战场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板门店谈判出现了曲折。本来我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二阶段,重点打的是南朝鲜军,先后对敌5个团以下阵地进行了65次进攻作战,给了敌第六师、第八师以歼灭性打击。在北汉江两侧攻占了敌3个团正面12公里、纵深3—6公里的防御阵地,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名。这次进攻作战,李承晚军的损失比哪次都大,按说应该“老实些”,可是它死不认输,正当停战

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于6月17日夜，以“就地释放”战俘为名，扣留了我方被俘人员27000余人。并继续叫嚣要“单独干”！要“北进”！破坏停战协定的实现。

李承晚集团这一公然破坏遣俘协议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纷纷谴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破坏联合国司令部权限”。甚至要求美国“换马”，撤掉这个傀儡。美国则竭力推卸责任，表明此事与己无关。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于6月19日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以充分压力……”为此，我方除致函“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提出抗议和谴责外，彭德怀司令员于6月22日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集团以严重打击，再消灭南朝鲜军15000人。”毛主席同意这一建议。志愿军首长乃决定，立即组织夏季战役第三阶段的进攻战役，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

6月底7月初我先后参加了第二十兵团和第六十七军的作战会议。战役决心、部署和作战方案以及各部队担负的任务逐步地明确起来。第二十兵团遵照志愿军首长的指示，以现有的4个军（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第五十四军）及加强的第二十一军，共5个军，分成中、西、东3个作战集团。在金城西南牙沈里至北汉江间22公里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以拉平金城以南战线，歼灭守敌首都师、六师、八师、三师共8个团另1个营为战役目标。首先歼灭梨实洞、北亭岭、梨船洞及金城川以北之敌，尔后

视情况继续向三天峰、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之线发展进攻。并准备打敌三至四个师的反扑，在打敌反扑中继续大量歼灭敌人。

从金城正面进攻的中集团，由第六十七军、第五十四军的一三五师、第六十八军的二〇二师(欠1个团)组成。在官堡里至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轿岩山、官堡里地区和鸡岩东山之敌，得手后迅速向南发展，歼灭开野里、东山里、商山里一带之敌。第二步协同东、西集团由北向南攻歼梨船洞之敌。

从金城西南向敌之左翼进攻的西集团，由第六十八军(欠二〇二师)、第五十四军的一三〇师组成。在外野洞至灰古介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歼灭522·1高地、552·8高地及其以北诸高地之敌，得手后继续攻歼梨实洞、北亭岭、月峰山、南屯里一线以北之敌。第二步协同中、东集团由西向东攻歼梨船洞之敌。

从金城东南向敌之右翼进攻的东集团，由第六十军、第二十一军(欠1个师，另配属第三十三师)及第六十八军之六〇五团组成。以第六十军在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松室里、龙虎洞西山守敌，尔后迅速向广大洞、细砚洞方向发展，控制金城川桥梁、渡口及金城至华川公路，打敌反扑和增援。第二步协同中、西集团由东向西攻歼梨船洞之敌。第二十一军接替北汉江以东防务，以巩固现有阵地为主，选择数个排以下目标进行反击，牵制当面之敌，不使其西援。

为确保第二十兵团右翼的安全，志司还指示第九兵团之二十四军攻歼金化以西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之敌，

控制上下九井,阻止金化之敌东援。

在二十兵团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上,大家对这次反击作战,群情振奋,信心十足。认为:这次进攻是以敌四个师的阵地为目标,而且是对敌经营两年来的坚固筑城阵地的突破,进攻纵深至少要占领敌一线师的全部阵地;我直接参加进攻作战行动的达5个军,参战火炮(82迫击炮以上)1100余门,坦克20辆。在敌我相持的阵地战时期,对敌实施这样规模的进攻是空前的,真是“我军越战越强了!”“仗是越打越大了!”同时,大家也深感责任重大,觉得这很可能是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仗,为实现毛主席“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的指示,必须圆满地实际这一仗的意图和决心,把这一仗打好,使敌人认输,迫使它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大家基于以上认识和理解,会上纷纷表示,打好最后一仗,坚决完成任务。但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个共同担心的问题,根据南朝鲜的情况和特点,在我强大攻势面前,会不会边打边撤。因而提出要加东、西集团从两个翼侧攻击的力量,提高其进攻速度,以便迅速截断金城至华川的公路,断敌退路,歼灭更多的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

兵团首长在作战会议结束时说:“战役很快就要打响,准备时间不多,要昼夜突击,全力以赴。”传达了兵团作战会议之后,我们师从师领导机关到各团队全面投入了战役准备工作。

紧接着,我又参加了中集团召开的作战会议。

中集团进攻地幅位于金城以南,正面宽约9公里,纵深约10公里,是南朝鲜军第六师和第八师的防守阵地。

金城至华川的公路贯通其间，将整个阵地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面为轿岩山，高约 600 余公尺，正面宽约四公里，纵深约三公里，由西（主峰）、中、东三个主要山峰组成，山势陡峭，是瞰制金城以南的主要制高点，是金城川以北地区的重要屏障，是东线伪二军团的主要阵地之一，易守难攻。西面为官岱里以南地区，由高约 350 公尺左右的若干山头组成，山间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沟深谷宽，大都有急造军路环绕，并有官岱里至开野里一条支线公路斜插其间，便于我穿插分割。北隔金城川，是以梨船洞为中心的山区，主峰高达 720 公尺，东西宽 6 公里，南北长 4 公里，山形象东西走向，呈半环形山脊，状如“椅子圈”，两侧地形开阔，各有公路通向纵深，是敌纵深的咽喉要地。

中集团的作战方案是，以第一九九师、第二〇〇师为一梯队。第一九九师配属六〇三团、火炮 77 门，首先攻歼轿岩山地区之敌，得手后迅速向南发展，直插商山里，与第二〇〇师会合；第二〇〇师配属火炮 37 门、坦克 1 个连（坦克 9 辆），首先攻歼官岱里西南高地之敌，尔后迅速插向敌纵深，攻歼驾鹤里、东山里、松浦地区之敌，得手后协同东西集团攻歼梨船洞之敌。以第二〇一师、第一三五师为集团的二梯队。

这个方案的根本点是，第一梯队两个师并肩突击，将主攻方向直接指向轿岩山。

在这次作战会议上，中集团首长反复强调了担负这次战役主要突击任务的是我们中集团，责任重大，而完成任务的关键又在于尽快夺取轿岩山。轿岩山是要害，攻克

了它,敌整个防御体系就会被打乱。金城战役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能否迅速攻占轿岩山。因此,中集团的主要突击方向应指向这里。对此,大家在讨论中,曾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着眼于迅速夺取轿岩山是完全对的,这是中集团的全局,必须全力以赴。但是,正是为了迅速攻占轿岩山,就不一定将主突方向直接指向轿岩山的正面。因为不论从地形还是从兵力来看,轿岩山是个硬钉子,它是要害,可不是弱点。将主要兵力从正面进攻轿岩山,敌人依托坚固工事,在优势炮火支援下,不是那么容易奏效的。如果当夜不能攻克它,形成僵持状态,那将对整个战役不利。因此,不如将主突方向指向官岱里。官岱里虽然不是敌整个阵地的要害,但从地形、敌情来看,它是个弱点。而且是与轿岩山这个“要害”相关联的“弱点”。将主突方向选在这里较之从正面突击轿岩山对我有利条件多些。突破后可沿金城至华川的公里插入敌纵深,进入轿岩山侧后,与从正面进攻轿岩山的部队配合,可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迅速攻占轿岩山的目的。

由于会议时间短,对主突方向的讨论没有展开,即结束了会议。

7月26日我们师召开了师党委会,研究和确定师的作战方案。大家认真分析了地形和敌情。认为:师突击正面之敌为南朝鲜军第六师十九团全部及七团的一个加强连,成两线配置。在师突破地段正面三公里、纵深两公里内,有敌第六师的两个营部、7个步兵连、两个火器连及两个搜索排,兵力密度相当大;敌除自身的火炮外,还能得到位于纵深的5个重炮营(90门)和一个坦克连(18辆)

的火力支援，火力相当强；敌在一线阵地上已构成了由坑道、盖沟、明暗火力点相结合与堑壕、交通壕相连贯的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体系，各支撑点形成了上中下三层能互相支持的火力网，并在前沿前设有4—5道铁丝网和200米纵深的布雷场，工事更是坚固的。敌第六师之所以把防御重点放在一线阵地，除准备依托这坚固的设防地带挫败我之进攻外，更主要的是，金城川及其支流割断了敌六师的防御阵地，一旦主抵抗线崩溃，只能撤到金城川南岸防守。因此，他把主抵抗线这个“外壳”经营得特别强。

大家认为，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迅速突破其主抵抗线，并不失时机地向敌纵深猛插分割，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內，协调一致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夏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经常处于运动中，爬山涉水，供应补给困难，是异常艰苦的。必须从上述情况出发，来安排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战时政治思想工作等。

会议确定，师成两个梯队，以五九八团为一梯队，担任突破任务，攻歼官岱里西南高地、鸡岩东高地及陵洞北高地守敌，为师主力向敌纵深穿插打开缺口；以六〇〇团（配属五九九团一个营）为二梯队，在598团突破敌前沿的同时，分两路沿公路向东山里方向和开野里方向猛插，迅速消灭该地区之敌，攻占商山里，截断轿岩山之敌的退路。尔后强渡金城川，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进攻；以五九九团（欠一个营）为师预备队，准备攻占东山里、开野里之线后加入战斗，协同东西集团会攻梨船洞之敌。

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全线紧张而又有秩序地进行

着。在全兵团的范围内担任进攻的 12 个步兵师的部署要调整；配属给部队的 7 个炮兵团另 14 个炮兵营、6 个工兵营、2 个坦克连以及渡河器材、通讯器材要从各地调往战场；尔后还调集了 10 个汽车团共 2000 辆汽车赶运 15000 吨作战物资，其中炮弹 70 万发，炸药 124 吨；还组织了 13 个步兵团、60 个工兵连修筑连接战场的急造军路。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尽管是在夜间并采取若干隐蔽保密措施进行的，但是，在敌各种侦察手段现代化的条件下，特别敌空中侦察受不到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是很难不被敌发现的。所以，当时敌人已察觉到我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逐步地采取了若干措施。主要是加强了其主要抵抗线的力量。首先是调整了部署，敌第六师将二梯队第二团全部调到主抵抗线，接替了轿岩山的大部阵地，将十九团和七团一部集中配置在官岱里地区，七团主力则据守岩川里、烽火山等地。这样就将第六师的两线配置变成三个团并列展开的一个线配置；还将位于史仑里担任美第八集团军预备队的第十一师前调，并将其第九团配属给第六师，接替了其左翼部分阵地。其次是加强了炮兵的火力，在通向华川的公路及其两侧的敌我前沿间，又增设了五道弹幕集中区和炮火拦阻地带，以上，这些兵力、火力的调整，就大大增强了敌人金城正面第一线兵力和火力的密度，使这个坚硬的外壳就更加坚硬了。增加了我突破其主抵抗线的困难。

根据敌情的变化，经与五九八团研究决定：一、为弥补我大口径火炮的不足，增强我突破地段的平均炮火密度，缩小了我之突破地段，把口子开小，将原来三公里突

破口改为一公里半。同时,加强各突击连的伴随火炮,充分发挥其运动方便、不受地形气候限制、命中率高、射速大的特点。这样,使我突破正面每公里的花炮(包括 82 迫击炮)增加到 100 门。这样我兵力火力就更集中了;二、将缩小的突破地段,选在我突击地段的左翼,靠近轿岩山。此处突击成功,可直接威胁轿岩山的翼侧,有利于迂回轿岩山的后背,也便于我沿通华川的公路向敌纵深穿插进攻;三为便于及时通知在敌前沿潜伏部队我炮火准备开始的时间,规定了用报话机“吹风”的密语信号。同时,潜伏部队尽量利用已构筑的工事、敌前沿死角,并采取疏开配置,以减少伤亡。

突破敌“主抵抗线”,割裂 敌第六师防御体系

师指挥所设在庆坡山东 558·7 高地的坑道内。这里原是一个营指挥所。坑道成马蹄形,作战室、炮兵室都配置在内。通讯枢纽部设在高地右侧的一个坑道里,因无观察设施,师参谋长只好组织工兵昼夜突击,在山顶的一块岩石旁构筑了一个小观察所。选在这里作为师指挥所,条件虽不够理想,但离前沿近,便于掌握部队、观察战场,不致因部队向纵深发展而频繁地转移指挥所。

7 月,朝鲜已进入雨季。几天来,天总是阴沉沉的,洒着毛毛细雨。敌机活动受到了限制,各部队利用这个天气,抓紧落实了尚未完成的一些战前准备工作,师指挥所也选择和修筑了几条较隐蔽的小路,暴露地段上挖了交通壕,并进行了伪装,整个指挥机构——指挥、通信、观察

和后方都连接起来了，活动方便多了，山顶岩石旁的坑道观察所挖进了三公尺，为观察战场提供了方便条件。

这时我们又接到了兵团的命令：为协调各突击师的行动，将战役总攻开始时间向后推两个小时。

7月13日晚，天阴得像锅底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毛毛细雨变成了阵阵急雨。21时整，我军在金城南敌突出部24公里的正面，在各个突击地段开始了炮火准备。但见火光冲天，远处炮声响如沉雷，近处炮声响如地裂，震撼着整个大地。我们站在山头岩石旁观察所注视着整个战场。此时，我方炮兵已向敌纵深延伸，敌后方阵地上的探照灯又开始左右摇晃着照射起来，在一线阵地上还不时地将照明弹射向天空，一个个落下去，又一个个升起来，把敌我前沿照得通亮。紧接着敌炮也开始还击了，一排排的炮弹落在敌我阵地之间，犹如一堵火墙。轿岩山方向隆隆的炸药爆炸声、短促猛烈的“达达”的自动步枪声和手榴弹啞啞的爆炸声交响在一起，兄弟部队已向敌阵地发起冲击，正在进行激烈的拚杀。看来，全线6个一线突击师，只有我们这个一线突击师尚未接到向敌突击的命令。突击越晚，对我们越不利。作为一个一线突击师指挥员怎么不悬心焦虑呢？

阵雨过去了，变成了毛毛细雨。

作战科长向我报告说：“五九八团李团长报告，我潜伏地域落了一些炮弹，部队有无伤亡还不清楚。并问：我们这里何时开始突击？”

我对他说，要沉住气，自己却有点沉不住气了。大家对“越晚越不利”的担心是很自然的。由于敌炮火在突破

地段前沿的加强,昨晚部队向潜伏地域进入时就有些伤亡,现在又遭到炮击。而这4个突击连、800余名勇士在突破时要打头阵,事关重大,怎能不叫人担心呢!我捺不住内心的焦虑,要参谋长请示中集团领导,我们这里何时开始突击。中集团介绍了进攻轿岩山的情况后说:“轿岩山局势未定,望能耐心等待,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从这个答复中完全体会到此刻中集团首长的心情。

我们回到了指挥所,刺眼的汽油灯光照射着坑道四壁,桌上马蹄表滴滴达达地响着,偶尔响起电话铃声,坑道内显得很静寂。而这时全师指战员就像赛跑运动员那样,在起跑线上拿好了架子,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盘马弯弓箭未发”的状态,时间过得慢极了。终于在23时10分中集团告知:“23时36分向官堡里方向转移火力!”这样,我师突击时间比全线总攻时间晚了两个半小时。

师指挥所立刻忙碌起来,进入紧张状态。

23时36分,我炮兵对官堡里西南、鸡岩东南诸高地敌各支撑点实施了15分钟的火力急袭后,在我炮兵火力向敌纵深转移的同时,五九八团各突击连分别向各支撑点发起冲击,经半个小时的激战,我攻占了敌大小9个连排支撑点的表面阵地。有的进入坑道作战,有的向敌纵深继续发展进攻。由于敌炮拦阻火力的加强和我炮兵夜间转移火力影响了命中率等原因,我突击部队在接敌运动和发起冲击时伤亡较大,但部队打得异常英勇顽强。副连长负伤仍率20人向727号(阵地编号)东无名高地冲击,激战40分钟全歼守敌;该连连长率29人攻上727号主峰后壮烈牺牲,此时全连仅剩14人,连排干部全部伤亡,司

号员张常林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因已无力进入坑道作战，乃组织 9 名轻伤员封锁敌四个坑道口，并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营二梯队赶来即迅速全歼守敌。各突击连都采取了迂回切断、包围分割、突击侧后、果敢进入坑道内作战等战术手段，经 4 个小时的激战，该团攻歼了官堡里西南、鸡岩东南诸高地的 15 个支撑点，毙伤俘敌 800 余，在敌主抵抗线上打开了缺口，为向敌纵深穿插作战创造了条件。

师二梯队六〇〇团以 4 个营的兵力，在五九八团攻占敌表面阵地的同时，于 14 日零时 5 分分两路插向敌纵深，一路沿芳坪里、鸡岩东山向东山里方向；一路沿官堡里、陵洞、驾鹤洞向开野里方向。他们沿公路两侧沟边运动，利用草丛和流水声作掩护，尽量保持部队行动的隐蔽。沿途几经激战，击退了敌步坦编队在公路上的堵截，绕过了敌火力点的阻拦，以勇猛动作击溃了遭遇之敌，始终不为小股敌人的袭扰所迷惑，保持了前进的方向。首先截断了敌主阵地与二线阵地的联系，制止了敌人向前机动增援，尔后又迅速插向金城川北岸。至 14 日 5 时，我攻占了龙岩里、东山里地区，割裂了敌第六师的整个防御阵地，进入轿岩山、烽火山的侧后，使之受到严重威胁，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敌本想在主抵抗线上即挫败我之进攻，没有料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们一再加强的“主抵抗线”即被突破。因此，不得不下达向金城川南岸（敌称之为“冰岛线”）撤退的命令，这时敌已溃不成军，纷纷南逃。

强夺东山里铁桥

本来可以徒涉的金城川，由于连日阴雨，河水暴涨，

江流湍急，奔腾咆哮，将两岸交通隔断。位于东山里东南的铁桥，横跨金城川两岸，是金城——华川公路伸向敌纵深的唯一通道。敌第六师为阻止我渡过金城川，以便在金城川南岸组织抵抗阵地，以其第七团的一个营占领铁桥两侧高地，一面控制这个咽喉要点，一面掩护部队撤退。并以师宪兵连在桥头设交通管制所维持交通秩序，师工兵营携带炸药，随时准备炸桥。

14日5时，担任攻夺铁桥的我六〇〇团第五连穿插到东山里。在距桥头1000公尺处被守备该桥位于601高地的敌人所阻。敌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轻重火力控制了公路及其两侧，五连连续两次冲击都未成功。连长范仁合机智果敢，带部队沿公路左侧佯攻敌人，牵制敌人火力，命令机枪班长潘昌义带机枪组乘机沿着公路右侧壕沟冲过去，设法占领桥头或以火力控制桥头。

当潘昌义的机枪组与三面之敌进行鏖战时，连长率领部队突破了601高地的拦截，赶到桥头与潘昌义的机枪组汇合了。他们立即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全歼了从轿岩山溃退下的一个营和从烽火山溃退下来的一个多连。还没有来得及将俘虏押走，我后续部队犹如滚滚向前的金城川水，源源不断地涌了过来，跨过金城川铁桥，插向敌人纵深。

抢占梨船洞，捣毁敌第六师师部

13日午夜至14日凌晨，师指挥所里的空气异常活跃。电话里频繁地传送着五九八团攻克一些敌支撑点及俘虏、缴获的消息，无线报话机中不断地报告着六〇〇团

穿插作战的情况。参谋们一面接电话一面在图上作标记。人们在谈论着：“打开了大门，干的干净利索！”战况的发展对我们极为有利。敌第6师的阵地防御体系已为我打乱，敌人处于溃退中，我已基本上控制金城川以北地区。当前的关键是迅速强渡金城川，不让敌人在金城川北岸即所谓“冰岛线”上设防。为此，必须加强在敌纵深穿插作战的后劲。我们立刻将五九九团投入战斗，适当调整了部署，由五九九团（原配属六〇〇团的一个营归建）、六〇〇团渡过金城川分别由西南、东南两个方向向敌纵深要点梨船洞发动进攻；五九八团继续肃清金城川以北地区的残敌，打扫战场，并担任师二梯队。

与此同时，西集团突破了敌首都师防线，占领了芳洞里、梨实洞、北亭岭、下榛岫之线以北地区，东集团突破了敌第三师的防线，占领了北汉江川西汝文里至732·3高地。整个战役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九九团渡金城川后，先头营在梨船洞西北山腿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一个连，并俘虏了该连连长和三名美炮兵观察员。俘虏供称：敌原计划凭江固守金城川南，由于我军来势猛、发展快，只好退守赤根山、黑云吐岭一线（敌称为“怀俄明”线）。团长张宗慧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定决心强占梨船洞，果断地命令前面的两个营并肩展开，以勇猛的动作向梨船洞发起了进攻。敌在梨船洞主峰凭险顽抗，我从两翼迂回敌侧后全歼其一个连，其余仓皇向南逃窜。至14日18时止梨船洞已被我全部控制。

敌第6师师部位于梨船洞东北的后洞里。我五九九团第7连直插敌第6师师部。他们跨过东山里铁桥，沿着

通华川的公路急速前进，进到斤洞东南的公路山垭隘口，右侧山壁陡峭，左侧金城川波浪翻滚，公路夹在中间，这就是号称天险的梨船洞东口。此时天已大亮，天空阴沉沉的，已由暴雨转为蒙蒙细雨。尖兵班被设置在隘口右侧的两挺重机枪封锁无法通过，由于地形限制而又无法绕过。连长范仁合面对这一情况，十分焦急，而直插第6师师部的任务是不容许拖延时间的。当他仔细观察机枪的密集火力射向公路及两侧的弹着点时，突然发现弹着点的分布并不均匀，山脚下还有一个小小的死角。他立刻打定主意，带领六〇炮班，利用这个死角，身体紧贴山脚石壁上一个一个地蹭了过去。班长胡先鹏将六〇炮架到山脚南的凹部，接连发射7发炮弹，敌两挺重机枪被毁，变成了哑吧！大家称赞说：“小六〇炮，办了一件大事！”七连又飞速地继续向前突进了。

后洞里位于梨船洞东北的一个山沟里，敌第六师师部就住在这里。沿山沟东向有一条简易公路连接金城至华川的干线公路。沟口附近的一块开阔地上敌人修筑了通讯飞机和直升飞机的降落场。当七连到达后洞里时已是14日黄昏，他们稍作准备，即利用夜暗和树丛隐蔽地接近了敌师部，勇猛冲向敌人。顿时激烈的枪炮声和高昂的冲杀声响成一片，敌人在突然袭击下，被打的懵头转向，措手不及，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有的在掩蔽部被掏了出来，向沟口逃窜的敌人也被挡了回来。经过半小时的围歼，彻底砸烂了敌第6师师部。山沟里到处都是横倒竖卧的敌尸体，公路上排列着装得满满军用物资的30余辆汽车，有的钥匙还插在方向盘上，有的马达还在轰鸣，显然，

这是准备逃跑。遍地撒满了敌人遗弃的枪弹和文件。七连一面打扫战场，清查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面集中审讯俘虏，据一位中校作战军官供称：第6师少将师长白仁焯已于下午3时带着他的几个心腹坐着三辆吉普车离开了师部，行前对他们说，中共军队不容易渡过金城川的，我到军团部开会，就是要商讨如何反击收复金城以南的失地问题。真遗憾，这个白仁焯，在南朝鲜军被称为能攻善守的将军，本来南朝鲜军总部曾下令将他“保送美国学习深造。”，接替他的金点坤准将也已到他的师部报到。后来，由于金城前线形势紧张，南朝鲜军总部又决定白仁焯“暂不交指挥权”，“仍由白仁焯少将指挥全师”。现在，居然让他逃掉了。

15日拂晓，敌为阻止我向南发展，夺占后洞里北山，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我七连进行反扑。敌人从荆棘丛生的山谷里向谷口的开阔地涌来，直奔直升机降落场。大概是想首先夺取那架因发生故障没有能起飞逃窜的通讯飞机。我七连连长范仁合在离我主力较远、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抓住敌在运动中的这个有利时机率领部队立刻占领了沟口的一个高地，居高临下，组织了7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3门六〇炮、两具火箭筒，同时向敌突然开火。顿时如暴风骤雨，开阔地上的敌人忽拉拉地倒了一片。此时，他们又以一个排的兵力立即向敌发起了冲击。一场鏖战，敌尸横山野，残敌仓惶南窜。我七连又以伤一亡一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01名的战果，七连圆满地完成了捣毁敌第六师师部的任务。战后结合其入朝作战以来的历次战绩，七连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荣获师“机智勇敢、

九战九捷”锦旗一面。连长范仁合荣立一等功。

15日雨停了。天空仍阴云密布，浓雾笼罩着大地。从观察所望去，在雾海里一个个山头时隐时现，尽管敌机还在气急败坏地狂轰乱炸，但因看不清目标，作用大为降低。各级指挥所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力量抢修道路，迅速推进炮兵阵地，赶忙前送粮弹物资及熟制食品。这对支援梨船洞地区的作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山洪继续凶猛地涌入金城川，几座新架的木桥被冲垮，东山里铁桥也被敌机集中力量以重磅炸弹高空定点轰炸的办法所炸毁。部队被江水阻隔，一些物资堆集在金城川北岸，大口径炮兵也只能在金城川北岸占领阵地。此时，进到梨船洞地区的部队除五九九团、六〇〇团外，还有一九九师的五九七团和一三五师的四〇四团，对这些部队的补给和支援增加了困难。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派工兵主任带领工兵部队赶赴金城川突击架设几座新桥。

攻占了梨船洞，已完成了战役第一步的任务，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继续向前发展进攻的问题。我接到了中集团邱蔚军长的电话，他说：“志愿军首长鉴于战役第一步发展顺利，为贯彻‘稳扎稳打’的方针，令二十兵团以主力巩固既得阵地，准备打敌反扑，以若干有力的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向南发展。兵团指示中集团的发展方向为赤根山、注坡里。我们决定以五九九团、六〇〇团担任向南发展任务，以四〇四团、五九七团控制在梨船洞地区，构筑防御阵地，准备打敌反扑。以上4个团统由你组织指挥。”并嘱咐说：“这是乘敌混乱之际相机向前发展，要稳妥，不能冒进。”

这时已是 15 日 21 时了。

紧张急促地作了一些准备，我带着由作战、侦察、通讯 3 位科长和几个参谋以及 1 个警卫排、电台等组成的简便指挥所出发了。行前作战科长在队前宣布：我们的代号叫“小分队”。

天仍是阴沉沉的，云层比较低。但雾消了，公路两侧的山头已清晰可见。公路上弹坑累累，里面积满着水，被毁的敌坦克、汽车在路边横躺竖卧着，被破坏的铁丝网东斜西歪的残留在地面，敌机仍连续不断地在公路上空投下一串串的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几批敌机在公路拐弯处和交叉点轮番轰炸，一位报话员和一位警卫战士因用身体掩护电台而光荣地献出了生命。我们这个“小分队”利用敌机照明和轰炸间隙，时而急步、时而卧倒，用了两个小时走完了 4 公里的路程，抵达金城川江边。我们见到组织架桥的工兵主任。他介绍情况说：“金城川是敌机和敌远程炮兵的重点封锁区，工兵作业经常遭到伤亡，运来的架桥器材有的也被炸毁。架桥很困难，进展很慢。”我对他说：“架桥确有种种困难，工兵部队也在流血流汗。但前面部队还在浴血奋战，迫切需要粮弹，更需要炮兵有力支援，我们还要向前推进，一定要千方百计，于明天上午完成架桥任务。”他坚定地回答：“如无意外情况，明天上午 10 时一定完成架桥任务。”我意识到他说的“意外”是指架起来的桥或架半截的桥被敌机炸毁，我是理解这一点的。我问他：“这里能不能徒涉？”他说：“金城川是条时令河，连续几天暴雨，山洪急泻而下，目前正是高峰时刻，水深流急，根本不可能徒涉。”

任务紧迫，不能有片刻拖延。我焦急地望着江水，敌炮正在向江中射击，一排排的水柱从水中涌起，工兵们正在激流中紧张而又吃力地拖着木筏把它系在对岸的木桩上。我忽然想起为什么不利用木筏过江呢！？经与大家商量，一个利用木筏渡江的方案形成了：不会游水的同志坐在木筏上，并指定4个人专门保护电台，会游水的同志推着木筏向对岸前进。真是众志成城，尽管水深流急，旋涡回转，但在大家奋力推动下，顺利地到达对岸，“小分队”稍作整理，即踏上梨船洞北山山麓。

出人意料的是，当我们到达梨船洞北山坡的林间小路时，突然敌炮一排燃烧弹落在“小分队”旁边，顿时树木燃烧起来，形成了一条火线，有的人身上也着了火。我立即大声喊道：快点散开，跑到没火的地方去，躺在地上打滚。于是大家抱着头在地上滚来滚去，不一会，扑灭了身上的火。有的衣服被烧了几个洞，有的帽子被烧了半边，有的鞋被烧坏了一只，我穿着的棉大衣也被烧了几个窟窿。两个警卫战士因怕电台被烧，将身体趴在电台上而不能在地面滚动而被烧伤。有的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到达梨船洞主峰与各团团长会面时，已是午夜了。确定两个团并列展开，各以一个营为前卫，向赤根山方向边侦察、边前进，主力展开成战斗队形交替向前推进。部队在前进中同前来堵缺口、抢要点的南朝鲜军第十一师的一个团遭遇，我先敌展开、先敌占领要点、先敌开火。经40分钟激战，歼敌400余名，乘胜攻占602·2高地及其以南无名高地和元宝山等要点。四〇四团也乘机攻

占了巨里室北山。此时，突然从无线电话里传来表示“停止”的密语命令，我意识到情况有变，即电告各团停止待命，就地构筑工事。把撤收不久的电台又架起来，并告通讯科长尽快恢复上下间有线通讯联络。事后得知：在我中集团向前推进的同时，西集团已前推阵地至新木洞、北亭岭公路北侧；东集团占领了黑云吐岭、白岩山以东高地之线。我军已完成全部进攻任务。14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飞抵前线，决定为堵住缺口迅速调整部署：将位于金化正面的美三师接替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九师防务东伸，以增强金城以南防线，并将其担任战役预备队第十一师和第七师调临战场。同时，由于金城川仍继续暴涨，我方炮兵前推和前线运输、通讯联络均发生困难。因此志愿军首长决定我军转入防御，准备抗击敌之反扑。

反复争夺寸土必争

7月16日，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陪同下飞抵前线，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声言要发动最大反攻，夺回金城以南失地。敌先后纠集南朝鲜军、第七、第九、第十一师和美三师以及南朝鲜军第三、第六、第八师残部全力向我反扑。

夏委反击作战中，我针对敌“有失必反”的特点，把打敌反扑作为进攻战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依托改造后的敌阵地，以逸待劳，以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人们称之为“一箭三雕”。一可大量歼灭敌人，二可巩固已得阵地，三在必要时还可向敌发展进攻。而这次金城战役的打敌反扑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敌我双方都想在停战后控制

更多的前沿要点，形成对己方阵地的有利态势。所以，这次打敌反扑实际上是前沿要点的争夺战。

敌人所谓的“大反攻”是16日开始的。反扑重点首先指向东集团之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敌集中6个团的兵团，在100余架次飞机和大量炮兵支援下向该阵地猛攻。激战终日，我歼敌3000余人，除个别高地失守外，其余阵地屹立未动。兵团鉴于该阵地过于突出，又处于背水作战，炮兵支援和运输补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经志司批准，乃令东集团除留少数部队控制要点外，其余部队于当夜撤至金川江以北。从18日起，敌之反扑重点乃转到中集团正面的602·2高地和巨里室北山一线阵地上，敌先后展开1个营至3个团的兵力，在480余架次飞机，100余辆次坦克和猛烈炮火掩护下，反扑达320次。有时是对正面的反扑，有时是对某一前沿要点的反扑。我打敌反扑的兵力，先后使用了6个团。除师建制的3个团外，还有一三五师的四〇四团、一九九师的五九七团和二〇一师的六〇三团。部队在仅有少量工事的新占阵地上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有602·2高地、元宝山、巨里室几个要点上同敌反复争夺多次，上午丢了，下午反击夺回；白天丢了，夜间反击夺回。有的山头被炸成的松散土石深达尺许，真是一场激烈鏖战。这时板门店正在重新核对双方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志司要求各部队每天早晚向上各报告一次我军前沿位置，有时在1/50000的地图上数着曲线来核对对我控制的阵地。有一次，值班参谋为核对一个班的触角阵地在电话上严厉地批评下面的同志，质问：“昨晚报告我前沿在左山腿的第四条曲线上，夜里没打仗，为什么现

在又说是第三条曲线了？”我听不到对方讲了些什么，只听值班参谋又高声说：“同志，要负责，事关大局，能马虎吗！”显然是对方出现了差错。的确，人们此刻的心情是随着“敌反扑被打退”、“某阵地被敌攻占”、“某阵地又被夺回来”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在停战签字之前，把有利的阵地控制在我们手里，留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阵地丢了，一旦停战签了字，想反击夺回来也不可能了。所以出现了连续的反复激烈争夺的局面。

19日、20日和23日是敌反扑的高潮。反扑的特点是：兵力由小到大、火力集中猛烈、轮番连续攻击、持续时间长，有时从拂晓直到夜晚反扑次数达20次以上。五九九团的阵地日记这样写着：

“19日，敌十一师第十三团全部对我602·2高地的连阵地轮番反扑，上午敌6次反扑均被击退。12时又集中兵力在坦克炮兵支援下猛攻，一度占领我主峰，被我五连阵地反冲击夺回。17时敌再以两个团的兵力连续集团冲击，致使主峰与第二峰失守。敌在连续反扑中伤亡惨重，第十三团被迫后撤，由第二十团接替。当晚我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对该阵地反击，由于步炮协同密切，部队动作勇猛，15分钟全部攻占该阵地，毙伤敌188人，俘敌2人，缴轻机枪5挺、卡宾枪37支、火箭筒3具、六〇炮2门及通讯器材一部。

“七连夺回602·2高地后，连夜抢修工事，调整部署，积极做好次日打敌反扑的准备。20日上午，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在12辆坦克配合下，连续向我7连反扑5次，均

被击退。下午3时许，敌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在12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连续集团冲击我阵地。工事全部被毁，战士们在炮弹坑中跳来跳去，以冲锋枪、手榴弹、刺刀来抗击敌人的集团冲锋。战斗最激烈的是扼守前沿突出部的七班，打退敌1个排至1个连的3次反扑之后，弹药所剩无几，有的枪支被泥土堵塞，一时不能使用，乃用从敌尸体傍捡来的枪和子弹，又打退了敌3次反扑。这时，全班只有两颗手榴弹、一颗手雷和两根爆破筒，班长赵忠良组织大家搬石头放在身傍，并规定，不到5个以上的敌人不准投手榴弹，不到1个排的敌人不准用爆破筒，主要用刺刀和石头消灭敌人。当敌又以一个连冲到阵地时，他们即用一块块石头砸向敌人，跃出弹坑同敌拚刺刀，并将一根爆破筒投向敌群，倾刻敌倒下了一片。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第7次反扑。这一天，仅在七班阵地上就歼敌80余人。”

7月23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飞抵前线视察，并勒令其部队夺回失地。南朝鲜“国新社”广播吹嘘说：“拿下三黄山（即我602·2高地）向总统献礼。”这一天战斗异常激烈。在师的防御正面上敌展开了3个团。仅在6022高地正面即展开了4个营。敌首先以8架飞机轮番轰炸，继之以12辆坦克和数十门重炮向我阵地猛烈轰击，阵地已成为一片焦土。由于我炮兵此时已全部推过金城川以南占领了阵地，即同敌展开了炮战，打敌步兵与压制敌炮兵同时进行。在步炮密切配合下，敌三次进攻都被粉碎。于10时敌又组成两个梯队轮番向我冲击，激战两个小时敌占领了我602·2高地，守备该阵地的第三连，除一排长

带三个战士仍坚守侧翼阵地外，余均壮烈牺牲。此时我乘敌立足未稳，立即召唤炮兵对占领我阵地之敌进行了火力急袭，第二连乘机向敌发起了冲击，一举又夺回了602·2高地。这一天，全师正面各点共打退敌之反扑达26次，毙伤敌1220人，在我阵地前敌弃尸200余具。

自7月19日夜我将炮兵阵地前推至金城川以南之后，炮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师指挥所经常接到来自炮兵群的报告，他们表示：“只要准确地提供目标(敌人)的具体位置，我们就能给它以歼灭性的打击！力争敌步兵不能同我步兵老大哥见面。”7天来，在敌320次大小反扑中，有140次是被我炮火击退的。最典型的一次是20日：敌以3个营在后洞里东北侧展开向我巨里室北山阵地进攻，当敌进行炮火准备时，我以野炮一个营对敌炮兵进行压制射击，敌炮阵地起火，引起弹车爆炸，浓烟迷漫诸山头。同时，我以3个炮营的火力对向我运动的敌人实施了猛烈的急袭，以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实施了一次“齐放”，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4辆坦克被击毁，弃尸300余具，余皆溃散。我严守阵地的步兵未发一枪，即粉碎了敌人的这次进攻。步兵在阵地上高呼：“向炮兵老大哥学习！”“向炮兵老大哥致敬！”几天来，师指挥所不断地接到各步兵团的电话，称赞炮兵说：“炮兵真打神了！指到哪、打到哪，我们要求炮兵支援的电话刚传过去，炮弹就落到了敌人头上，请师党委为他们立功！”

就这样，敌人的反扑，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后来，敌向我阵地的反扑更是有气无力。我军已取得这次战役的完全胜利。

这次战役，我一举突破了敌 4 个师的坚固阵地，仅 21 个小时突入敌纵深 9·5 公里，给敌以严重打击，共毙伤俘敌 78000 余人，缴获坦克 45 辆，汽车 279 辆，飞机 1 架，各种炮 423 门，各种枪 7400 余支，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特别是密切配合了谈判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停战协定的实现。

中央、军委于 7 月 25 日发出“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中指出：“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入夏以来向敌展开有重点的战役性质的反击作战，迄今已获得重大胜利。……尤其是 7 月 13 日开始的金城战役，在东西 30 余公里的正面向敌 4 个多师所据守的阵地进行突破，届至 18 日止，五天歼伤俘敌 28000 人，击溃敌四个师，共攻占敌纵深 10 公里约 170 平方公里的阵地，缴获了许多装备和物资，给了李伪军以严重打击，有力的配合了停战谈判，使我在突破敌坚固设防地带的作战中获得极宝贵的经验，特电祝贺。希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签字并生效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执行停战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的破坏和挑衅。”

7 月 26 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27 日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都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并发布了停战命令：“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 12 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命令还要求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

破坏行动。

签字停战协定的消息和停战命令传达到部队后，整个部队沸腾了。

轿岩山上话短长

7月27日22时停战协定生效了。29日我师将阵地交给五十四军一三五师，转移到平康以北洗浦里地区。师部住青石洞。补兵、调整组织、配备干部、修建住地、整修道路、自下而上地进行战后总结，正当我们紧张地进行这些战后各项工作时，六十七军电话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我于8月7日下午赶到军部住地隐洞，才知道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来到军部，准备明天在轿岩山现地听取一线突击师师长的汇报。当晚参加了军部为欢迎邓华代司令员举行的晚会，这也是停战后的第一次晚会。

晚会是在停战后新盖起来的一座“礼堂”（一所很大的房子）进行的。晚会上，邓华司令员和大家一起跳起舞来。有扭秧歌的，有跳朝鲜舞的，尽情欢笑。在紧张繁忙的战争生活中被抑制在心头的情感，这时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了。

第二天，我们乘吉普车随邓华代司令员上轿岩山。在通向轿岩山的公路上，战后的和平景象已展现在面前。公路上的炸弹坑被填平了，沿途的几座木桥修复了，原来我前沿的防坦克壕平整了，志愿军战士们在金城旧址正帮助朝鲜群众盖房子。停战才10天，重建家园的工作就开始了。我们从敌人修的一条简易坦克路上乘车到轿岩山顶。部队正在整理缴获的装备和物资，排列很整齐的炮弹

堆放在弹药库旁，一堆堆的废弃物资正在装车后运。从山顶极目四望，层层重叠山峦，尽收眼底。随同邓华代司令员上轿岩山的有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六十七军军长邱蔚、参谋长刘苏，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一九九师师长罗肖文，二〇一师师长齐威，还有我，以及志司、兵团、军、师的一些机关干部。大家站在邓华代司令员的周围，师长们指着现地分别汇报有关师的决心、部署、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突破的、什么时间向敌纵深穿插的、遇到了什么情况以及缴获、歼敌数、我伤亡等情况。邓华代司令员一面听、一面看，有时还询问一些细节。当大家汇报完了之后，他沉默了好久，好像在思索什么。他转过身来，指着西南方向说：“你们看，那里山低谷宽，道路纵横，部队机动比较方便，不但有金城至金化和金城至下榛岘两条大公路，还有两条横向公路通向梨船洞方向。向纵深穿插没有公路是不行的；那里是敌金城防线的西翼侧，还是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第二军团的接合部，这些都是选择突击方向的重要条件；从这里突破，可以直插金城川以南，不需要强渡金城川这个天然障碍，这在地理条件上对我也是有利的。”他转过身来，又指着东南方向说：“这里是敌金城防线的东翼侧，距金城至华川这个干线公路最近，可以迅速攻占公路要点细岘洞，最便于截断敌人退路的地方。当然这里横断山脊较多，给穿插作战会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只要严密组织，措施得当，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把东集团、西集团这两个方面的兵力、火力再加强些，从敌人整个阵地的东、西两个翼侧实施更有力的突击，就容易截断敌人的退路，可能歼灭敌人更多些，取得的胜利可能更

大些。”大家都在认真地听着，默默地思索着。他停了会，面向金城方向又对大家说：“中集团打的相当艰苦。特别一九九师从正面攻轿岩山，打得英勇顽强。可是如果当时把主要突击方向不放在轿岩山正面，而是放在官岱里，把对轿岩山的正面进攻作为辅助方向，二〇〇师对官岱里的突击就可与全线各师同时发起，不会推迟两个半小时。这样，对官岱里的突破也会早得多，会更快地插向轿岩山的侧后，打乱敌第六师的防御部署，会更多地歼灭一些敌人。”他看到一些参谋人员正在笔记他的谈话，他笑了笑又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你们不应当作为定论。只能供你们参考。我的意思是，这个战役在选择主突方向上有些‘美中不足’。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事后总结经验教训也是必要的。”接着他察看了残存在山头的敌人工事，在离开轿岩山之前，他边走边说：“这是一个大胜仗，一举突破敌四个师坚固设防的阵地，大量歼灭了敌人，拉平了金城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和谈，促进了停战协定的签字。特别是如中央、军委的贺电中所指出的，使我在突破敌坚固设防地带中获得极宝贵的经验。我们一定要认真进行战后总结。我们不仅从打得不好的仗中吸取教训，更要从胜仗中找出不足之处。请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打了胜仗，而看不到缺点，不愿从胜仗中找教训。

“从胜仗中找不足”，大家默默地思索着。

人民航空事业的开拓者

——常乾坤和王弼

韩 明 阳

常乾坤和王弼,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选派去苏联学习航空的共产党员,是广东航校、苏联航校和苏联最高学府培养出来的老一辈航空专家。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延安机械工程学院》、《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建国后,他们同时被任命为人民空军第一任副司令员和第一任副政治委员。共同筹建了空军第一批高等院校——空军指挥学院、空军工程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优秀航空人才。他们为人民的航空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是建设人民空军的元勋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

一、在苏联航校学习

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73年5月20日卒于北京,终年69岁。少年在家乡读书,1921年考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办的讲武堂。1924年到广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校不久,即于这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在航校,行政上任学员队的区队长,党内任中共的小组长,是当时的骨干。据常乾坤的夫人李芳女士介绍,常乾坤在黄埔军校是代替别人进行入广东航校考试的,以极优的成绩被录取,后因被代替的那个人不去了,周恩来便找常乾坤谈

话,问常:“你愿不愿意学航空啊?”常说:“愿意学,但我没有钱怎么学呀!”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帮助你。”就这样常乾坤进入了广东航校。1926年5月,受广东革命政府派遣,送往原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从这时起,他和王弼一个在天上飞行,一个在地上维护、检修飞机,成了亲如手足的兄弟,谁也离不开谁。常乾坤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飞行团的领航主任,少校军衔。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这期间,他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地拼搏了六个酷暑寒冬,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王弼,1899年8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1977年8月31卒于北京,终年76岁。他于1923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1925年10月到1927年9月,以整整两年时间,攻读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东西方各国革命史以及俄语等课程。1927年9月,奉中共之命到列宁格勒空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1929年9月毕业,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机械师、工程师等职,军衔少校。1933年9月,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与制造工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五年的大学学业。

1937年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常乾坤、王弼的思绪万千。他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既然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的学业基本完成,就应该回国参加抗战。为此,他们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任的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你们要继续抓紧学习,安心等待。”

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向任弼时同志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

国,只能边学习,边等待,倘若时机许可,请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准备着。”这时常乾坤、王弼更加发奋学习,尽量把学的课程提前完成,争取时间多学一点。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动身回国。1938年3月,任弼时正式通知他们:“共产国际已同意你们回国,何时动身尚未确定,你们准备吧。”

这年的8月,上级最后确定了他们回国的日期。而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的毕业典礼是10月初举行。只差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领不到毕业文凭,实在可惜。1938年9月的一天,他们踏上东行的列车,开车的汽笛已在莫斯科车站拉响,王弼还呆呆地站在站台上思念文凭。时间来不及犹豫了,常乾坤把他推进了车厢。列车滚滚向东方开去。

二、在新疆航空训练班任教

经过了数天的长途旅行,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方知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陈云已返回延安,由邓发接替他的工作。这时,吕黎平、严振刚等43名红军干部已进入盛世才办的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常乾坤、王弼离开苏联时,并没有想到回国后还有航空工作可做,一心只想奔赴抗日战场与敌人拼杀。可是,到迪化后,中共中央要他们暂留此地,拟派他们到盛世才航空队当教官。邓发同志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一旦交涉成功,立即到新疆航空队工作。

当时,全国抗战形势正处于困难时期。大片国土被日本侵占,武汉、广州、先后陷落,而盛世才又迟迟不同意常乾坤、王弼到航空队工作。他们不能尽快用航空技术、知识报效国家,心情十分焦急和不安,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程度。他们十分担心这样待下去,时间久了,已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就全部荒废了,不仅没有为人民尽力,反而丢掉了本事。他们暗暗下定决心,还是积极返回延安,然后要求上前线,拿起刀枪同敌人拼杀。可是意见反映上去,

得到的答复是“再等”。他们又提出,既然到不了抗日前线,是否可以再返回苏联,继续学习航空?以便为革命多学点本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再等”。使他们陷入欲进无门,欲退无路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克制住自己的烦躁心情,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环境,坚持学习与研究航空理论,为将来建立人民空军作必要的准备,在条件允许和可能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特长,力争为人民的航空事业做些可能做的工作,不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

1938年冬,盛世才准备利用空闲的P—5型初级教练机,再训练第4期飞行员。邓发得知这个打算后,拟将1938年8月从延安抵迪化的郑德、吴元任、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同志组织起来,送进新疆航空队第4期飞行训练班学习飞行。

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随着全国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也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他得知中共的飞行学员已经到达迪化,突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停办第4期飞行训练班。邓发再三交涉,他都以种种借口搪塞,坚决不同意再办飞行训练班了。也坚决不同意让常乾坤、王弼同志进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邓发见进第4期飞行训练班绝望了,又向盛世才提出让延安来的人作为第3期飞行训练班的插班生学习飞行。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借口拒绝。

在一切努力都达不到目的时,邓发遂于1939年春在中共驻新疆代表处的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将当时在迪化准备学习航空的同志和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经过迪化的同志组织起来,由大革命时期在广东航校第5期毕业的飞行员、共产党员郑德担任班长(主任),由常乾坤、王弼担任航空理论教员,采取一边学习航空理论一边等待机会争取进新疆航空队。这个航空训练班学员有:郑德、吴元任、林征、任平、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以及从苏联回国的刘风、王璉、李凡、王天、王春、王占山(刘风、王璉在苏联学过飞行)。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42位红军干部,也经常利用星期天和节

假日在办事处听常乾坤、王弼进行辅导，解答疑难问题。

常乾坤、王弼对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十分热心，为了讲好课，他们不停地看书和翻译资料，根据学员的水平认真备课，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们的讲解，能够使不同对象都听得明白，理解深刻，使得这批人在航空理论的学习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还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不少理论书籍。常乾坤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空中领航学》等。王弼编译了《航空发动机学》、《航空仪表学》等。这些理论书籍在建国之后的空军航校中使用多年，有些还被航空高等院校使用。

在新疆航空队学飞行的红军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航空理论水平较差，给掌握难度较大的飞行技术带来困难。常乾坤、王弼就担负起航空理论辅导的任务。根据飞行员飞行的进度情况，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有的还写出提纲刻出蜡板，印好教材，等到星期天，学员来了以后进行辅导、讲解和答疑。当时飞行员感到最难理解的是空气动力学中的“柏努利定律”。这种既抽象又难懂的学问，经过常乾坤的讲解辅导之后，大家很快就明白了速度大压力小，速度小压力大的道理。最难飞得好的课目是起落航线，它是由四个 90° 转弯构成的。当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话，不能进行陆空通话联络，地面只有一块“T”字布做为标志，常乾坤教他们如何注意四个转弯与“T”字布的关系位置、动作顺序等。王弼也着眼于大西北气候的特点给大家讲解发动机的合理使用数据。他们的辛勤劳动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感到自己培养的专家讲课听起来分外亲切，收获特别大。有人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呀！”

盛世才航校培养飞行员的成功率：第一期 10 人中培养成功 8 人，淘汰 2 人。淘汰率占 20%；第二期 16 人，全是中学文化程度，飞出来 12 人，淘汰 4 人，淘汰率占 25%；第三期是中共从延安选派的 25 名共产党员，平均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飞出来 24 人，仅淘汰 1 人，淘汰率只占 4%，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成绩的获得，除其他因素外，和常乾坤、王弼对他们的航理辅导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是分不开的。

1940年，抗战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进一步变冷。航空训练班的人不可能再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了，当年秋天，奉中共中央电令返回延安。由迪化到兰州是乘苏联的汽车走的。由兰州到西安是坐客车走的，第一批有郑德、李凡、王春等，他们乘坐的客车，在甘肃的平凉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郑德、李凡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王春叛变。第二批有常乾坤、王弼、刘风、王琏等，安全的到达了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休息数日，于11月，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三、在延安军委总参谋部

1940年11月下旬，常乾坤、王弼联名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人民空军的计划。说明按当时客观条件，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训练的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很强，必须早做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因而他们建议先暂时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50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以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立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赞赏。指出：“发展航空事业的意见是好的，要有决心和耐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航空事业的重视，给了常乾坤、王弼同志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194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陕北安塞成立了机械工程学院（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同年3月6日，王弼同志被任命为校长，常乾坤同志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在这里，他们不辞辛苦，克服困难。和大家一起选择校址，勘察机场，上山砍柴，下地开荒，千方百计地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为了培养中共自己的航空骨干，他们详细地制定教学计划，认真讨论备课方案，编写各种教材，制作多种飞机模型，为人民航空事业能够起步，他们兢兢业业，竭尽全力。

该年3月间,学员到了六七十名,他们当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4月1日正式开始上课,内容有数学、物理学知识和俄文。在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之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王弼、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校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俄文、航空理论,整整工作了7个月。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延安机械工程学院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大队,下辖两个俄文队,一个工程队,常乾坤被任命为一大队大队长,主管俄文教育工作。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王弼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工程系主任兼二大队大队长,还兼俄文学校秘书长。第三大队为炮兵队。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航空研究小组,负责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调王弼、常乾坤为18集团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任命王弼、常乾坤为军委航空组正、副组长,刘风、王琏后来也参加航空小组工作,为小组的成员。当时,总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部长是伍修权。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叶剑英就认识常乾坤。在军事学院,王弼和常乾坤都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次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进一步同叶剑英、伍修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叶剑英、伍修权对常、王非常了解,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十分关照。常乾坤、王弼对叶、伍也格外尊敬,直到多年之后,到东北去创建《东北老航校》,叶剑英还亲自给他们写鉴定送行。到东北之后,又在伍修权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9年进北京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仍很融洽,经常来往。

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方面的事情,给中央首长当口语翻译迎送往来,接待外国人士和专家等等,更多的是俄文笔译方面的工作。他们经常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很有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鉴定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

加一定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最早赴东北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一般都正式任命一个军衔。常乾坤、王弼的军衔都是总参谋部少将高参。

军委航空组从1944年5月成立到1945年10月撤消，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1944年7月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二是在1945年二三月间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负责接待、看管及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王弼还兼任延安飞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原有机场的跑道已不敷应用，在当时没有水泥，没有筑路机械，连压道滚子都没有的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修成了一条1600米长，30米宽的砂石三合土跑道。保障了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苏联红军从沈阳飞延安联络的飞机、蔡云翔驾驶汪伪空军“建国号”起义飞延安的飞机、刘善本驾驶国民党空军8大队B-24重轰炸机起义飞延安的飞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乘坐的三人小组的飞机，都能在延安机场顺利起降，这是延安机场扩建成功的历史见证。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45年九十月间，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航空器材。随后军委航空组便全部去东北执行筹建航空学校的任务。

四、创建东北航空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乾坤、王弼率领一批干部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赴东北执行创建航空学校的历史使命。离开延安前夕，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他们，对到东北之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创建航空学校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准备，在“航空队”和航空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校长，王弼被任命为首任政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天劈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航空学校。从此，他们把全部的智慧，满腔

的热情和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都投入到《东北老航校》的建设中去。

《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步建设的。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环境动荡，条件恶劣，生活异常的艰苦。飞机破烂不堪，跑道弹坑累累，营房、机库残垣断壁，机场设施残缺不全，航空骨干极端缺乏，物资供应异常困难，敌人经常骚扰破坏，航校被迫三年进行五次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把征服蓝天的愿望变为现实，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常乾坤、王弼带领全校人员发扬延安精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没有飞机和器材就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作燃料。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高级教练机。没有火车、汽车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没有大米、白面、肉蛋、蔬菜，就用高粱米、玉米碴、玉米面和咸菜果腹充饥……就这样，终于在战争的烽火中和动荡的环境下，使航校办了起来，并且越办越好，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人民航空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东北老航校》，常乾坤、王弼，是实际主持经常工作的负责人，也施展了他们的才能，实实在在的为航空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珍惜人才，爱护关心同志。

创办航空学校，人才是第一位的，但当时中共懂航空的人才，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干着各式各样与航空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为了把这些人才汇集起来，使之投身到创办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的伟大事业中来，常乾坤、王弼到处奔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过去派往苏联，派到国民党空军学习航空的人员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自然科学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中熟悉航空业务的干部，如刘风、王琏、吴恺、魏坚、徐昌裕、张开帙、熊焰、顾光旭等 30 多位

同志,通过中央组织部,集中起来。带领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敌人道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到达了东北。这些同志成为东北老航校的第一批骨干力量。当时,只要是学习过航空理论,懂得一些航空技术的人,常乾坤、王弼就千方百计把他们请来,并亲自找这些人谈话,鼓舞他们为人民的航空事业多做贡献。很多人正是这样陆续来到《东北老航校》参加创建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的伟大事业。

1947年2月,中共派往新疆学习航空的29名红军干部,在方子翼、严镇带领下到达东安后,常乾坤、王弼等航校领导,对他们的到来由衷的高兴,指示航校的后勤、医务部门,对这些饱经铁窗生活摧残的老同志要多多关心、尽力照顾,使他们尽快消除长途跋涉的疲劳,安排他们工作。很快就将14名飞行员插入飞行教官训练班,将15名机械干部编入机械教员训练班。经过数月的训练,于该年秋末,将这批既掌握航空技术又经历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干部充实到航校有关单位的领导岗位上。

1948年秋,沈阳和北平解放后,常乾坤、王弼立即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要求把那些搞过航空的人员调到《东北老航校》中工作,让他们学以致用,发挥专长。并派出空军接收组随军南下,抓好新解放地区的航空接管工作。在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杨群的组织动员,有五六十名原国民党空军和原国民党航空工业局的高级技术人员参加了人民空军,这部分人成为后来航空工厂、研究所、设计所和航天研究所的技术领导干部以及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海军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的教授或行政领导,为我国航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东北老航校》来自四面八方的航空技术人员,包括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和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凡是精通业务,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都受到他们的尊重和爱护。对待这些难得的航空人才,如刘善本、白起、蔡云翔以及林弥一郎等,不仅从政治上关怀信任,业务上关心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使

他们心情舒畅,无后顾之忧地为老航校的建设尽心尽力。

常乾坤、王弼关心爱护同志,视同志如手足。在东北老航校中,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或者是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和起义人员,对此都深有感触。顾光旭在哈尔滨平房机场搜集器材,误入日军731部队细菌库中毒,染上了天花、肺炎;许景煌在牡丹江发生的飞行事故中负伤;李东流在东安摔断了腿;飞行学员毛景新押运搜集到的航空器材,在火车到东安途中,不幸被火车压掉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对这许多的伤病者,常乾坤、王弼都多次去医院看望、慰问,并嘱咐医院精心治疗。许景煌陪同王琏乘坐火车回朝鲜,天气较冷,王弼同志就把自己的一套呢子衣服送许景煌穿着御寒。

吉翔、蔡文翔、严镇、方华等同志牺牲后,常乾坤、王弼都十分悲痛,嘱咐有关部门照顾好这些人员的家属。

对于航校的干部、教员、学员的衣食冷暖,常乾坤、王弼都十分关心,从飞行人员用的飞行服装到机械人员的棉鞋,甚至垫靴鞋的靴草,他们都亲自过问并且加以解决。在东北老航校人员的心目中,常乾坤、王弼是可亲可敬的长者。

(2)精通业务、尊重科学规律。

《东北老航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航空技术骨干,摸索和积累了创办航空学校的宝贵经验,为建立人民空军、发展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了必要的准备。除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外,与常乾坤、王弼等领导同志精通业务,尊重科学,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的求实精神是分不开的。

常乾坤、王弼,学识渊博,勤于学习,精通俄文,对航空理论造诣颇深,有着丰富的飞行组织领导、指挥才能,是中共航空方面老一辈的专家。在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下,如何开创人民航空事业?他们深知,既不能沿着国民党航校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苏联航校的模式,只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人民空军的实际情况去探索。他们把苏联办航校的经验加上国民党空军、日本空军办航校的优点,结

合自己的实际,创造性的运用到《东北老航校》的教学训练之中,采用了一系列适合当时情况的教学和训练方法,如对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型高级教练机学飞行和用酒精代替汽油作燃料的设想,他们亲自组织人员反复论证,反复试验,终于取得了直上九九高练和酒精代汽油的成功,从而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常乾坤、王弼,工作作风一丝不苟。他们对于飞行训练中发生的事故和机务维护工作中发生的严重故障,总是要求查明原因,写出报告,总结教训,提出改造措施。例如:1947年,奉“东总”指示,派刘善本驾驶双发高练向前线运输军用地图,起飞前,王弼亲自组织几个机务干部对飞机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要求修理厂的领导组织力量连夜排除故障,第二天亲自随机升空试飞,直到把问题查清解决后,才批准起飞执行任务,保证了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受到了“东总”首长的表扬。

任何一个单位,领导者的言行就是下级的表率。《东北老航校》在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的影响和带动下,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养成了认真负责、严守纪律、精心工作的良好作风,从而在飞机异常破旧,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保证了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

1948年初,常乾坤、王弼还组织了滑翔机的设计和生产,在哈尔滨生产出“八一”式101号,7月下旬试飞成功。8月初的一天,向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进行汇报飞行表演,受到好评。尔后批准成批生产“八一”式滑翔机,培养了大批飞行学员。这一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建国后在青少年中开展航空体育运动,在青少年中普及与提高航空知识奠定了基础。

(3) 励精图治不尚空谈

常乾坤、王弼,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为了办好航校,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工作。对训练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始终把它放在第一位。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积极组织全校所有懂得航空理论和技术的干部来担任或兼任教员工作,他们还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及时发现和

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当时航校学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学习和掌握航空理论和技术有一定的困难,因而不少学员产生了畏难情绪。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发现后,就组织教员运用直观教学的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并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形式帮助学员攻克文化关,学好理论课,保证了教育训练工作的顺利进行。

常乾坤、王弼都编写了理论教材。常编写了《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领航学》、《射击学》、《轰炸学》等教材并亲自讲授。王也亲自编写了《航空发动机学》、《航空仪表学》等教材。也亲自给学员授课。

当好一名教员很不容易,单位负责人作好教员的工作尤其困难。但常乾坤、王弼认真负责,以身作则,受到了全校同志的一致好评。不少起义的新同志对他们更是由衷的钦佩。许多同志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地担当起教员的工作。就这样解决了航校师资和教材不足的难题。

(4)作风民主平易近人。

常乾坤、王弼,所以深受《东北老航校》全体同志的尊敬,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当官不象官,没有官架子。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又是人民空军最早的航空技术专家,但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资历,也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而是象蜡烛一样,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成为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常乾坤、王弼,生活俭朴,密切联系群众,和教职员工打成一片,是全校人员的知心朋友。因此,大家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向他们倾吐。他们作风正派,为人公道,心地坦白,诚恳待人,对待同志从来都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受了批评的人感到心服口服,觉得可亲可敬,工作中大家心情舒畅。

常乾坤、王弼,善于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鼓励全校人员开动脑筋,献策献计,攻克难关,办好航校,无论是教学训练工作,政

治工作、后勤和机务保障工作,只要是大家提的合理化建议,他们总是交待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积极采纳。用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的试验,就是在倾听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群策群力搞起来的。

常乾坤、王弼在《东北老航校》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航校的办校方针和有关政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3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听取老航校的工作汇报时,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毛泽东连声说:“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常乾坤、王弼在《东北老航校》工作的高度赞扬和鼓励,是对《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充分肯定。

五、在军委航空局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发展,为了指导协助各大区、各野战军接收原国民党空军旧机构及其遗弃的机场设施、器材和人员,并在已解放了的广大地区,建立航空管理机构,为建设人民空军、人民航空事业做积极的准备。常乾坤、王弼向中共中央建议建立相应的部门统率全国的航空工作。这个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决定在中央军委建制中成立航空局,并于1949年3月30日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航空局政治委员。同时他俩仍兼管《东北老航校》的领导职务。

军委航空局是以后人民空军领率机关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全国航空工作的业务部门,是正式成立空军之前的过渡机构。

常乾坤、王弼领导的航空局,工作异常繁重。战场的胜利形势

天天都在发展变化,机场、器材、人员的接管任务十分艰巨。仅1949年3月到10月,在航空局主持下就接收了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航空器材4万余吨,各种航空工厂32个,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还接收了大批机场。大大增强了人民空军的物资实力。

随着解放大军的胜利前进,航空局又先后成立了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沈阳六个航空处。并且顺利地开展了工作。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是后来成立的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的基础。

由于有了机场和飞行保障设施,有了运输机和空地勤人员,为了支援前方作战和恢复新解放区的生产,航空局还积极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赤塔的国际航线。北京—太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国内航线也相继开通,为新中国建立民航也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9年10月29日、11月9日,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者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王弼亲自组织安排人员,顺利地保障两批12架运输机,飞抵北平和天津机场。

常乾坤、王弼还亲自领导航空局的人员,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空军军徽:机徽——在解放军“八一”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黄色边缘的红带;军徽——在“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机徽和军徽,显示着人民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神圣使命是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这个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40余年,已成为人民空军的象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对常乾坤、王弼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地面的安全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安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

常乾坤、王弼非常清楚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当时条件和力量虽然有限,但经过努力,还是可能在北平地区组织一支小分队,担负起防空的任务。于是他们当即肯定的表示:“行!”经过紧张的工作,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空军第一个作战小分队,担负起首都的防空任务,这是人民空军担负防空任务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举世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出现了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机群。那时进行这样规模的空中受阅,可以说困难是很多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破破烂烂。飞行员大都是起义刚几个月的新同志。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两个飞P—51战斗机的僚机,两个飞初级教练机和通信联络机的飞行员,以及几个运输机的副驾驶和随机成员。组织指挥不仅毫无经验,也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全靠“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这样一支队伍接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检阅,飞越30万群众聚集的天安门广场,既要雄伟壮观,又要保证安全,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常乾坤、王弼,做为军委航空局的军政一把手,为圆满完成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好点子,亲自进行可行性试验、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要事先进行阅兵航线的空中照相,这在当时条件下,难度是相当大的,往返要飞行好几次才能完成,他们一再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当试飞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到航空局时,常乾坤饭还没吃完就撂下碗筷,连忙赶到机场照相室,同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又动员大家把下一步工作搞好。他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

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是从各个单位抽调来的,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技术上要过得硬,在政治上也不能出丝毫差错。稍有差

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风险最大的关键问题。但在受阅的飞行员中,出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研究多次统一不了意见。这就是P—51战斗机机群第2分队长机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杨培光起义前曾接受过驾驶P—51轰炸“重庆号”的任务,在国民党空军中颇受信任。起义后他被分配到《东北老航校》一大队二中队当飞行教员。但是,在当年6月28日在公主岭机场进行训练飞行时,他驾驶P—51在地面滑行时螺旋桨打死了刚到公主岭改装飞行的华北航空处处长方华同志。干部战士对杨培光的过失十分气愤。论技术水平,杨培光在国民党空军4大队当过上尉分队长,飞行技术上等。而且,目前飞行员数量有限,无人能够代替。常乾坤、王弼经过多方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因为美制P—51型飞机机头过高,发动机很长,地面滑行飞行员看不清前方障碍物,要不断地作“S”形转弯观察,这次飞行组织指挥不严密,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发生了偶然误伤致死的责任事故,但不是政治性的事故。据此,常乾坤、王弼和飞行队的领导经过冷静的分析,认为,对起义归来的同志,按照党的一贯政策,还是应该信任他们。对杨培光的正确处理将对其他起义归来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经认真研究,保留了杨培光的受阅飞行资格。为慎重起见,航空局还专门给国务院写了报告请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受阅飞行,还担任了受阅飞行的分队长机。最后,他胜利地完成了空中受阅任务。

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国庆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解放军的新军种——空军,胜利诞生了。

军委航空局从1949年3月成立,到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开始办公,航空局机关停止工作。总共工作了7个月的时间,工作紧张而繁忙。一方面要担负起当时的战备工作:如首都的防空作战、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组织、航空运输、护航护渔等任务。同时还要筹备正式成立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如派出接收组随军南下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器材,一批航校的筹备,以及未来空军机关的设

置,驻地的安排,各军区航空处的组建等等。可以说,这一段工作是空军创业的工作。在人民航空事业的历史上是暂短而光辉的一页。

1949年11月,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空军副司令员。以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并兼任过空军科研部部长,空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王弼也被任命为首任空军副政治委员,以后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并兼任过空军工程部长。以后调国务院航空工业部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常乾坤、王弼,在航空领域的高层领导工作岗位上,甘为人梯,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不断开拓前进,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奋斗、贡献了一生。

抗战初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

杨 德 修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领导和组建了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其中最著名的是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其次是,不隶属河北游击军,但由晋察冀军区委任并接受自卫军领导的武装,有抗日义勇军第五、第八支队和博野一带的河北民军,上述部队多在保定东、西活动。此外,在冀中平原北部平、津、保三角地带,还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华北民众自卫军,至今史书很少提到它,有的回忆录虽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此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一些曾在这个部队工作过、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回忆写成,介绍了抗战初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的战斗历程,供大家参考。

一、从“四大队”到十三路军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五十三军虽奋起抵抗,但很快即奉命南撤,冀中平原陷于一片混乱状态。中共地方组织迅即着手组建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在大清河北,曾有五十三军留在雄县守卫该军留守处的一个连发生兵变。该连一排长江东升、二排长曾学敏和司务长左清臣合谋,借口“抗日”拒不南撤,并将平时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连长打死,率部北上。策划这次兵变的主要人物——江东升当时31岁,原热河省哈达(即赤峰)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被分配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七师任中尉排长。他热爱祖国,主张抗日,

对蒋介石在“长城抗线”时命令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将五十三军调驻保定地区，采取不抵抗主义，早就极为不满。他这次策划举行兵变，也是以抗日为号召的，“打回老家去”，在这个东北人占多数的连队里也很有号召力。当时，冀中地区，由于国民党大军南撤，各县政府和保卫团等国民党官府力量，也都一逃而空。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有的远走地方，有的留下准备做日本“顺民”，并买枪护院，雇人保家。剩下的就是那些不甘心为亡国奴，时刻准备着参加抗战的进步知识青年和那些无处可逃又不愿做“顺民”的广大农民群众。江东升等如果抗日，也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列支持。但是，他们却采取土匪政策，率领队伍攻打了新城县柳林庄（现已划归雄县）。因该庄有钱有势的地主防守严密，抢掠未成，反而伤亡十余名士兵，结果士气涣散，怨声四起。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又攻打、抢占了固安县马庄的烧锅和钱粮行，以后被王念中的乡团将其包围，双方对峙达半月之久。在这支队伍接连受挫、走投无路时，新城县东南乡北沙口村（现属雄县）地主士绅陈丹桥（清朝的拔贡），受当地地主豪绅的委托，说服了江东升，将他们收容为北沙口附近 36 村的“保卫团”，溃兵和带枪的农民亦纷纷加入。人员充实后，分为四个大队。这支队伍，还包括一部分收编的土匪武装，成分很复杂。这个出了名的“四大队”，一切经费、粮饷除由当地群众按地亩摊派外，还到管辖村庄以外去抢掠。“四大队”虽以旧军人为主体，但实际上是为地主看家守院“吃大户”的杂色武装。

当时，中共新城县工委分析了这支杂色武装，认为江东升和其中一部分人是愿意抗日的，如果打进去，做些工作，有争取其抗日的可能。工委书记刘佩荣和工委委员郑文明（刘的同学，在博野师范时入党），曾主动到北沙口找到新城县简易师范的同班同学陈丹桥之侄陈德音，通过他的介绍，和江东升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明确说明是找他来联系如何抗日的，江对此表示欢迎。刘佩荣回去后就开“工委”会，研究争取江东升抗日的问题，并在会后动员了王山、唐保衡、杨可材等人，和一部分知识青年，于 1937 年 10 月间到了

“四大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虽然以“四大队政训处”的名义，油印了《抗日前线》小报（收听南京中央电台广播抗日的消息后，当日印出），教唱救亡歌曲，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发现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有的白天赌钱，晚上“绑票”，而江东升等上层人物则忙于收容溃兵、土匪，一心扩大部队，口口声声“队伍多了再打日本”。刘佩荣见无法扭转这种状况，后来就和郑文明商量与江东升不辞而别，偷着去白洋淀找中共保东特委书记、原安新县中心县委书记张君，请求他指示如何争取江部抗日的问题。第一次争取江东升抗日虽然没有成功，但已掌握了他内部的情况，为下次争取打下了基础。

刘佩荣和郑文明找张君时，正好他刚从路西晋察冀军区回来。刘和郑汇报工作情况后，张君对他们讲了华北战场冀中的形势。他说：“日军轻取平津，气焰甚为嚣张，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日军的后方相当空虚，很有利于我们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张还说了冀中吕正操部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部河北游击军的情况。尤其强调：“对江东升如果我们不争取其抗日，待其受敌伪拉拢，变成敌对势力，将后果严重。”

江东升在刘佩荣和郑文明走后，仍有唐保衡和杨可材留在江部政训处继续工作，唐已适应了那个环境，与江等上层人物打成一片。当时，江东升部队有1500多人，为了继续扩大部队，就在刘佩荣走后不久，江东升和左清臣率部攻打了雄县城内的高顺成部（原系土匪武装，后被我党争取改编为河北游击军，但江东升不知道），不料城未打开，反被包围，并将其全部俘虏（唐保衡留在原地，未随江行动）。江和左被押送到安新县城内（即亲安镇）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司令部时，孟庆山找到刘佩荣了解江的情况后，便于当日晚约刘一同去劝江东升和左清臣抗日。见到刘，江惊讶的紧紧握住刘的手说：“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离开我们？”刘说：“哪抗日，我们到哪！”刘的话使江无言可对。刘说明来意，并介绍孟庆山司令。孟表

示要放他们回去,但讲了四个条件:第一、你们回去后立即抗日。打日本不能只在口头上说,要有实际行动。不能等部队扩大后再打日本;回去后马上就打。有多大力量就打多大的仗,主要是游击战。第二、你们部队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河北游击军在地方党领导和号召下,发展很快,当时已有十二路,即第一到七路,两个八路,九、十、十二路),江东升任司令员,左清臣任副司令员,唐保衡任政治部主任,刘佩荣为共产党的代表,到你们那里工作。第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刘佩荣是共产党员,作为你们部队的党代表,有事要和他商量,听听他的意见。第四、如果同意,明天就开群众大会,由你们在群众面前公开阐明上述观点,表态后可将全部人、马、枪支归还,重返原来防地。

江东升、左清臣听了孟的话,非常感动,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抗日主张。

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组成后,江东升立即把指挥部转移到通往天津、保定,接连容城、雄县的水陆码头重镇——白沟,并和各方联系,继续扩大部队。左清臣则集中力量,谋算打日本的各项准备工作。刘佩荣在新安镇,经孟庆山决定,由孟部抽人,组成宣传团(有女同志刘沙、马桐君和冯右铭等),交刘带队去白沟附近开展工作。这个宣传团活动十几天就回去了,留下刘佩荣在江部组织政治部。因刘仍是中共新城县工委书记,故在工委会议上讨论、决定由唐保衡主管政治部的工作,刘任组织科长,许硕(即许应骥,当时18岁,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任宣传科长,杨英任民运科长,魏健任总务科长。敌工、锄奸等各项工作,也做了具体安排。刘除组成政治部并挂出牌子开展工作外,还积极协助左清臣筹划攻打平汉路高碑店车站(距新城30华里,距白沟60华里)的问题。

1938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由左清臣、刘佩荣率领江部200余人,向敌展开进攻,经过激烈战斗,除烧毁高碑店车站房屋设施、破坏了铁路,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兵、三个随军朝鲜妇女。战后,主动撤退到30里以外的村子里隐蔽起来。预计日军会来报复,故在敌

人可能经过的路上，挖了陷井，四周有部队埋伏，准备打击来犯之敌。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高碑店的日本鬼子出动四辆汽车，约 1000 多人，到处杀人放火，但进入我军埋伏圈时，四辆汽车均落入陷井。经我军突然袭击，穷追猛打，日军惨败，弃车而逃。攻打高碑店的这两次战斗，都是因为事先组织、计划得好，指挥员果断、沉着、决心大，才取得胜利的。

袭击高碑店，我军虽然只有 200 多人，但这里的人员都是在部队里精选的，而且经过战前动员，表了决心；武器也是挑了又挑，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都有所考虑。左清臣是这两次战斗的主要组织者、指挥者，他勇敢、沉着、有才能。当左清臣、刘佩荣率部胜利返回白沟镇时，周围村庄前来观看的各阶层群众，男女老幼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接连不断。袭击高碑店车站和伏击来犯之敌的两次战斗，使部队士气大振，同时也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日的信心。由此也说明，当这支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便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时，地方党组织和部队的政工人员，利用这一战果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界人士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十三路军首战告捷，使敌人大为震惊。为了确保高碑店车站和铁路沿线，日军于当年 3 月 8 日侵占新城。

二、华北民众自卫军的 建立和对敌斗争

1938 年春夏之交，冀中平原人民抗日斗争如火如荼的广泛开展起来，人民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江东升部很快扩大到 15000 多人。其中有的是父子兵，老子去找儿子，一高兴扛上枪留在部队里不走了！共产党员许应骥曾任华北民众自卫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他和许应骥（即许硕）是弟兄俩，他们的侄子许书田（即田夫）是和我一起到冀中军区受训的。我家是亲叔侄五人先后来到白沟，投身于抗日战争。部队扩大了，江东

升不肯再当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司令员，想改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编成一、二、三师，自任总指挥。江东升是旧军人出身，雄心很大。他虽然一不吸毒，二不赌钱，三不娶妻（他多次表示：“不打败日本鬼子，我不结婚”），四不骑着马进村，受到群众的拥护。可是，他总想扩大队伍，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去。他最爱听“打回老家去”这首抗日歌曲，常叫部队唱“打回老家去”，一提“打回老家去”，好像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因此，他要设法扩展部队，好有本钱“打回老家去”。部队越多越好，甚至要超过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也要不同于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有人说：“‘民众’不如改为‘人民’好。”他不听。江东升认为，“人民”和“民众”是通用的，他在给部队讲话时，常用“人民大众”这个词。

刘佩荣、唐保衡等不同意部队改名，但江固执己见，讨论起来双方不悦。正好1938年4月冀中区召开党代会，通知刘参加，刘对江说：“改名问题，先等一等，此次开会，可以将你的意见带去，如果上级批准改名，就改；不批准，以后再研究。”江答应了。

冀中区党代会期间，刘将江部情况和改名问题，向黄敬、吕正操、孙志远、孟庆山等领导同志汇报后，经研究确定：同意改名，但必须始终打日本；有了这一条，其它方面可以让步。未等散会，刘便将此意见信告江东升、唐保衡等。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冀中平原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由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为了彻底打开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局面，加强对这一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冀中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从安平县北移至任邱县附近，军区驻青塔镇。

当时，新城县工委也改为中共新城县委员会，任命刘佩荣为县委书记。刘回到白沟后，不到半月，冀中军区派出以张君为首的“北上工作视察团”也来到白沟镇。在白沟，他们除重点了解群众对江

部的反应外,还和江东升等上层人物接触,找中、下级干部谈话。最后,在干部会议上公开宣布,冀中军区批准“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名称,由江东升任指挥,左清臣任副指挥,唐保衡任政治部主任,并肯定它是抗日部队。张君在讲话中还鼓励说:“华北民众自卫军很有生气,是有前途的。”江东升、左清臣听了很高兴,干部情绪也很高。会后,张又召集刘佩荣、唐保衡、王山、许硕四人开会,研究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问题。决定:一、部队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华北民众自卫军以及下属各师均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政工干部均由政治部选派;二、在华北民众自卫军设党的“总支”,刘佩荣任总支书记,唐保衡为副书记,王山、许硕为委员。下属部队凡是有党员的,均设支部,暂归总支直接领导;三、建立青年学生短期训练班(名为青年教导连),发展党员。许硕分工负责教导连的工作。教导连一周一期(办了20多期)除上政治课外,宣传科的人还去教唱救亡歌曲,从早到晚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振奋人心的歌声,不绝于耳。在白沟逢上赶集,来观望唱歌、停在街头听宣传抗日大道理的人很多,影响很大。教导连不仅培养了不少政工干部,还发展了不少党员;四、加强整训部队的工作,彻底改善军民关系。为此,由王山负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每期一个月(共办了七期),各期都由师或团抽调一个建制营,来白沟受训,主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工作,均得到了江东升和左清臣的大力支持,并在实践中证明,以上决定和作法效果很好。这支部队党的作用和政治工作(包括群众工作、敌伪军工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部队不仅抗日,而且有个“政治部”^①。华北民众自卫军在涿县、固安一带的部队已深入到北平附近活动。三师师长鲁学敏虽系旧军人,但有爱国热情,思想进步,与共产党员合作很好(这个师党员多),是华北民众自卫军的主力。该师曾抽出精干的武装力量,化装

^① 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03页。

成商贩等,以各种掩护在大兴县(黄村)附近活捉汉奸,争取伪军反正。他们利用伪军从北平南苑把一挺日本重机枪弄到手,人们高兴地称它为“仙鹤腿”。

以张君为首的冀中军区北上工作视察团,离开华北民众自卫军回到冀中军区以后不久,为了加强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娱活动,于1938年8月,组织上派我(共产党员)负责带领新招来的十来个青年学生(人称“少先队”,多在14至16岁),到青塔(冀中军区所在地)跟着火线剧团学习一个月。回到白沟后,这个宣传科组成的宣传队很快扩大到20余人。他们不仅能唱歌,跳舞、吹口琴、作宣传、贴标语,还能演戏。记得我曾和刘广志等同志排演过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弟兄俩》,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华北民众自卫军的《民众吼声报》对此专门进行过报道。当时宣传队的小青年,后来有不少人都成了部队的骨干,如许书田、崔蕴章、张以旃等。

冀中军区的视察团,到华北民众自卫军虽然只有十多天,但对江东升部队的争取和改造、对部队党的建设和地方党的工作,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刘佩荣集中力量搞部队工作,地方党任命朱德生为新城县委书记(王泽田去了延安抗大学习),新城县委利用在白沟镇设立的青塔书店为掩护,继续工作着。当时不仅地方上发展党的组织要保守秘密,就是在华北民众自卫军,党的组织也没有公开,只是政治部挂了一个“组织科”的牌子,公开了刘佩荣一个人的党员身份。

华北民众自卫军虽然为时不久,但发展很快。1938年5月间,华北民众自卫军在原来十三路军时三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为一、二、三师,每师三个团。师设政治部,团有政治处。指挥部在白沟镇设立了参谋、军需、军械等八大处,还建立了兵工厂、医院、被服厂等。后来又在天宫寺扩编了独立团、骑兵团、特务营、武术连等^①。

^① 1983年7月,在辛立庄、白沟座谈会上,刘佩荣和原华北民众自卫军指挥部侦察科长杨可材的发言。

华北民众自卫军不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大清河北的日伪军,更起着不可低估的威慑作用。华北民众自卫军成立以来,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的直接关怀和鼓舞下,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这个部队不到一年时间,即进行大小战斗 20 余次。其中多数是在敌后主动出击。如 1938 年的 6 至 8 月间,曾分兵数路主动向敌展开进攻。当时日军主力大部南下,后方兵力不足,驻高碑店车站和定兴、固安等县城的据点之敌均处守势。4 至 8 月间,敌虽然四次用飞机轰炸过白沟镇(有一次炸弹落在政治部附近),但未能出兵“扫荡”。华北民众自卫军在高碑店首战告捷后,为了防卫定兴、高碑店之敌来犯白沟,由刘佩荣和副指挥左清臣率领部队一举攻占了定兴县的天宫寺据点,并在此设立了前线指挥部。

二师曾派部队深入到涿县、松林店车站一带,发动群众破坏铁路,并将枕木和铁轮运走(白沟兵工厂的材料来源,就有一部分是用的铁轨),使日军大动脉的平汉路一度中断。

6 月初,一师一团在固安县大沙岱与日军遭迂,在团长李玉斋的指挥下,顽强作战,毙伤日伪军多人,迫敌仓惶而逃。此次战斗,缴获汽车两辆,武器弹药各一部,沉重打击和牵制了敌人。

1938 年麦收后的傅庄战斗,是华北民众自卫军有史以来最顽强的阻击战。当时驻定兴之日伪军百余人,企图偷袭我驻天宫寺的前线指挥部,途经傅庄被该村一个连发觉后,部队迅速投入战斗,英勇抗击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当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时,左清臣由天宫寺亲率一个团驰援傅庄,迫敌狼狈撤回定兴。此次战斗,虽然杀伤敌多人,但我方在浴血苦战中,有连长胡建三、副连长宋玉林等 70 余人为国捐躯。

8 月间的三打固安县城,是在大清河北的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的一次战斗。当时三师曹学敏部在固安县三区收缴彭村镇附近民团枪支,仅北赵村就缴枪百余支,还有迫击炮两门,弹药一部。当月 11 日,该部 300 余人在彭村与固安县伪警察局长林景岳率领的伪军警民团 500 多人发生缴战,坚守三小时后,因日军由固安县增

援,我主动撤出战斗。14日夜,曹学敏部千余人,将伪军警民团包围在古城、崔台寺,毙敌探警两名,伤三名,守敌仓惶逃入固安县城。于17日凌晨两点半,部队乘胜对固安县城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守敌拼命抵抗,城内一度陷入混乱。战至天明,部队后撤。20日晨三点,复攻县城未克。26日夜,我军攻占了城外大龙堂、王庄子、祖家场、天齐庙、刘家院等村庄后,又第三次攻打县城。因敌防守严密,激战两小时后,部队主动撤走。三打固安县城^①,不仅大量消耗了敌人的弹药,搅得敌人日夜不安,而且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8年8月24日,左清臣率骑兵数百人沿小清河北上、长途奔袭固安县官村镇时,该镇伪民团猝不及防,全被缴械,固安之敌闻讯,慌忙调兵遣将,曾出动日伪军2000余人,向官村扑来,但中途遭到我骑兵团五连的伏击。敌人恼羞成怒,改变战术,先用炮轰,而后出动骑兵迂回包抄,五连被迫撤回官村阵地,与另外两个连合兵坚守,敌人的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战至傍晚,部队才主动撤离官村。此次战斗,击毙日伪军40余人,我军阵亡连长赵庆志以下官兵30余人。

在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历史上,也有没有伤亡而获全胜的时候。那就是在冀中军区统一部署下参加解决“联庄会”的战斗。在“七七事变”国民党大军撤退后,大清河北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溃兵如麻,土匪蜂起。由于散落在民间的武器不少,也便宜,好买,所以有钱的人都设法购买武器自卫。后来,又发展成联庄,一村被抢,其他村庄立即赶来援助。“联庄会”形成了一个保护地主利益的联合武装组织。当时,联庄武装分两类:一类是坚决抗日的;一类是反动的,被汉奸、特务利用来反共反人民的。坚决抗日的联庄,如雄县东南乡的娘娘宫(今属文安县)一带的村民,曾与日寇浴血奋战,事迹

^① 新城县委党史办访原华北民众自卫军三师七团一营战士胡向荣笔录(《固安县志》卷四)。

留传后世。被汗奸、特务所利用，反共反人民的联庄，是以新城县东南乡米家务（今属雄县）为中心，附近雄县、霸县、固安等县所属一百多个村庄联合起来的“联庄会”。总会长是米西庄的刘玉珠，该人为国民党兰衣社（军统前身），联庄被摧毁后进入敌占区北平，投靠当时军统“华北实验区”的头头、大特务马汉三。于1948年9月，国民党以“胆大妄为，中饱私囊”的罪名，将马汉三和刘玉珠同时枪毙^①。

刘玉珠曾一时也口口声声地说：“联庄会要打日本”。可是，他控制的村庄，一不准支援冀中的八路军，二不准任何抗日部队通过和进驻。因为刘玉珠要把“联庄会”变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所谓“敌后武装”，他起初是联络各村，选他当了总会会长，进而又成立中心武装。一般的大村50人，小村20人，并规定30亩地以上人家，都要买一支枪，就此积极地扩大了他的队伍。接着又提出，中心武装要全部带上武器，每周会操一次。实际上是武装示威，扩大声势，使“联庄会”操练成一支机动武装力量。这时，刘玉珠便偷偷地和天津地下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于1938年6月，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委任，他成了国民党在敌后的“忠义救国军”总司令。

中共新城县委对“联庄会”开始是尽量争取，曾派共产党员朱德生进去担任了刘玉珠的秘书，以后又派杨家庄的冯俊明、翟景兰（不是党员）到联庄总部，他们对刘和周围的人进行过许多抗日宣传工作。刘玉珠采取两面手法，一面答应抗日，一面和在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勾结。当朱德生等全部掌握了“联庄会”的机密，特别是发觉刘的来往密信，并查实刘玉珠要当所谓“忠义救国军”的总司令，已有了委任状以后，中共新城县委便及时向冀中军区报告，这才决心以武力解决之。

解决“联庄会”是奉冀中军区之命，由胡乃超和中共新城县委书记刘佩荣共同负责的。胡乃超是冀中军区抽调的二十七大队大

^① 北京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25页。

队长。当时，胡和刘商量，要设法使二十七大队进驻米家务。只有进去，才能了解其防务体系，进而解决联庄总部，迅速切断它与各地的联络。米家务实际上包括五个村庄，即东大村（刘佩荣是这个村的人）、西大村（“联庄会”总部所在地）、西庄（刘玉珠的家）、北庄（联庄武装的主力在此）、南庄。1938年9月初，刘佩荣领着二十七大队来到米家务。进村准备住下来时遇到麻烦，各村都说：“没有总会长命令，不敢让房。”刘和胡不得不在当天拜会刘玉珠，见面说明“二十七大队是奉命到北宁路附近活动，路过此地，想在这休息一下，请会长帮忙。”刘玉珠在此情况下，非常客气并答应“可以住下”，只是提出“北庄不能住”。于是部队迅速驻进了除北庄以外的四个村子。

二十七大队进驻米家务后，公开活动是宣传抗日的大好形势，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团结抗日的必要性，说明分裂是日本鬼子的阴谋，我们不能上当。暗地里则侦察地形，研究如何部署兵力，解决北庄“联庄会”的主力问题。解决“联庄会”，实际上是按一次战役来部署的，总指挥是胡乃超。事先冀中军区对此开过作战会议，具体分工是：原民军张存实部，负责解决新城县咎岗（今属雄县）一带的联庄武装；冀中军区第四支队（高士一部队），负责解决新城县双堂（今属雄县）一带的联庄武装，冀中军区第一支队（朱占奎部队），负责解决霸县岔河集和固安县牛驼一带的联庄武装；华北民众自卫军负责解决新城县板家窝、八洋庄（今均属雄县）一带的联庄武装。由胡乃超下令统一行动，相互配合，但各收各的枪支人马。战斗进行的很顺利，部队首先包围了米北庄联庄的主力，很快上房控制了制高点。当对方发觉打响后，曾几次想从院内冲出来，均未得逞，最后只好缴械投降。在两天以内，“联庄会”一百多个村庄的武装全部解除，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特务机关发的委任状。当时部队向群众宣传为什么解决“联庄会”的有力证据，就是这些委任状。

这个“联庄会”在冀中实际上是一个“反动的小岛”，清除它之

后,不仅使抗日的力量联成一片,群众情绪也稳定下来,为冀中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创造了条件。正如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所说:1938年“我们大力进行开辟大清河北的工作。二月间北上先锋队挺进大清河北时,虽然收编了一些杂色武装,打开了一些地区,但由于我军力量单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军区移驻青塔后,到九月间,大清河北及两岸地区便被我军打开。我们抽调一批干部到那里工作,成立了第五军分区(后改为十分区)。”

解决了“联庄会”,使新城县全部、新城邻近的雄县、固安、霸县、涿县、容城、徐水、定兴等县各一部分村庄,都成了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势力范围”。因此,中共新城县委的地方工作,和华北民众自卫军政工干部的工作,也同样涉及到以上各县的村庄、集镇。如筹粮、筹款、扩兵、做鞋等等,当时地方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各级“动员委员会”(即“救国会”),实际上“动委会”就是各级政府的初期形式。

解决“联庄会”以后,从部队来说,实际上给华北民众自卫军创造了又一个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它借此机会收了不少人马和枪支、弹药,当时整个部队已经达到两万人。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这个阶段的冀中(包括大清河北)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是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冀中区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已迫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日本防卫厅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检讨“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时,不得不承认其所谓“治安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三、华北民众自卫军历史的终结和教训

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武汉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

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部队进歼为辅的方针；而将战事中心移向敌后，尤其是华北。日军“汉口作战刚一结束，……第十、第二十七师团等乘船向南京进发，随后大部归还华北。”^①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回到华北驻津浦路北段，站脚未稳，就和平汉路北段的第一一〇师团，以及分驻各地的一万多伪军，从1938年11月开始对冀中平原根据地发动了分区“扫荡”。冀中是在津浦、平汉、北宁、沧石四条铁路线之间的大平原，冀中的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大清河北虽属冀中平原北部，但距平、津、保日军战略据点较近，对敌威胁更直接，同时这一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也很丰富。所以，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进行掠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就妄图一举摧毁冀中平原根据地，并重点“扫荡”大清河北。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分区“扫荡”，均首先从大清河北的雄县、霸县、容城、新城、固安地区开始，华北民众自卫军首当其冲。

1938年11月12日，日军6000余人，以坦克开路，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大清河北的新、雄、固、霸等县的我军围攻。当时，以孟庆山为首的冀中第四军分区领导机关，避开了敌人的强大攻势，转移到白洋淀隐蔽起来，分区的主力部队也撤到外线。华北民众自卫军则对敌情一无所知，平时缺少情报和侦察工作，又和冀中军区失去联系，对上对下的通讯联络一无电台，二不通电话，只靠自行车或骑兵传递信息，当然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尤其惨痛的教训之一是部队不会打游击战，而用逐村阵地战方式进行抵抗，虽然杀伤了不少敌人，但收效不大，如蔡各庄之战。

1938年11月13日，日军再一次占领新城后紧接着在14日集中步、骑、炮联合部队400余人，汽车四辆，企图由蔡各庄渡河进攻白沟镇，当即遭到华北民众自卫军一师的阻击。激战竟日，终于

^① 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上册第78页。

暂时阻止了这路敌人的进犯。1938年12月8日的冀中《导报》第三版报道说：“敌我在蔡各庄发生激战，我调大军前往，敌难得逞。”实际上，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大军”，不到10日，则被强敌击溃；白沟镇失守，江东升、左清臣、唐保衡三人带着特务连和指挥部的一百多人跑到白洋淀。

教训之二是没有加强党的建设。这个部队人多，共产党员少，又都当了政工干部，平时无基础，战时也就掌握不住部队；最后，部队溃散回家时，政工干部无能为力。

教训之三是部队发展太快，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虽然在白沟搞过教导连，也抽调过建制营集训，但当时所强调的只是抗日保家乡，而缺少对部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当时的部队，实际上还没有完成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在华北民众自卫军里，当地的农民多，家乡观念重，有些人是从家中带着枪来的，一遇“急风暴雨式的”摧毁性的打击，就扛上枪回家躲起来了，或者把枪集中藏在连排干部家中。

部队溃散后，江东升他们在白洋淀收容残部进展很快，真是“召之即来”！尤其政工干部，有的随江东升到了白洋淀，有的很快和县委的几个同志取得了联系。收容残部时，他们都是骨干，穿着便衣从大清河南北走来走去，有时还到敌占区找人，就连女同志也想方设法找到后送进白洋淀中。当时的王清源（后改名黄克，和孟庆山结婚）、吴言荣、王恩荣三位女同志就是由我和宣传科的胡志戎送进白洋淀的。不到一个月，华北民众自卫军已收容一千多人，原有的人、枪、马又集中到白洋淀。后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督促刘佩荣去汇报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的情况，刘到冀中汇报时，曾谈到部队失败的教训（刘曾召集有朱德生、王山、许硕等参加的新城县委会议，讨论过华北民众自卫军失败的教训）。所以，刘汇报后，黄敬和吕正操都说：“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江东升他们仍有很大影响，你还是回去（刘当时不愿意回江部），部队是可以改编的。我们已经决定：把江东升收容的一千多人，编为

冀中三纵队独立第六支队，江东升任司令员，左清臣任副司令员，唐保衡任政治委员，你任政治部主任。现在就带去委任状，还有10万冀中货币，一部电台。这样，你的工作比过去更好做。”黄敬还说：“新城县委的工作由朱德生负责，并任书记，王山任县长。”程子华接着强调指出：“你回去主要抓部队的收容工作，继续扩大部队；特别注意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你们在大清河北离日本鬼子很近，一个村庄住下来不能超过一星期，部队要不断地转移；六支队成立党委，由唐保衡任书记，你任副书记。大队（营）成立总支，连成立支部，排、班都要建立党的小组。多注意加强党的建设。”

刘佩荣在冀中汇报时，江东升他们在白洋淀，一方面尽快收容部队，提高部队的士气；一方面尽量想方设法扩大声势。用唐保衡的话来说，就是表明：“华北民众自卫军还在，没有垮！”为此，曾从特务连抽人配备上政工人员，带着写好的以“华北民众自卫军”署名的传单，到孤庄头一带伏击雄县出来要粮、抓伏的敌人，夜袭白沟镇澡塘，想“抓个日本鬼子”（江东升的主意）。只是因为缺乏内线，侦察没有搞好，失去了战机。虽然两次都到达目的地，但未成功，只是散发了一些传单。不过，在大清河北的泗庄，他们把“维持会”给砸了，还在夜里抓了几个汉奸。在这种情况下，刘佩荣带着上级的指示，到了白洋淀。江、左、唐等见刘自然莫大欢喜，对冀中区的委任非常满意。表示：“我们又升格为八路军了！”部队情绪很高，纷纷要求离开白洋淀，过大清河北去打日本。后来部队开到大清河北，影响很大，许多残部纷纷来找，不久便扩大到约三千人。当时，大清河北的形势又出现了新情况，就是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到达冀中后，立即从七一六团抽出一部分人组织一二〇师三支队，由贺炳炎、余秋里率部进入大清河北三角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的翟耀宗部，在大清河北首先编入三支队。江东升部（冀中军区第六支队）曾在菊花台一带配合一二〇师三支队与日军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战斗，那天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歼敌百余人。可是，战后不久，部队也就转

移到大清河南，在冀中军区驻地附近，改编为一二〇师三支队八团了。当时，我在八团三营八连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三支队七、八、九三个团里都有不少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的人。改编后的八团，受到当时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总指挥贺龙的亲切关怀，在抗日战争中，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干部经受了严格的考验和锻炼，成长很快。改编时任八团政委的刘佩荣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生前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即使一些旧军人也大多数是好的，如在 1939 年 5 月冀中莲子口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八团一营营长陈景山；1940 年部队由冀中开赴晋西北后，率部执行任务，在静乐县娄烦镇以东老书寺战斗中，与日寇决一死战而壮烈殉国的八团副团长左清臣等，他们的英雄业绩，是和所有华北民众自卫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江东升被编入一二〇师三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他和当时的支队副司令员贺炳炎、政委余秋里一起成功地指挥了冀中莲子口对日作战。战后，部队转移到深泽县北马村时，在一个教堂里，江东升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他曾带一些干部和少数部队返回大清河北扩军、收容离队的战士。1939 年 9 月，不幸被另一支部队误杀。1988 年 9 月，经吕正操和河北省委同意，由中共新城县委作出《关于江东升同志被错杀予以平反的决定》，恢复了江东升同志的名誉。该《决定》明确指出：“江东升生前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日寇大肆侵华，国难当头之际，他高举大旗挥戈抗日，由一个旧军人变成一个爱国者、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者，是很可贵的，而且在多次抗日战斗中是有功的。”

在 1939 年 9 月，和江东升同时被错杀的尚有原中共新城县县委委员、华北民众自卫军宣传科长、教导连指导员、中共华北民众自卫军总支委员、八路军三纵队第六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一二〇师三支队八团政治处主任许硕和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黄山霓，均在 1984 年 5 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唐保衡在部队改编时，被任命为一二〇师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由于 1942 年整风审干扩大化,被迫自杀身亡,早已甄别平反。原在华北民众自卫军工作过的同志,尽管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受审、甚至含冤离世,但后来对他们都已平反、昭雪。这支部队的基础虽是旧军人,初期吸收过一部分土匪、无业游民,既反日又扰民(主要是吃大户),属于杂色武装。但很快经我党争取教育,接受了党的领导,党派去的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在部队中起着骨干作用,唐保衡、江东升等也入了党,加上广大劳动农民参加,使部队的性质明显改变。它已经由杂色武装改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即使在强大的日军进攻下受到重大挫折,部队并未因此而变质。这支部队对抗日、发动群众、安定社会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威信。可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缺乏调查研究,后来对江东升等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趁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离开冀中之际,未经冀中军区(吕正操当时不知此事),便错误的按敌我矛盾将江等杀害,其所率部队被收容、遣散,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带枪逃走。这一错案给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巩固,教训也是深刻的。

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李 东 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一个窗口。它对海外华侨和归侨青年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使香港这个纷繁复杂、灯红酒绿的祖国南大门,成为中共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枢纽。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国共两党协商,得到国民党的同意,中共在国民党战区的某些大城市设八路军办事处。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①。由于日本侵华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气焰,周恩来的这个要求得到应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廖承志(中共南方局委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为八路军代表。中央之所以委廖承志担此重任,是因为他出身革命世家,从小受到孙中山、宋庆龄及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廖仲恺是很有影响的美国华侨,又是革命先烈。母亲出身于香港富有家庭。他在海外有很多亲戚,是有很多海外关系的中共领导人。党中央派他到香港主持海外统战工作,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种优

^① 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史资料》第18辑,第31—32页。

越条件。先后派往办事处工作的还有连贯、梁上苑、潘柱、罗雁子（罗理实）、张淑芳、冯劲持、杜埃、李默农（李少石）、张唯一等人。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对外挂牌为“粤华公司”，以做茶叶生意为掩护。办事处下设交通、宣传、联络、侨务等部门。1939年3月11日，因日本的压力，港英当局突然出动便衣警察搜查“粤华公司”，带走连贯等5人，搜走一些通讯资料。后经周恩来和廖承志交涉，被捕人员被释放，搜走的文件被归还。此后，办事处撤销了“粤华公司”的招牌，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化整为零”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连贯以华比银行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

“香港八办”一成立，就把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香港八办”做了许多侨务工作。

一、派遣工作人员到侨居地开展华侨工作

“香港八办”成立不久，即先后派王任叔、杜埃、陆诒、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多人到新马（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纽约等地开展华侨工作。廖承志来港不久，即派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陈启昌到南洋华侨中活动，发动组织华侨抗日后援会，创办《侨声日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后廖承志又派詹培到印尼泗水访问积极抗日的华侨吴志满，对吴的爱国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吴对廖承志亲自派人漂洋过海访问他很感动，此后，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吴经常和廖保持联系。连贯亦曾两次代表中共华南分局派归侨蔡白云和钟萍夫妇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从事侨运工作。他们在华侨工人、学生、妇女中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宣传抗日，捐款献物，支援抗战，为解放区输送华侨青年。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在重庆与周恩

来会见时,请周推荐一人到新加坡,帮他办《南洋商报》。后周恩来委托廖承志物色人选,廖便推举在香港的胡愈之担负此任。廖对胡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10月,胡愈之接受任务到新加坡。陈嘉庚对胡很信任,委任他为《南洋商报》主编。1941年1月1日胡走马上任,使该报成为团结华侨,致力于抗日救亡,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宣传工具。

1939年初,著名文艺工作者金山、王莹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香港,改名中国救亡剧团,在港演出半年多时间。同年下半年,廖承志、潘汉年派该剧团到南洋华侨中进行演出。

1941年夏秋间,“香港八办”再派归侨钟仕开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华侨中开展抗日活动。钟在吉隆坡郊区甲洞华侨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发动华侨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钟仕开在当地组织青年和华侨成立抗日游击队,在极为艰险恐怖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斗争,后被日军逮捕,壮烈牺牲。

“香港八办”成立以来,先后同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地的华侨建立了联系。香港是远东的水路运输中心,其大小船只通航于世界许多大港口,有许多华人海员(有些是华侨)在这些船上工作,“香港八办”派人与海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其为祖国抗战尽力。

除派人到侨居地开展华侨工作外,“香港八办”还热情接待来办事处的华侨,交流抗日救亡情况。1939年3月,新加坡民先队派张楚琨到“香港八办”向廖承志、李少石、连贯请示工作,受到热情接待。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著名爱国侨领蚁光炎也曾到香港与何香凝、廖承志亲切会晤,印象很深,增强了祖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加强对华侨的抗日爱国宣传工作

“香港八办”成立后,很重视对华侨的宣传工作。1940年9月

27日,廖承志分别致电延安党中央及重庆周恩来,提出:“为加强华侨宣传起见,我们建议:(甲)海外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盼侨委着重布置,并经常指示。(乙)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①1941年春,大批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廖承志等就开展统战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并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主张建立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奠定向海外活动的基础;由他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华侨、殖民地域的报刊工作^②。这两封文电足见廖承志及办事处对华侨宣传工作的重视。

不但如此,“香港八办”还做了许多具体的对外宣传工作。为使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能经常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以及中共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办事处翻印出版了《新华日报社论集》和《群众》周刊,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办了《华侨通讯》,主要内容为报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和解放区的情况。这些材料均来自延安和重庆,既真实又新鲜,深受海外侨胞的欢迎。该刊在香港及海外许多地方都有发行,销量达3000份。香港的许多报刊、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裔日报》、古巴的《前进月刊》等报刊都曾转载该刊文章。泰国华侨青年许一新在港创办了文化书店,得到“香港八办”的直接指导帮助,办事处派梁上宛协助工作。书店把许多进步书刊发往港澳和海外各地,扩大对华侨的宣传工作。1939年和1940年,办事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新文化书店等单位,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并用英文向国

① 廖承志致延安侨委及周恩来电:《加强华侨宣传工作》(1940年9月27日)。

② 《廖承志致中央书记处并周恩来电》(1941年3月24日)。

外发行。其中《论新阶段》是办事处请美国归侨张继翻译的。中共在重庆出版的《群众》周刊也寄运纸型到香港，由办事处翻印发行。此外办事处还出版了《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多种文艺刊物。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广大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八办”组织人搜集侨报发表的对皖南事变反应的文章，编辑成小册子，带往马尼拉印刷和寄发。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办事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香港爱国同胞、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的支持下，创办了《华商报》，作为中共在香港宣传的喉舌。该报之所以取名“华商”，据夏衍说，廖承志在召集筹备会议时，大家认为香港是远东唯一的自由港，但又是英美法荷、德意日、国民党及汪伪汉奸多方的情报活动中心，我方在此办报，必然遇到各种阻挠和港英当局的审查。为使报纸得以公开出版发行，邮寄南洋各地，并因该报的注册法人邓文田是商人，廖承志遂起名《华商报》。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由于经费困难，创刊时除邓文田捐4万元外，廖承志还派人向陈嘉庚募捐4万元。该报创刊后，组成社务委员会，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夏衍主管文艺版，张友渔主管社论、理论、时事；邓文田、邓文钊分别任“法人”代表和负责经理部。该报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反对投降、分裂、专制、倒退，与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及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成为向海外宣传抗日和民主的重要阵地。该报在港澳、内地及新加坡、槟榔屿、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

三、接待护送归侨到各抗日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及其领导的军队英勇抗战，在国际上及华侨中的影响愈来愈大。有不少华侨身心向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纷纷回国投奔八路军、新四军。但当时东南沿海的海外交通大部分被日军掐断，西南地区为国统区。遥远归来的海

外华侨青年人地生疏,如只身到抗日根据地要历经千难万险,毫无人身安全保障,因而绝大部分华侨青年要经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再由办事处根据情况安排去陕北、华中或华南抗日根据地。办事处遂成为归侨安全可靠的“中转站”。

当时凡是来办事处接头的华侨,不管有无进步华侨组织的介绍,都受到热情接待。办事处还向他们详细介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党的抗日主张。他们离港北上时,廖承志、连贯等亲自为他们开介绍信,安排人交待具体北上路线或预防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他们购买车船票,甚至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有时派专人护送他们。

至今,许多老归侨回忆当年自己回国抗战时,都难以忘怀当时受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的情景。华侨黄登保,1938年同戴行伍、张超然、高明轩等几名华侨青年由菲律宾马尼拉起程回国,经华侨王雨亭介绍到“香港八办”找廖承志接头,再由廖介绍到延安,转到抗日前线。1938年春,菲律宾另几名华侨青年张道时、吴一舟、安岱等回国欲到延安,经香港时,也受到廖承志的接见。连贯安排他们的具体生活问题,指导他们如何识别瞒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应付紧急情况等。连贯看到他们衣履单薄,未备棉装,还亲切地说:“你们真是在热带长大的,没尝到寒冷的味道。穿这些单衣,怎么能去冰天雪地的北方?”^① 随即亲自带他们选购棉衣,到裁缝店定做棉大衣,然后特地安排两名会粤语的同志与他们结伴去延安。在广州、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一行终于顺利到了延安。

马来亚华侨李介夫等5人也是经“香港八办”帮助到达延安的。新加坡华侨女青年廖冰、钟萍等去延安时,亦得到香港、广州、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层层关照,才安全抵达目的地。钟萍等

^① 《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在武汉八办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周问寒问暖，赞扬华侨的爱国热情，鼓励她们到延安要用心学习，为抗战作贡献，使她们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

还有些华侨经“香港八办”介绍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马来亚华侨郭永绵，1940年2月因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捕并押解出境。他回国时，先与“香港八办”取得联系，廖承志、连贯很关心他，指点他到上海转往苏北参加新四军。另一名马来亚华侨谢白秋，1939年初来香港拟赴延安抗日。办事处的同志转告他，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到处搞磨擦，去延安有危险，建议他到皖南新四军去。旋经办事处安排，他先到上海找地下党，然后转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刚刚开赴前线，医护人员、汽车司机缺乏。“香港八办”奉上级指示，两次大规模地向海外招募技术人员。一次是从新马、印尼等地为新四军招募146名华侨司机；另一次是从香港、马来亚、泰国招募数十名医生、护士和司机。这些被招募的华侨抵港后按办事处指定的地点报到，然后由办事处派专人安排食宿，每人填写一份履历表，经审核后由廖承志给他们开介绍信，再派人统一购买车船票，安排他们上路。据不完全统计，经办事处送往延安或新四军的技术人员和华侨青年约达五六百人^①。1939年底和1941年初，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去延安和华中的道路有危险或被封锁，经“香港八办”介绍到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华侨和港澳青年就更多了，总计约达千人以上。

抗战时期，大批归侨青年万里跋涉，经过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香港八办”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它犹如雾海中的航标，指引着众多华侨向着安

^① 《细数抗战期间华侨援助抗敌组织》，香港《广角镜》1988年12月16日。

全光明的方向前进。

四、接收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共 及其领导军队的财物援助

“香港八办”的一些接收捐赠工作，是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联合进行的。

为便于开展对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不久，廖承志认为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团结华侨和国际友人最理想的人选，便与她商议，由她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筹建过程中，廖承志和潘汉年同宋庆龄一起研究“保盟”的工作任务及其活动方式，并参与大量筹备工作。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西摩道21号宣告成立，宋庆龄邀请许多中外著名人士参加或支持“保盟”的工作，其中有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克莱尔·布恩；德国的托马斯·曼；印度的贾·尼赫鲁等。“保盟”初期的7名执行委员是：宋庆龄、邓文钊、廖承志、廖梦醒、爱泼斯坦、塞尔曼·克拉克夫人和诺曼·弗朗斯，由宋庆龄出任主席。“保盟”除出版英文《两周通讯》外，主要工作即为募集捐款、药品、医疗器材和其他物资，支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抗日。当时海外援助中共军队的款项和物资，有些是经“香港八办”接收的，有的是通过“保盟”接收的。华侨给中共的捐款大部分通过香港“大英银行”办理，后转改为华比银行代理。华比银行经理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妹夫，受廖的帮助和影响，思想倾向共产党。他不顾自己的身家财产，甘冒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以自己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崇德堂进出口办庄作为“香港八办”的通讯处，以及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廖承志就是通过这些关系把海外华侨捐献的财物一批批地转到各抗日根据地。

美国华侨司徒美堂及其领导的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与“保盟”联系密切,通过它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各种援助。美国波士顿华侨李兆焕,在一家餐馆工作,曾捐款1·7万美元,通过“保盟”转给八路军抗战之用。1938年5月间,新加坡13个华侨社团成立“星洲华侨援助八路军大会委员会”,捐给八路军一批款项和药品,其中部分由“香港八办”转送,另一部分由归侨带回国内。同年冬,“香港八办”和“保盟”收到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及港澳同胞捐赠的药品和医疗器械130多箱,用船运往惠州、老隆转“桂林八办”,再转往延安。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的华侨组织捐献5个卡车底盘,在港安上车身,装满海外捐来的物资运往延安。一位华侨得知边区医疗设备落后,特捐赠一架大型X光机,通过“保盟”转给延安。由于以前国民党武装曾经扣留过“保盟”送往延安的物资,所以宋庆龄特介绍廖梦醒去找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的副官夏威夷出生的华侨杨某设法护送,杨某得到史迪威的同意,用一架飞机专程送往延安。1939年5月,“保盟”为新四军伤病员募集毛毯的呼吁传到世界各地,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募集到毛毯2万条。1939年10月,“香港八办”收到美洲和南洋各地华侨及香港同胞捐赠的大卡车20辆、小轿车2辆,转给八路军。

泰国侨领蚁光炎,曾托人运送两部救护车和大批药品给“香港八办”廖承志,并多次汇款到香港华比银行转宋庆龄、廖承志支援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每当“香港八办”和“保盟”收到华侨捐献的财物后,当即缮写收据与感谢信寄给捐献者,用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或“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名义并盖上印章。感谢信还简要介绍时局和八路军最近战况等,可见其工作做得多么周到仔细。

五、发动华侨支援华南抗日斗争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自己的惨遭蹂躏的家园,抗战爆发不

久,许多华侨或捐款献物,或派出自己的子女,保卫家乡,积极配合、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而“香港八办”尽量为他们这些爱国活动创造条件。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南洋各地的琼侨抗日组织和琼崖旅港同乡会,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琼侨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新马、泰国、越南、香港等地的华侨、华人共80多人。会议决定成立“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统一领导南洋各地琼侨的抗日救乡工作;并决定组织“琼崖华侨救乡服务团”,动员琼侨回国参战。“琼侨联合总会”成立后,发动海外琼侨踊跃捐款献物,通过“香港八办”转给冯白驹部队;并组织了由240多人组成的“琼崖回乡服务团”,在“香港八办”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下回琼抗日。

1938年10月,广州和东江各地沦陷的消息传到南洋,立即激起了广大华侨保家卫国的热情。旅居马来亚、印尼的惠州十属华侨于10月30日成立了“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推举侨领黄伯才为主席;会址设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并在各地设有分会。该会成立不久,便派遣黄适安(何友逖)等为代表到港并转东江考察研究抗日救乡事宜。抵港后,受到廖承志热情接待,并多次进行磋商。在廖承志的鼓励 and 指导下,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的三个团体的代表在港集会,筹备成立归侨救乡团体。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简称东团)。在东团筹建期间,廖承志和连贯不仅在组织上给予帮助,而且在确定任务以及制定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方面也给予具体的指导。东团的成立宣言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工作团体”为宗旨。为了使东团更好地开展工作,廖承志还特地邀请在香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同黄适安等代表谈话,专门讲述了到敌后工作的一些问题,如怎样进行赈济难民,怎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如何组建游击队,如何发动侨胞支持新四军和东江游击队等问题。在“香港八办”及廖承志的关怀和指导下,东团很快发展到7个分团、5个队和1个

东江流动歌剧团，共有 500 多人。

据统计，在“香港八办”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以各种形式组织的回国服务团达二三十个，它们活跃在东江、珠江、中区、西江、韩江、南路、琼崖等地，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配合东江地区的敌后游击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原越南归侨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张炎，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不满，于 1938 年 1 月回广东南路，召集旧部，提出“保乡卫国”的口号，并出任广东第十一区游击司令，进行抗日斗争。但因蒋介石不信任他并拆他的台，因而他的抗日活动遇到许多困难，如队伍东拉西凑，缺乏训练；缺乏政治人才，装备不足等。张炎渴望得到中共的支持，遂来港面晤廖承志等。廖与中共香港市委研究，决定以香港学生赈济会的名义，派遣以共产党员刘谈锋、黄络思为正副团长由 26 人组成的青年回乡服务团到南路去开展政治工作。不久，在“香港八办”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支持下，服务团通过香港学生赈济会动员在港工人、学生 100 多人到南路去，使张炎的游击队得到加强和扩大，并不断得到发展，成为当时粤南一支较有影响的抗日武装。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侵略东南亚，不久，香港沦陷，“香港八办”的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菲律宾，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其余转移到内地，办事处工作结束。

从上可见，从 1938 年 1 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到 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香港的近 4 年期间，办事处成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与海外华侨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它把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及时地传达给广大华侨，又把海外华侨的高涨抗日爱国热情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作了广泛地宣传报道。它所开展的工作成为抗战时期中共侨务工作重要的一页，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与信访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信访局

毛泽东是党的信访工作的伟大奠基者。他亲自指导创建了党的信访工作机构,提出了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亲自阅批大量的群众来信;他善于通过信访渠道,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发挥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的信访工作实践对后人是永远的启迪和激励。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环境变了,条件好了,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是党面临的新的考验。毛泽东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出发,向全党发出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告诫,并亲自开创了党的信访工作。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

议的群众来信越来越多，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上书毛泽东，陈情述怀，切磋国是。起初，这些信件由毛泽东或身边秘书处理。他很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但百废待兴的局面需要他更多地投入宏观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由任弼时任主任，负责处理人民群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来信来电。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处理人民来信的正式机构。1950年，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改名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由田家英任主任。当年，受理群众来信26219件，接待来访群众260人(次)。

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中央要重视信访工作，而且各级党政组织也要当作一件大事列上议事日程。在1950年底到1951年5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两次批示，要求省、地、县和中央各部门党委和政府党组健全信访机构。

1950年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泽东报告了各地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情况，认为“今后要解决的主要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建议“各地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结案等必要制度”，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亲笔代中央起草了工作指示：“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覆。”次年5月，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分局、

各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专区：“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6月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紧接着，许多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先后设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

在督促、指导各地建立信访机构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为信访工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报告时，指示全党：“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1月5日，毛泽东又批转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信访工作的请示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基本原则，如建立登记、转办、检查、档案等必要制度；领导同志必须经常关心，给以必要支持和指导；群众正当要求，必须认真处理，负责解决，尚不能解决的，必须耐心解释；属于无理取闹者，作出适当处理，等等。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重视信访工作，亲自批阅较为重要的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广大信访干部满腔热忱地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为

人民群众解决了大批实际问题。全国信访工作呈现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要求全党重视信访工作，他本人就是密切联系群众，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光辉榜样。对群众来信，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无论写信人的职位高低，反映问题的大小，只要意见合理，要求正当，他都认真阅批。他日理万机，还嘱身边工作人员每日要挑选几封群众来信送他。他喜欢看来信的原件，重要的地方，还划上记号以示注意，他还经常亲自给来信人复信，有时深夜还在批阅群众来信或写回信。对批转信，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并报结果，不允许走形式。1951年8月27日和8月31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和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办信的同志将来信压了几天，没有及时送阅，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随后，毛泽东亲笔起草了给这两个厂的复信。今天，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过的老同志，谈起毛泽东对人民来信的重视和对信访工作的关怀，依然深有感触，激动不已。

毛泽东奠定了党的信访工作的基石。而今，人们依然牢记着共和国缔造者的谆谆告诫——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制定和完善政策

的重要方法。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内容丰富，生动具体，对于领导工作来说，具有在文件报告中看不到，会议汇报中听不到的独特参考价值。毛泽东善于从群众来信来访中了解社情民意，汲取有益的建议，检查各级组织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情况，完善领导决策。

毛泽东把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作为我们制定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1952年1至4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收到645件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毛泽东阅读了其中部分信，并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有关失业问题的信访综合报告批给周恩来。他写到：“失业问题似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不久，周恩来指定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失业问题的小组，召开了全国各大区及部分省、市同志参加的会议，分析了失业问题，拟定了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失业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分别致信毛泽东，反映了厂内工资制度极不合理，严重地影响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阅后，批请李富春同志研究处理，并亲笔给这两个厂复了信，感谢他们反映的情况。此后不久，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不仅解决了这两个厂的具体问题，而且对华北全区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也作了合理的

调整。工资制度改革后,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北京机器厂、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又分别给毛泽东写了回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汇报了他们的生产成绩和增产计划。

毛泽东注重从群众来信来访中了解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及时纠正工作失误。1952年,河北省一个县的三位农民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村遭受了自然灾害,县里为了争当“丰收模范县”,没有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灾区减免公粮的政策,造成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毛泽东看了这三位农民的来信,十分关心灾区群众的生活,把信转给当时的华北局处理。华北局即派干部协助当地政府调查后,根据这个村的灾情程度,减免了公粮,并召开了该地区受灾村的干部会议,检查了政策执行情况,纠正了类似的偏向。群众激动地说“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这样办!”这年10月,陈云同志送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生关于上海青浦县小蒸乡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给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并嘱:“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①,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

① 指减轻农民负担。

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华东局作了认真研究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征收公粮工作正常进行,纠正了增加农民负担的作法。

毛泽东常常在重大决策前后,要求秘书室的同志送上有关的群众来信,他还多次将有关来信提到中央高层决策会议研讨。每当身边工作人员回家探亲或工作调动,毛泽东总是要求他们写调查报告或经常写信,向他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通过群众来信来访了解到部分真实情况,对克服“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3年初,有人上书毛泽东,反映在农村插队落户知青的困难,要求政府给予合理解决。毛泽东阅后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下达了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6条原则,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普遍改善。

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一位受林彪一伙打击陷害的军队干部的任职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人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一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毛泽东深表痛惜并指示:“亟应予以昭雪”。“文革”后期,毛泽东对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家属的来信作了批示,这对纠正当时干部政策中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当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的黄炎培在延安畅谈古今历史，王朝兴替。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也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听了黄老先生的耿耿直言，毛泽东坚定而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发挥信访工作的监督作用，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无论群众来信提出的是建设性建议，还是直言不讳的批评，他都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高度出发，虚心接纳，认真吸取。

1950年，原辽东省海城县腾鳌区一个军属给毛泽东

写信，对当地的拥军优属工作很不满意，牢骚满腹地说：“高唱优待军属，大字写在墙上，究竟优待什么，我未见到一样。”毛泽东看了以后，当即把这封信转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并指示道：“请海城县人民政府予以注意。此人不满意处，请向他做解释工作。”同年，湖南省湘乡县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四兄弟给毛泽东写信，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毛泽东把这封信转给了湘乡县人民政府主席刘亚南，并在给刘亚南的信上写道：“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毛泽东指示田家英把对共产党不满的信送给他看。他认为这些不满意见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听不到的，对改进工作很有参考意义。

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有群众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还谩骂党和政府。当时，此类信一般转交公安部处理。正在广州召开会议的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嘱田家英专门打电话告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反映不满意见的群众来信，不要当反动信件处理；不要一概都转给公安部。对这种信，处理上要宽大一些。不要看人家说了一两句不满的话，就说人家是反动的。对这种信的处理原则是：如果来信内容还有一些参考价值，可以转给地方参考。如果来信内容没有参考价值，就存起来。”

毛泽东认为，做好信访工作，保证言路畅通，是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三反”“五反”中，一位党员干部反映某省政府积压人民来信很多。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道：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政府就积压了很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不知道，可以想象是很多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他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斗争。”

对领导干部贪图享受，搞特殊化，毛泽东极为反感。凡是反映这方面问题的群众来信，毛泽东阅后都及时予以明确指示，提交有关部门认真查处，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落到实处。50年代初，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影响很不好。毛泽东批转中央办公厅查明后，纠正了公车私用的作法。一些学生和家長来信反映，在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按家長革命历史和职位的不同分为不同等级，这些差别对学生影响极坏，群众颇为反感。群众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为此致信周恩来，提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始终与他们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和提

出的意见,及时地批转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作出负责的处理和答复。

一次,毛泽东同志收到黄炎培先生关于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书后,他两次发电报要苏南区党委负责人派人或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并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并加分析具报”。

1953年5月16日,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些问题。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力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毛泽东同志回信商请民主党派,召集有关方面系统了解情况,协商统一意见,以利政府择决,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一初步的政策规定。

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1990年9月9日,一位1929年入党、曾在毛泽东身边任过秘书的老人来到毛主席纪念馆瞻仰遗容。当人们问起他对毛泽东最深的印象时,老人深情地说:“他是处处关心人民疾苦的人。”老人的话代表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对毛泽东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群众写信反映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毛泽东总是满怀深情,悉心处理。有的及时批转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有的派身边工作人员前往探望;有的亲自

复信慰问。他还多次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有困难的群众。

1953年9月,民主人士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并附了有关材料。毛泽东对这件关系着农村千百万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大事极为关注,立即将材料批给有关领导,并给沈老复信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复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根除血吸虫病的工作进展很快。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血吸虫病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毛泽东读罢这篇通讯,非常激动,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

1963年底,毛泽东看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群众反映》上刊登的上海市精简人员和社会青年反映生活困难的信后,立即批给上海市委领导同志,他指出:“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考虑见告。”毛泽东还把这一期《群众反映》和他的批语转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同志阅,他强调:“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上海市委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拟定了安排意见,使近25万社会闲散劳动力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毛泽东不但把群众来信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实际

问题视为大事，夙夜操劳；对一家一户的实际困难也关怀备至。

无锡一小学教员吴启瑞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生活十分困难，孩子营养不良。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封信，把它转给苏南区主要领导，并嘱以照顾。同时，毛泽东又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意欲开除毛泽东“学籍”的张干，解放后曾为过去的“错误”而惶恐不安。毛泽东听人反映他的情况后，指示湖南省政府说：张干，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作坏事，请派人予以慰问。使张干顾虑顿消。不久，他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诉“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毛泽东很快回信，“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看着那熟悉的字体，张干喜不自禁，百感交集。

1951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师范大学汤藻真教授遗孀的来信，信中说：汤先生突然逝世，遗下三子二女，最小的刚刚8个月，生活很困难。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在信中画了许多提请注意的横杠，阅毕，将信批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说：“请你持信去看此信的作者一次，并去师大找负责人谈一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田家英看望、慰问了她们，调查了她们的生活状况，并与

有关方面作了商量和研究,妥善解决了小孩入托入学等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和普通群众书信往来,为普通群众排忧解难的事例不胜枚举。北京居民杨洁反映生活困难……工程师韩伯林反映住房紧张……长春居民反映粮店买不到白面……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妥善解决。一封封书信在领袖与人民之间传递,一次次排忧解难,使人民和领袖的心紧紧相连。

廉洁自律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不仅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凭他的历史功绩和权力,要为亲属旧谊解决一两个就业、升学、入党的问题,可以说举手之劳,但毛泽东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的纪律,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和组织程序办事,一丝不苟。

解放不久,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谈到对自己工作安排问题的一些想法和要求,毛泽东在回信中严肃而坦诚地说:“希望你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在给杨开智回信的当天,他又亲笔给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王首道写信,明确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儿时的好朋友。1950年5月，他托人请求毛泽东为其介绍工作。对这样一位兄长的要求，毛泽东不徇私情。他在复信中写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森品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也是革命烈士家属。1950年，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推荐他参加工作。毛泽东告诉他：“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但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勤务员，对一些不适当的表达方式，或婉言谢绝，或严厉批评。他多次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要谢绝群众的礼物”，“要向群众宣传我们不作寿，不收礼物的主张。”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不许动员群众写致敬信、送礼品的指示》，并对这个指示作了重要修改。毛泽东写到：“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人力、物力的事情。”

毛泽东以实际行动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的光辉榜样，他永远激励我们：勤政廉政，做

人民群众的公仆。

重温毛泽东关心重视信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教导,我们深深感到信访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心重视下,党的信访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体察民情,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

宋 金 寿

王实味冤案已经彻底平反了。平反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

我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王实味被批判,直至错杀的年代,我生活在抗日的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根本不知道有王实味冤案。解放后我成了大学教师、史学工作者。与王实味冤案结下不解之缘,是从我为李维汉同志整理回忆录开始的。

一、为王实味平反是李维汉的心愿

李维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李老(当时我们对李维汉同志的称呼)从1980年春开始(当时他已80高龄、身患重病),倾注极大的心力,写作回忆录。李老写回忆录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总结正面的、有益的经验,更要总结反面的,需要引为戒鉴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我们为他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为王实味平反,就是李老在写回忆录中提出来的。

王实味冤案发生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洛甫。在整风开始前,洛甫离开延安从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委托李维汉负责领导。用李维汉自己的话说,“卷”进到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中去了。因此,李老对我们说,他不全面写延安整风,而以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为典型,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认

为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即他自己那一代人)和青年人(主要是从沦陷区和大后方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中央研究院正是延安整风的这样一个典型,并要我们广泛地搜集资料,写好中央研究院的整风。

在谈到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时,李老特别强调要把王实味的问题弄清楚。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同时,他还告诉我们,他已经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进行审查。

二、为王实味平反的症结所在

为了弄清王实味的问题,我们广泛地搜集资料,走访当事人,幸好,许多当事人还健在。

最早,我们走访的是李言同志。他是原中央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是直接处理王实味问题的重要人物。1980年4、5月,我们两次走访了李言同志。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是存在的。当时所认为的托派,就是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进行造谣挑拨,破坏团结抗日反共反革命的匪帮。至于王实味怎么成为托派,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关于揭发王实味托派的言论,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那些。有没有别的材料,我们不知道,中央社会部(专管对敌斗争的机关)部长康生也没有告诉过我们。”并说,他所知道的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的档案,从王实味自己的交待中了解的。这就是说,给王实味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材料,当时已经全部公开,而主要依据则是王实味本人在1940年的交待。

批判王实味当时是公开的。名为“座谈会”，实为王实味的“斗争会”，参加的人数多达1000余人，批判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大块大块地有。但有关王实味托派问题说得最具体最完整的是温济泽同志写的《斗争日记》（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第4版）。于是我们访问了温济泽同志，温济泽同志谈到了如下三点意见：

1. 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它看成是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是“反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面，说你们整风，我不相信，你们能改？！他说话很尖锐，态度很不好。我们对萧军提出严厉的批评，也没有说他“反党”。

2. 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它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康生还说王实味是兰衣社分子，根据究竟如何？

3. 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成全、王里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有怀疑的。

这使我们对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李老所说的王实味问题是由他引发的。这一点，受访者，包括李老自己，对于王实味当时在《矢与的》壁报上的文章都说不清楚。只说王实味的发言和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李维汉的。

1981年10月，李老亲自带我们去西安搜集有关延安时期回忆录的资料。我们在陕西省档案馆内找到了范文澜同志的一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在文章的末尾，附录了王实味在《矢与的》壁报上发表的几篇小杂文。这就是现在多处转载的王实味的《硬骨头，软骨头》等杂文。这些杂文，算不得托派的言论，但却是激发对王实味批判的导火线。但从壁报上的文章看，无论当时，更不用说现在，构不成监禁，甚至杀头的罪行。构成为王实味定罪的，只能是托派。

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1981年2月，我们用书信的方式采访了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她在信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王实味同王文

元之间较为详细的情况。她说，我与李芬、王实味、王文元是北京大学的同学，李芬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在一个支部，在北京大学期间关系较好。王实味因为爱上李芬，同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段纯（段也爱上了李芬）发生了冲撞，而被开除党籍。1927年，王实味又因家境贫困，生活困难而辍学。1929年春，我们又在上海相遇。1930年1月结为夫妻。5月王实味在街上偶然遇见了王文元。因为，王文元得知我与王实味结婚，几次到寓所来看过我们。不久，王文元说他要弄一笔稿费，送他爱人去安庆岳母家生孩子，要求王实味帮他翻译一本书的小部分。王实味答应了王文元的要求，为王文元翻译了一天。到王文元来取稿时，才知道翻译的是《托洛茨基传》。刘莹说，“当时我是党员，知道党对托洛茨基取消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因此，我事后向王实味说明了情况，并阻止了王实味与王文元的往来。从此，他也就再没有和王文元来往了”。因此，她认为，王实味与王文元的交往和翻译《托洛茨基传》，“根本不是托派”。这虽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由于刘莹同志与王实味是夫妻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使李老和许多当事人大大地改变了对王实味的看法。

正在这种“当口”。1981年初，我们看到了《双山回忆录》。《双山回忆录》为王凡西，即前面所说的王文元所著。《双山回忆录》写于1957年，但未正式出版。直到1977年才在英国同时出版了中文本和英译本。1980年11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在内部出版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样，王实味就变成了“铁板钉钉”的托派了。

在李老提出要重新审查王实味托派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曾经两次走访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大概在1980年5、6月间，当时我们的意图是想从中央组织部的档案中，了解王实味托派问题的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的王铸、唐佩荣接待了我们。据他们说，根据家属，即王实味爱人刘莹的要求和李老的建议，王实味问

题已立案审查。但他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靠原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同志的意见。中组部没有档案,只有1942年10月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这决定是由凯丰签署,毛泽东亲批的,文字很少,只说王实味因托派反革命,开除党籍 而没有涉及王实味定为托派反革命的根据,也没有有关的附件。他们也觉得为难,要否定,没有否定的事实依据;要肯定,也没有肯定的充分证据。当我们在知道王凡西回忆录中的说法以后,我们再次走访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干审局的同志也知道了王凡西对王实味的看法,他们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这样看来,为王实味平反的关键是摘托派的帽子,不摘托派的帽子,就不能给王实味平反;而要为王实味平反只有用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推翻”王凡西在回忆录中的结论才行。这样,王凡西对王实味下的结论成了为王实味平反的“症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李老和有关方面为难,不能为王实味说话。

三、“五人反党集团”的平反

由于王实味的问题,当时还涉及杨家岭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纲)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和中央研究院的潘芳与宗铮两对夫妇。他们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以后,从1942年9月到11月,在中央政治研究室被开会斗争了72天。他们之间本来都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仅仅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芳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想法,而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实际上,这一集团是由康生“人为地制造的”。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即中央社会部)训练班上的报告中说:

“我再把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

破。在反王实味斗争中间，七斗八斗，斗出四个人来（潘芳、宗铮、成全、王里），从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四人和王实味是一起的。然而，王实味那时候，他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另外，有时他也露一点头，拉些人，但是，这时这些人的材料不怎么具体，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来以后，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赞成。同情他的反革命思想方法，这样厉害。所以斗完王实味，接着斗潘芳、宗铮，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芳、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芳。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因为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打了一个大迂回，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后加上社会部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以后于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和他们是一把子兰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兰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有利，对成、王也有利，开始成、王不承认，以后才承认。”“……反了72天，这样我们就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潘芳、宗铮已讲了托派思想，反党活动，但这种活动谁告诉他的？他又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潘、宗告诉他的。我说好，他们反省就好，你找潘、宗来谈话。他把潘、宗找来，于把潘、宗找来大骂一顿，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一了个托派思想帽子。他们看到利用矛盾，王实味的矛盾，有于、成、王的矛盾。利用成、王搞潘、宗，他们一个个暴露……”

康生的这个报告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未经整理，因此文字不通顺，有的地方也不连贯，但他所说的斗争策略，即“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却说得明白、清楚，活画出这个专门玩弄阴谋权术的政治小丑的面孔。当我们把找到的这个报告给李老和一些老同志看时，他们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访问了王里、潘芳等身受其害的老同志，王里告诉了我们，他们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的过程：

1942年5月，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说王是托派，他所写的《野百合花》是反党的。

1942年7、8月间中央政治研究室学委会召开政治研究室全体党员大会，追查、批判我们和宗、潘、王的关系，我们都如实地说了。

1942年9月，在中央研究院召开大会批判我们和宗、潘、王，把五人的关系定为“五人反党集团”。其主要内容是：①王实味是托派，五人的关系都是托派关系。②把五人之间的接触都冠之以“托派组织活动”。把五人之间的几次见面称为“会谈”；1941年除夕，我和成全请宗铮、潘芳、王实味吃了一餐晚饭称为“除夕会谈”。说五人之间的闲谈或者个人言行都属于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活动。例如我向宗铮、潘芳、王实味说了对王明、孟庆树作风的不满，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首长”，成全向毛主席写了“整顿人风”的信也是反党的重大罪行。③说王实味写《野百合花》的材料是我供给的。④突出的问题是认为王昆仑是特务，于是追查我^①、成全和王昆仑的特务关系。

大会批斗我特别厉害，硬说我是成全的“领导”，原因是我不承认批斗会那套唯心推测的东西，就连我不哭也成了批斗会特别恨我的重要因素。

这个大会后来被称为72天大会。大会追查、批判的内容就是如此。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1945年5月，中央政治研究室学委会送给我一份审查结论。标题是“五人反党集团”，结论的主要内容是：我和王实味组织上没有关系，思想上受王实味利用（成全结论内容相同）。

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做出结论，经过了三年的批判和追

① 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

查,结果还是一个思想犯。

1945年6月在枣园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你和成全的问题“是黑夜里的白刃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毛主席的看法显然同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学委会交给我的正式结论上的性质是不同的。可见他们未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

1942年在延安打出的“五人反党集团”一案,对于我和成全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1)在1943年抢救运动中,以逼、供、信的高压手段,迫使成全在边区政府大礼堂犯了假坦白的错误,给他的心灵以巨大的创伤;在十年浩劫初期,他在受迫害中又联系到往事,深感又遇上说不清楚的问题,迫使他走上了绝路。

(2)我在延安遭受了三年批判,戴上了反党的帽子,身体上、精神上也受到不少摧残;十年浩劫中,又以是王昆仑名下的“特务”为罪名,只凭中央一办王昆仑专案组一张电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就把我“隔离审查”,隔了十年才做了历史无问题的结论,使我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现仅保留下残生。

访问王里同志使我们深感冤假错案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真是遗害他们一辈子。不久,王里去世。

潘芳说,这个冤案,对我和宗铮来说,至今没有了结:

第一,“五人反党集团”是上了书的。1942年11月,毛主席根据汇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就点了“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的名。14年后,1956年春节期间,毛主席对陈伯达说:“王里、成全是青年,怎样能说他们是‘反党集团’呢?以后不要再提反党集团了”。这是毛主席在小范围内说的,是李克农同志给我部少数同志和我传达的。在林彪、江青横行时,不但给我带上“老反党分子”帽子,而且祸及我的儿子(在四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使他初则被撤职批斗,后仍在工作上政治上受歧视,前后共达9年之久,到1979年4月才给予彻底平反。

第二,1946年中央社会部分别给我和宗铮做的结论,既没有

提“反党集团”，但是也没有加以否定。因此，实际上是把我和宗铮的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或作为严重政治问题来理解和处理的，这在解决我和宗铮的党籍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1946年的结论上说，党籍另议。1948年中央社会部在河北平山东黄泥解决我的党籍问题时，中央组织部指示，要通过群众，就是说要重新入党。我接受了中央组织部的决定，于1948年11月重新入党。宗铮认为应象王里、成全一样恢复党籍，不同意重新入党。因此，她的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53年2、3月间，中央调查部的前身，总参联络部的一个局，敌情总署的党组织未经支部大会讨论，即决定开除宗铮党籍。在宗铮表示坚决不同意后，亦未见进行复查。这些都是党组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解决的。现在我们部正在准备解决这些问题。

潘芳同志当时还心有余悸，未能畅开思想，对王实味问题还有顾虑，保持了原有的调子。

根据以上情况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五人反党集团”的错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2月2日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芳、宗铮和陈传纲、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

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至少说明王实味没有组织集团,有问题,也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对王实味问题的解决也是有利的。

李维汉、罗青长等老同志对“五人反党集团”的解决有功劳。但在李老的回忆录中未提及“五人反党集团”。对此,李老是有话的。因为定“五人反党集团”的罪,在反王实味斗争以后。而李老在反王实味斗争以后,即1942年9月离开了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秘书长了。因此,没有参与其事,根据他写回忆录的原则,不写这一段,因此没有提及此事。

四、李维汉的遗憾

我们在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李老起草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初稿)约12000字。李老看了觉得不行,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981年6月,我们写出了第二稿,根据李老“既要写整风,又要写中央研究院”的精神,题为《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约35000字。当这个稿子送到李老之手,李老因病重住了医院。他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你写的《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资料丰富,多数章节也写得很好,建议以你的名义发表,而吴良珂同志根据这篇修改成的那件,则作为我的回忆录。这样相得益彰。上次见面时已谈过。

“但《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还要你作些修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有以下诸点:

“①整顿三风的主要目标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已经过十年的批判,再来一个总清算。具体到人,主要是当时的中年一代,而不是青年一代。因为刚一发动,就出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所以他们反而走在先头。但中年一代后来补了一课,

学两条路线——《六大以前》、《六大以后》。我不是要你这样写，只是说明当时的情况。

“②不可说当时延安的学校干部教育都是教条主义的。你只要找到中央党校、抗大、陕公的课程表看看，就会明白，其中有许多课，如统一战线、游击战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等，不能说，至少基本上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的。即以中央研究院论，它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教条主义的要求下，改建起来的。可能各个研究室都在这个要求下努力前进的，例如教育新闻两研究室的方向就是这样的。当然程度可能有不同，但改造不能一声喊就做到，这是要肯定的。因此只要方向对头就是有希望的。原来的马列学院可以说主流是教条主义的，但陈云同志教党建，就决不是教条主义的。

“③最后一部分经验总结写得不理想。我觉得不是从中央研究院整风实践经验出发的，实事求是地把它概括起来。如果除去某几处提到中央研究院，就成了一篇抽象地泛论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

“④……

“⑤王实味是托派，在报纸上发表过没有？我觉得在写批判王实味时，只提康生说他是托派就可以，不必扯开。至于批判王实味是要写的。是否复查王实味的托派帽子，要问过主管机关。‘五人反党集团’不写为好。

“以上各点都供你再考虑。”

……

这里我大段引用李老信中的原话，一是说明李老对回忆录的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二是强调李老认为对王实味的平反，不是由他个人来作决定，而要由组织来作出决定。根据李老的意见，我们把王实味问题作为一个“悬案”，意思是王实味的平反要由组织来作决定。这个所谓“悬案”，它的基本精神，包含了李老为王实味平反的意见。“悬案”明确地强调了三点基本思想：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

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这样，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的冤案。

李老每写一篇回忆录，都要将稿子送有关同志，请他们审阅，提意见。例如，《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的二稿，马洪同志看了以后，就批评说：“这不还是两条路线吗？！”（指的是由我起草的第二稿）。当几经修改，最后由李老认定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讨论稿）的稿子送到有关同志和中央主管部门后，主管部门的同志认为，“悬案”的提法是逼他们表态，建议发表时删去。李老尊重了主管部门的意见，最后未发表。这样，对王实味问题的叙述上，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调子。1983年11月，经李老最后修改定稿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一文，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首次发表。虽然王实味案未能解决，但当时李老仍把王实味问题挂在心上，而且成为他的一块心病。1984年7月，李老在临终前，把解决王实味的问题嘱托给了温济泽同志。

五、拙作《关于王实味问题》

李老为王实味平反的真实意向和王实味家属的希望，迫使我动笔写出了《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于1984年8月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党史通讯》上。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主要意图是想从历史实际出发，为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当时我认为对王实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应该批判的，但“托派”的问题应该否定。所以，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指出了王实味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说明王实味对延安及边区的看法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的，因而是错误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王实味的主要错误，也就是指出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具体表现。这两部分，着重地说明对王实味的小资产

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的批判是必要的。文章的重点是第三部分，即批判和斗争王实味的经过。就是说，王实味怎样由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从思想斗争转变成政治斗争的。在我们为李老整理回忆录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王实味是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说得明白一点是为了运动深入的需要而被逐步升级成为“托派分子”的。前面我们提到的李老的信，也明确指出，整风本来不是对青年人的，而是对李老他们一代中年人的。从我们对整风运动的研究，和许多老同志的看法，都认为整风主要是针对王明等少数人的。虽然，从遵义会议起已经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真正肯定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即使这样，全党对毛泽东和王明等人的看法在认识上仍然很不一致，而王明直到整风以前，仍把自己打扮成中共领袖，例如，他在1940年仍在延安出版和讲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并且以“理论家”的身份在延安到处作讲演。因此，在许多当时的青年人眼中误以为王明才是“理论家”，而毛泽东同志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只要仔细研究毛泽东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整风期间的讲话，都可以觉察到中心是要剥王明的画皮，指出他的教条主义嘴脸。从高级干部整风到全党整风的普遍发动，主要目的也是批判教条主义，以贯彻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但是，广大的青年和党的一般干部，甚至非常高级的干部，不很理解，甚至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同志发动整风的真实意图。当延安整风开始发动的时候，正如李老说的，青年人“反而走在前头”。青年抢先一步把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提到整风的高度，从而干扰了大方向。所以，毛泽东等出来“纠偏”，首先同王实味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交锋。正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毛泽东从1942年3月开始，先后以发表谈话、发布中央有关整风的决定、召集文艺座谈会等各种方式来刹住这股“歪风”。但是，这股风不怎么好刹。这样，王实味的在历史上的“尾巴”，即同托派的关系被提出来了。揪住了这条

“尾巴”，既打了王实味，又刹住了“歪风”。不仅如此，由王实味的思想斗争又引出了中央党校反吴奚如（被错打成叛徒）斗争，从王实味、吴奚如，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全党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康生等人借此在党内大搞逼供信，并导致了1943年的“抢救运动”。李老在我们整理延安整风的回忆录时还说过，反王实味是一个“插曲”。但这的确确实是一个大“插曲”几乎变成全党普遍整风的正题。所以，李老在信中说，后来又给当时的中年人“补”上了一课，直到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算完成任务。这就是说，王实味问题对延安整风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

那么，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我在文章中，把它总结概括为两方面：

一是历史的：王实味在会上承认，从1929年开始，与托派有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训》（被托洛茨基修改过的）和《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的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直到1936年还与托派分子陈清晨通信。认为陈清晨、王文元等托派分子的“人性”是好的。对于这些问题，王实味曾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作了交待。

二是现实的：王实味平时在中央研究院的同志中间散布过：“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的走狗，是反法西斯的”、“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是正确的”、“‘八一宣言’与托派的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等等。王实味部分地承认了这些揭发。后来，在批判过程中，又把《里百合花》等文章和他在整风发动时散布的言论也归结为托派的思想 and 行动。

对上述问题，我们在为李老起草回忆录时，就分析过：第一，历史上的问题，不足以定为“托派”。因为，历史上的问题，早在1940年王实味自己已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交待；中共中央组织部，没有把王实味作为托派对待。王实味自己在《矢与的》壁报上还振振有词地说：“一个人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

来鉴定。一个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王实味的《附带谈一谈我底骨头》）这就是说，王实味自己认为他不是托派，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没有认为他是托派，他在政治上是充分自信的。第二，他在同事中间散布的一些言论，充其量是托派思想；托派思想也不足以定“托派”罪。第三，王实味到延安以后，虽然大家觉得他怪癖，但工作是努力的，在翻译马列著作方面作出了贡献，无可非议。第四，至于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提到的那句话。我们也作过分析。因为，王凡西写这个回忆录是为托派说话的，要证明：托派不但没有罪，而且托派的思想 and 观点是正确的，组织也是合法的。全书的主导思想是为托派表功。但是托派的人数在中国少得可怜，因此，王凡西对凡是从事托派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提到了，但对王实味只说了这句话，没有在他们的活动中出现过一处。王凡西也是出于他的需要把王实味拉上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猜测，后来证实，确实如此。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即对王实味问题的初步评价。这部分表明了我在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是李老对王实味问题看法的进一步发挥，实际上说出了李老当时没有公开说出的话，把它公开了。

六、刘莹的再度申诉

对《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关注首先表现在王实味的家属，即刘莹及其子女，以及他的亲属。

刘莹同志当时也已年近 80 高龄的老人了。她在看了文章以后，觉得有人为王实味说了公道话。她派她的儿子王旭枫和王实味的一位侄子从远道到我家表示感谢，并且送来了她在 1985 年 7 月写的《奇冤今未雪，向党诉不平》的申诉（副本）。我当时表示，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依据我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

的本份；但能否为王实味平反，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能为力。我收下了刘莹同志的申诉，同时，我告诉他们，不负责转交。说实在的，我也无处去转交。他们表示，由他们自己去送有关部门。

刘莹同志在申诉中，以她同王实味在去延安以前七年的共同生活，叙述了王实味最终“不顾父辈妻子，儿女之累，毅然带领开封的爱国青年，冲破重重的阻挠，投奔延安，寻求抗日救亡的道路”，证明“王实味这种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绝不是托派分子所能做到的。申诉中，当然还就她所知道的王实味与王凡西、陈清晨的关系作了解释。申诉最后说：“我要求主持落实政策的领导同志，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实事求是地给冤死者王实味平反昭雪，使英灵不再是屈鬼冤魂，驱散为数众多的关注王实味问题的人士心中的疑团（包括中央首长在内），解除王实味家属和亲属思想上政治上的压力”。但一个普通的老人，而且又是家属，她的申诉究竟有多少份量呢？这个问题，我没有打听过。

七、王实味平反的转机

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为王实味托派解扣的就是定王实味为托派罪行的两个主要关键人物之一的王凡西。

虽说，《党史通讯》是一个内部刊物，但实际上在国外，同样能找到。王凡西说，他“在海外一间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了中共出版的一本《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其中有一篇专谈‘王实味问题’的文章（作者宋金寿）”。“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材料，我想给海外的读者们，特别给对于王实味其人及其思想怀有兴趣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这位亡友因以遇难的见解。同时，我要以一个被牵涉在内的证人资格，向国内对此案有权审议的人们，提出我的要求和申诉”。

王凡西在其《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中，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他同王实味从192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的

生活起，一直到1931年5月王凡西被捕入狱，以及1934年释放出狱，同王实味交往的有关情况与听闻。在谈到关于托派关系的问题时，王凡西写道，“王实味与我在上海来往了大约一个整年——从1930年春天到1931年春天。他为译书忙，我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忙，彼此见面次数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达10次，除我之外，王实味当时与之来往的，据我所知，只有陈其昌，即延安整风时多次提到的陈清晨。陈其昌当时也因赞成反对派而被开除，他属于陈独秀派。不过王实味却从未加入托派，既不曾参加我所属的‘十月’派，也不曾参加陈其昌所属的‘无产者’社。政治上他是较多同意托派主张的。特别是对于当时中国局势的估计：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呢，还是革命业已失败，他认为反对派的看法比较正确。”“不过这些并不是他与我偶尔会面时谈论的主题。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那时我正约集几位朋友一起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王实味英文程度好，我请他帮忙译一点，他答应了，译了两章《纽约》与《集中营内》。这件事，据后来延安文件上说，王实味曾经自动向党组织报告了的，又说他曾替托派译了列宁的遗嘱，此事我却不知，可能是经由陈其昌的关系，发表在王独清编辑的公开杂志上的。王实味与我，以及他和托派的往还，据我所忆，尽于此矣”。虽然我在《关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中已经提供了王实味与托派交往的主要情节；但王实味、刘莹和王凡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讲的具体情节，都合情合理，不能不说，他们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王凡西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要以‘被告’的证人资格，向可能‘重新审查王实味一案’的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陈述：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堪确切。正如我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

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①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更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希望我这两项证言能多少有助于王实味最后一关的平反,更希望王实味的平反又能有助于他今天多半还存活着的妻女的遭遇。”

王凡西的这一个证词,确实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

王凡西的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2月,刊登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5月号。当时,这类杂志在我校(北京钢铁学院,现改为北京科技大学)是根本找不到的。文章到我手,已经是1986年6月的事了。因为有了这个证词,出于责任心,我在1986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写了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案。当然,作为无名小卒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奢望。信发出之后,没有任何回音,更不知道是否引起了注意。

总之,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条件至此已经完全具备了,问题只是时间,何时才能得以落实?!

八、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信息

为王实味平反,不仅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关注和重视。1986年4月16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文艺、电影、电视界部分同志开了一天座谈会。会上,胡启立同志说,“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

^① 着重号是原有的(作者注)。

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案、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法不能再搞了。”^①

胡耀邦同志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同中央书记处谈王实味问题及其经验教训呢?从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起,就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为冤假错案平反的工作。1978年12月,胡耀邦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更加重视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仍然把平反冤假错案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就是由胡耀邦亲自签署处理的第2000封人民来信,使他的错案得以平反的。当然在1986年提出王实味问题,多少有些偶然原因。

王实味案曾一时轰动延安,当时,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多少也是了解的;但时隔40多年之后,不可能记得很清楚。我冒昧猜测胡耀邦也可能看了我在《党史通讯》上的《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原因是《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正好同胡耀邦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王稼祥的文集而写的一篇文章:《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发表在《党史通讯》的同一期上。当然,这是一个偶然性。但正是这种偶然性,引起了胡耀邦重视和关注王实味问题。作为佐证,胡耀邦关于王实味案、胡风案、“三家村”案的总结,用了“搞运

^① 参见《创造民主、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瞭望》1986年第22期。

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提高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的提法,在胡风案、“三家村”案中,并没有这种提法,而我的《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却写得十分明白,而且作为三个阶段明确地提出来了。

王实味案、胡风案、“三家村”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王实味作为一个文艺家、翻译家尤其是作为文艺家,在文艺思想上不是没有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思想的。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除了有其积极的一面以外,也不是没有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对其错误的东西进行适当的批判也是应该的,但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加以组织惩处是不对的,最后把他杀掉更是错误的。对于后一点,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过。

胡风(原名张光人)1922年参加共青团,1925年终退团。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恰好同王实味编在同一个小班,都爱好文学。1927年至1928年,胡风曾在国民党省党部和剿共军担任过反动职务、写过《反共宣传大纲》,有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站在进步力量方面,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斗争,对文艺工作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对进步的文化事业有过贡献。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1954年7月,胡风在《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改造思想、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成是反革命的,而且并未公开宣传,只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所以,也不能据此作为他的罪状。1955年5月,以胡风给舒芜的信,揭露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此后又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风作出刑事判决,并先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也作了判决。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共触及2100余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分子的 78 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 23 人,逮捕的 92 人,隔离的 62 人,停职反省的 73 人。1969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判胡风为无期徒刑,收监关押。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 年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79 年 4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表示对 1956 年的判决不服。中共中央责成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公安部党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复查。1980 年 7 月 21 日,上述三个党组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提出了复查结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予以平反。”同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

“三家村反党集团”也是由文艺问题引起的。1961 年,邓拓(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1944 年在晋察冀边区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吴晗(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民主人士)和廖沫沙(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受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的约请,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取名《三家村札记》,发表一些讽喻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文章。1965 年开始,《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相继刊载江青、关锋、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对《三家村札记》的杂文进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打击和迫害,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由“三家村”牵连“四家店”(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由“四家店”发展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击了“一大片”。直到 1979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邓拓、吴晗、廖沫沙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三个案子的共同教训就是胡耀邦指出的“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的作法是要不得的。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家村反党集团”先后已于 1979 年和 1980 年正式作出平反决定。胡耀邦说三个案子“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为王实味冤案平了反,所缺少的只是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或组织手续。

胡启立同志向知识界公开中央对于王实味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共中央对王实味案是十分重视和关注的。它为王实味的平反开了绿灯。

九、为王实味的初步平反

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选用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捕人、杀人”的问题时,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说话。”^①毛泽东在这时为杀王实味说了几句抱不平的话,多少包含了一点自我批评的意思,但加给王实味的仍然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对王实味作注,曾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邓培、曾宪新两位同志到我这里征询有关王实味问题的注释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提法在延安是怎样提的,有什么根据?二是,怎样确定王实味的身份。我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的基本情况,强调指出,王实味在延安整风中犯事,1942年10月所作的组织结论是“托派”、“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在我们找到的康生的一些讲话中,有提到“复兴社分子”、“国民党兼差特务”的帽子,但从引文上看,康生所指的是“五人反党集团”,因此,既可以说是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6页。

给王实味的帽子,也可以说并不是加给王实味的帽子。简言之,在延安时期,大家所知道的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

在谈到王实味的身份时,我着重谈到了王实味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马列著作的功绩。我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不多,造成党在理论准备上的不足。翻译马列著作最多的要算延安时期,解放社先后出版过《马恩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等。这些马列著作,基本上是由编译局编译的。1938年5月成立马列学院编译部时,王实味是继何锡麟、柯伯年之后,第三个到编译局的。直到马列学院改组,王实味一直在编译局翻译马列著作。据延安《解放日报》在批判他时说,王实味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列著作,自以为了不起”。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当他们问我具体翻译了什么?我说,很抱歉,我没有查过。后来,我专门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室、图书馆作了具体查阅和统计。据查证:王实味翻译的马列著作,有《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退两步》等,共计65万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有许多没有译者的名字。上面的统计只是有王实味署名的部分,未署名的肯定还有。根据原编译局的同志介绍,当时上级给他们的任务是每天翻译一千字,王实味是完成任务较好的一个。

同时,我还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了王实味在30年代翻译的西方小说、戏剧。查实的有:《珊拿的邪教徒》(原著德国的豪普特曼,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萨芙》(原著法国的都德,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奇异的插曲》(原著美国的奥尼尔,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另外,王实味还为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写了一本《休息》的小说。这本小说,以他自己在中学毕业后到驻马店邮局当“邮差”的实际生活为素材,用写书信方式为体裁,反映一个“邮差”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痛苦。最后一封信,为绝命书,表示再也不能忍受精神上和物质的压迫,而去永远“休息”了。

与这本小说同时出版的有沈从文的《旅店及其他》、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丁玲的《一个女人》和徐志摩本人的《轮盘》等。

1986年8月,当《毛泽东著作选读》正式出版时,在王实味的注释条中是这样写的:“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①

从上面我们介绍的情况看,王实味作为翻译家是当之无愧的。我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查阅王实味翻译的著作时,编译局的同志说,我们现在出版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也是以延安翻译的马列著作为基础的。我们在访问王学文时,王老说,建国后出版了他同王实味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其中包括王实味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王老还把应属于王实味的稿费交给了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同时,王实味在30年代翻译的西方小说、戏剧,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注释中,没有提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关于这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注释不涉及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因为毛泽东的讲话中没有提及“托派”,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就“国民党探子”、“特务”作出结论。因此,“据查不能成立”,实际上给王实味摘掉了“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这个注释是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决定,报经胡乔木同志,并表示同意的。所以,可以说已经为王实味作了初步平反。但不是彻底平反,因为王实味的“托派”帽子,没有摘。

十、王实味的最终平反

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中,对王实味作了实事求是的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价,并为他摘了“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之后,一些学术工作者在文章中说,王实味得到了最终的平反。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1. 王实味的罪行,主要是托派分子,加罪于王实味,因而被杀的罪名都是托派分子,因此,只有为王实味摘掉“托派”的帽子,才能说最终为王实味平了反;2. 还缺少一个必要的组织手续,或者说法律程序。王实味案虽说是一个错案,但它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经过一定组织程序处理的,因此为王实味平反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才能最终落实。所以,象《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注释那样的做法,还不能说是履行了必要的组织手续。

由于种种原因,争取经过必要的组织手续为王实味平反的难度是很大的。

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温济泽同志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对于为王实味的平反作出组织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温济泽同志在受李维汉嘱托之后,一直为王实味的平反而努力。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作出为王实味初步平反的注释,有他的功劳。在那以后,他多次写报告向有关部门为王实味申诉,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且提出了三条具体意见:1. 为王实味摘“托派分子”的帽子,平反昭雪;2. 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 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可以由温济泽组织),宣布正式平反,并发布一个消息。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始终没有能够到达能够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年夏天,通过原中央组织部领导同志之手,把申诉书送到了宋平同志的办公桌。宋平在审阅以后,批示:交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一局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同温济泽同志取得了联系。经温济泽介绍,公安部一局负责这个案子的两位同志在1988年7月14日找我,要我协助,为他们提供王实味问题的情况。我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王实味问题的基本情况,并提供了必要的文字资料,供他们重新审理王实味问题作参考。

公安部一局的同志具体怎样审理这个案子,我不清楚。只知

道,到1989年“五一”以前,已将案子审理完毕,并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圈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一直到1991年,有关的部门和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据透露:在对王实味平反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划了“○”,表示同意;但在恢复王实味的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个人划了“○”,是绝对少数。因此,最终给王实味平了反,但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定,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两点:1. 公安部的决定只为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平反昭雪,未涉及1942年王实味被批判和斗争的问题;2. 是否恢复王实味的党籍,不属公安部复查和决定的范围,需要有关组织部门另作决定。据了解,目前还没有党的组织部门为王实味作是否恢复党籍的复查的处理。但在公安部的决定中,称王实味为“同志”,是实事求是的。

1991年2月,公安部正式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至此,历时50年的冤案,经过12年周折,最后画上了句号。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几个问题

郑 谦

教育革命或教育改革,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第十条即为“教学改革”。其具体内容: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这段文字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尽管以后的实践多方面超出了它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虽然在1966年就被提出,但直到1967年间才有一些零星的、时断时续的试验。在1969年至1971年间的斗、批、改运动中,教育革命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展开,并达到高潮。1972年至1973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清理中,教育工作中一些“左”的和

极左的观点、做法受到遏制和批制，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被提出、推广，并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欢迎。在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左”的和极左的思潮再次泛滥。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转机 and 进步。但是，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旋即被1975年底至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中断，教育领域重新陷入一片沉闷、紧张和荒谬的局面之中。

1969年至1971年间，处于高潮阶段的教育革命，涉及到教育领域里诸如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学校布局、教材教法、师资队伍、学生组织等所有方面，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内涵与核心。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出在经历了“大破”、“大乱”之后，“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阶段所要“大立”的理想社会的某些一般特征；暴露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党分子，打着教育革命的幌子，推行极左路线，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学校管理干部，毁灭中国教育的种种罪行；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在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抵制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正是这种努力，大大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工作的破坏。

对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的“革命”或“改革”，是这场教育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了解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场教育革命的内容和特征。

“三结合”的领导体制

“斗、批、改”运动中的教育革命，象当时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一样，也把“领导权”、领导体制的问题放在了第一位。这一问题的提出，除有“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夺权”的一般前景外，也有教育领域中的一些特殊原因。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

发展,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以及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他对教育领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也错误地估计了我国教育界的状况。而正是这样的错误估计和判断,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直接前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别有用心地封锁、歪曲了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科学的意见,利用了他在理论上的某些失误,并将这些失误推向极端,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在教育领域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在1966年8月的《十六条》中就已经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很快就因形势的发展而落空。1967年初“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的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规定,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这种三结合的提法和体制,一直沿用到1968年上半年,但实现这种领导体制的学校并不多,而且大多还都有反复。

自1968年下半年起,学校的领导体制尽管还保留着“三结合”这种外在的形式,但其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8年7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

入各学校。”^① 据此，继清华大学之后，至8月29日，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院校。自8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在一些武斗严重的学校，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委会、整党建党，教育革命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第二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转述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章中，姚文元以毛泽东著作、语录权威诠释者的身份公然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断定解放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说“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文章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领导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三结合形式虽然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已经变为工（军）宣队、革命师生以及革命领导干部，姚文元的文章中称这是“工人、战士、学校中革

^①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20页。

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8月25日的《通知》以及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改变了派工、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初衷，把它们的任务由短期的、临时的平息武斗、稳定形势、实行大联合，发展为长期的、自始至终地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在这种新的三结合领导体制产生初期，工军宣队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核心领导”的地位。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开始进入这个领导核心。

根据毛泽东有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自8月底起，陆续向农村各类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实行对本社队范围内中小学的管理。贫管会成立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

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当一些学校还忙于实现“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或整党建党时，工宣队、贫宣队等发挥了主要的、核心的作用。随着学校革委会的成立，特别是校内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宣传队的核心作用下降了。这种下降的表象之后，是这种领导体制与领导对象的矛盾。

学校中党组织普遍恢复以后，革委会实际上成为党委(支部)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或办事机构。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内，除了宣传队代表外，还有学校原来领导成员、教师以至学生党员的代表。这些人中，起码有一至二人(甚至更多)进入了“核心小组”的圈子，而其中的原校领导则往往成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这时，虽然有人在私下或潜意识中还希望强调党员出身或职业区分的政治意义，但在当时极左思想已经有所收敛、退潮的大背景下，这些观点所构成的政治压力已大为减轻。虽然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与运动初期于此，重新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学校知识分子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境已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宣传队以往那种政治上不容置辩的权威地位也在无形中逐渐下降。一个很明显的事

实是，“九大”以后，报刊文件反复强调的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

矛盾还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虽然说“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已在教育界流行多年，但教育科学本身内在的规律和要求却也在时时、处处顽强地表现出来。其结果，不是外行变成内行，就是内行取代外行，否则就是学校工作的停滞或混乱。当教育革命全面铺开以后，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一系列专业性强、知识含量高的领域里的优势便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翘尾巴”的现象，一是工宣队作用的下降。

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章程，是导致宣传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在学校内部，各地宣传队根据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经验，机构设置比较统一，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一定的章程。但是，各学校宣传队却往往缺乏统一的、一贯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广州地区在1968年刚刚派出工宣队的时候，曾设立过“广州地区工人宣传队领导小组”，但到1969年2月底，领导小组就不宣而散。至4月，广州市革委会政工组虽然下设一个“工宣办公室”，但市革委会却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研究工宣队工作。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宣传队已无足轻重，宣传队的历史使命已接近于尾声，人为维持的只能是形式。

导致工宣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来自他们的派出单位。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随着国内形势逐步趋于安定，工业生产、战备工作大规模地、全面地、紧迫地开展起来。不少工厂因任务紧张把派到工宣队里的骨干力量抽调回厂，有些工厂把派出工宣队看作是工厂的额外负担，因而派出的人员有不少是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合同工和老弱病残人员。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1968年下半年确立起来的

以宣传队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到1969年下半年以后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队在学校中的作用下降，而学校内原领导干部、教师的作用逐渐上升。据1971年初兰州市中小学反映，当时的的问题是工宣队的领导普遍削弱，每个学校的工宣队一般只有2至3人，有的只有1人，个别中学还没有工宣队。学校的党支部成立后，有的人便认为工宣队“可有可无”了，不是领导了，有的学校出现了工宣队“设事干”的现象。在浙江省，有的学校还发生了校革委会与工宣队发生冲突的事情。

学校领导体制中的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变化很快就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成是“右倾回潮”，“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1970年7月22日，由迟群主持起草、经陈伯达、姚文元多次审改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对此作出了反映。该文称：

“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①

该文以此为对立面，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对于如何才算实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该文语焉不详地写道：“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诸如此类的说法，反映了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极力鼓吹的一个观点，即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歪曲为一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对知识分子实行在政治思想

^① 《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上的领导,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能通过共产党来实现这一基本原理、否定了党对学校的领导。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概也感觉到了这种含混,模糊的提法难以自圆其说,在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他们对这一提法又作了一些改动。《纪要》中,在谈及“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时,加了一个新的补充:“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且不说张、姚等人煞费苦心混用“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的伎俩和意图,仅就这个补充本身看,它也使张、姚等又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既然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那么,工宣队在学校党组织已经恢复的条件下,又该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呢?

由于领导体制上的这些变化,1970年以后,驻学校的工宣队逐渐减少。据1973年10月统计,全国352所高等学校中,还有工宣队员4892人,比1971年7月的12804人减少61.8%,其中87所高等学校已无工宣队,约占当时高校的1/4。在农村,多数进驻学校的“贫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也已形同虚设。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各种学校内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和健全。

这一本来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发展过程,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激烈反对和抵制。1973年10月后,迟群等人打着“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旗号,在清华大学发动了对全国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被列为“回潮”的主要罪状之一。1974年2月2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河北省威县辛店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管理学校的经验,强调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贫下中农对农村学校的管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批判的反动。运动中,许多批判极左、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都受到猛烈的攻击,一些极左思潮的作法又被恢

复或部分恢复。1974年6月6日,《光明日报》报道,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加强了驻校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北京市委也向17所高等院校增派了400多名工宣队员,各院系两级领导班子都有工宣队参加。1974年间,北京、上海、辽宁、广西、新疆、山西、内蒙、四川、青海等省、市、自治区或召开工宣队、贫管会工作会议,或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调整、充实和加强工宣队,贫管会的力量。一些省、市还健全或重建了各级工宣队的专门领导机构,一些学校的领导体制又部分地恢复到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的状况。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内在的矛盾,这种恢复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没有持续多久。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体制

对教学体制的改革,也是教育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时,这一改革被认为是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教学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教学活动的直接领导,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生产、科研实践,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及其编者按,已经勾勒出了这种新体制的雏型和方向。9月,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以后,各地相继仿效举办这类学校。至1968年底,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几乎已经成为把学校交给工厂、街道办的代名词。

196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街道办的建议,同时开展了“城市的中小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随后,该报刊登了大量支持上述建议的文章、来信以及一些地方和学校的经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许多城镇中小学改由工厂接办或“定厂办学”,上海、北京等

一些大中城市经试点后,将小学改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

一些大型企业自办附属中等技术学校,培养自己所需的专门人才,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把它作为“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简单地推向整个社会,把中小学及一些大学交给工厂、街道去办,实际上从总体上否定了学校独立存在的意义,加重了工厂的负担,降低了教学水平。这种“开门办学”的结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的“门”。这是对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曲解和庸俗化。这种做法不久就被一些新形式所取代。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种学校经过普遍的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社队挂钩,以及在校内大办工厂、农场,建立校外学工、学农基地等活动,初步形成了另一种开门办学的新体制。这种体制与1968年下半年和1969年初的做法明显不同。它不再一概要求把学校交给工厂、街道去办,实行厂校合一,而是在“开门办学”这一总的要求之下,在保留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独立存在的条件下,以校办工厂、农场、厂校挂钩等多种形式,实现学校与社会的结合。

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中,以权威的形式系统地提出了教育新体制的原则和设想。文章介绍了该校宣传队带领师生走“五·七”道路的经验: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创办实验工厂、农场;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训练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活动,开展教育革命。

据称,这种新体制有以下基本要求: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

该文还就这一新体制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提出:“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厂、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但是“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与清华大学经验几乎同时,其他一些大学也纷纷拿出了自己教学体制改革的计划或经验。

当时,各类学校提出的教学体制改革方案数不胜数,但就其基本点来看,都大同小异。关于学制问题,各学校在“学制要缩短”的总方向下,就提出了不少设想。如河北大学提出理科3年,文科2年(外语系3年)。又如1971年江西省委在讨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决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制为2年,井冈山大学2年,医科大学3年,理工科大学2—3年,药科学院2年,冶金学院2—3年。课程时间安排,根据清华大学等校的经验,各校普遍地确定授课时间的比例为:政治、劳动、军体课占授课时间的40%,业务课占60%。

中小学教育革命开展得比较早,但教学体制的改革却因缺少权威的典型而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九大”以后,一些中小学的教育革命经验陆续见报,使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逐渐有所遵循。其中,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农村中小学体制改革的模式。这个《大纲》提出,农村中小学的设置,应以“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为原则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由大队单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农村中小学实行9年一贯制,学年分段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县、社可办一些社来社去的农业技术学校,普及农技知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打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入学年龄的限制,废除旧的考试、留级制度”,允许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跳级;农村

中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生,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烈军属子女入学;为了便于国家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大体以春季作为学年的开始;农村中小学生在毕业后,主要是面向农村,等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高度评价了这个《大纲》,指出“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支持、拥护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梨树县的经验,不仅成为农村中小学改革的权威典型,也成为城市中小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关于中小学的学制,当时各地的做法也很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往往存在几种做法。1970年初,兰州市中小学试行的新学制的类型有:五年一贯制(小学5年毕业),七年一贯制(小学和初中合并,毕业后达到初中程度),九年一贯制(小学、初中、高中合并,毕业后达到高中程度)。中学实行四年一贯制(初高中合并)或二二分段制(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兰州市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认为,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城市中小学还是分开办好。天津市革委会的看法是,目前天津市中小学学制为九年一贯制(五·四分段),为了使学生毕业后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拟将全市中小学学制改为十年制。其中,市区中小学为五·五分段,郊区中小学为五·三·二分段(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北京市23中提出,中小学实行四·四制,即6周岁上学,小学4年,中学4年,到14周岁中学毕业后,用2年时间或去农村种田,或去工厂做工,或去连队当兵。2年后再由国家统一安置,或参加工农业生产,或参军,或上大学。

从1969年下半年起,特别是在清华大学的经验发表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办起了几所校办工厂。这些工厂具有一定规模,有一些比较像样的厂房和设备,有一些工人技术骨干,生产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大学的农场原是安排下放教师和干部的,现在又被发展成为学

校的学农基地。中小学所办工厂、农场规模小，数量大。北京市 271 所城区中学已有 253 所办起了工厂或小作坊，生产机械、电子、化工、印刷、木工等方面的产品 500 多种。1970 年产值达 800 多万元。

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的过程中，转变学生思想、改造世界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下乡下厂中，首先强调‘专业对口’还是首先强调‘思想对口’，这实质上是教育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同志思想上的反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只有首先解决了‘思想对口’的问题，才能说得上真正的‘专业对口’。”^①

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校办工厂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锤炼忠于毛主席红心的熔炉。”^②

除了放在首位的政治任务外，校办工厂还必须密切结合学校的教学任务，特别是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一些学校把这些课程搬到工厂去进行教学，由工人、教师、学生共同备课，进行现场教学，“既要加深学生对工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又要提高学生对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使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③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为学校教学开辟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途径。除此之外，校办工厂、农场还被赋予这样一重使命，即根据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进行少量生产，力争在几年内做到经费自给和粮食部分自给，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

这场关于教学体制革命的讨论和试验，在 1971 年《全国教育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29 日。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70 年 8 月 19 日。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70 年 7 月 26 日。

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进一步的发挥。纪要指出：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校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业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

这种教学新体制自确立后，中间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这时它已被打了很多折扣。从总体上看，这一体制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基本点都是“左”的或极左的，它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鼓吹极左思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以学校为阵地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攻击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歪曲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用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它篡改、歪曲了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把直接经验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决定作用歪曲为人们必须事事直接经验，从而否认书本知识和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用“干啥学啥”和“以干代学”取消了学校的基础教育，等等。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中也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就已采用并取得成效的方法，如开门办学、厂校挂钩、下乡下厂等等。但江青一伙却把它们当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新发明，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旗号下，把它们发展到否定课堂教学、否定“以学为主”的荒谬地步。他们歪曲了毛泽东有关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思想，把大学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实际上取消了普通高等教育。

很快，这种体制内在的脱离实际、压制知识分子、违背教育与生产规律的问题便暴露出来，受到广大师生越来越明显的抵制。自

1972年起,各种各样的学校普遍开始强调以课堂学习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主。那些不顾客观条件、违背教育规律轻视理论学习、简单化、绝对化的开门办学的作法实际上已被程度不同地打了许多折扣,有的也只是徒具形式。许多学校和教师提出,学生的升留级和毕业,在政治上、文化上要有个标准,不能一刀切,不分好坏全部升级,全部毕业,这样做不符合学生目前的客观实际。他们认为,在学生的自觉性还不是那么高,学习目的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还应保留升留级制度和对学生的一定考试制度。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会议还指出,理科的基础课一般宜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文科要使学员在实践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贯彻“双百方针”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等等。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部分地否定和纠正了教学改革以来的“左”的或极左的错误^①。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and 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认真地考虑了周恩来的指示。7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信,汇报了自己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此,周总理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等人,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9—1982)》443页。

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此后，周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针对教育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他还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提高”；“大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①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周培源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

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间，教育界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又受到江青等人的猛烈攻击，被诬为“右倾”、“复辟”、“修正主义回潮”，一些极左的做法再次抬头。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44页。

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① 自此，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该报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一个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贯的基本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基本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指示就是他对自已有关招生制度改革思想全面、系统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歪曲，这段指示的精髓被忽视了，而其中的一些个别论断则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歪曲之后广为宣传、普遍贯彻。

《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学生入大专院校，等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 and 毛泽东的批示——已经被形式化地处理过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制度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19页。

批准,招收本厂工人 52 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 29 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 2 年(后延长 10 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广东省一些大专院校自 1969 年起,举办了各种试点班 24 个,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 1000 多名,“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其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大多如此。农村中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1968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小学的招生工作,在 1968 年以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 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的办法维持,要么就是处于停滞状态。自 1970 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这在当时被称作“路线斗争觉悟”或“阶级觉悟”,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种状况在 1971 年以后有所改变。当时,一对十分突出、荒谬的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小学校的入学率: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的倾向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入学、求学的热情,这在中小学中比较突出,直接导致了中小学入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育普及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普及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它同时存在着粗糙、质量低下、形式主义等各种问题,这一因素又导致了入学率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方式、层次及其结果各不相同,但后者起码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

量的明显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约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

不难看出，所谓招生制度的改革，所谓新的招生制度，其基本点主要有二：一是停止了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代之以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领导审批”。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个“革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措施也确实接触到了以往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以往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着“分数定终身”之类的弊病，但这能成为一概废除考试制度的理由吗？当人们因高考制度中一些现在还难以避免的缺陷而把这种制度也冠之以“资产阶级”的时候，他们原有的那一粟真理也就被掩埋在谬误的沙漠之中了。当人们废除了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①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年5月统计，北京清华、北大、北医、北航等七所大学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党员46.2%，团员38.1%，非党团员占15.7%。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七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的比例更多一些。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还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

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相互之间的悬殊立即给教学工作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33—434页。

带来了困难。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高中水平的“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吃不消”；老师教浅了，文化程度高的听了不满足，教深了，文化程度低的听不懂。为此，一般学校都采取了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等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亵渎，知识分子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至一度普遍被戏称为“臭老九”。但这并未真实反映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遑论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矛盾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前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琐屑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由各种各样的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升学愿望，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广泛、影响深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事物”——“走后门”。

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严重的问题。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反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如今后再有违反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将学生退回。《通知》下发后，并没有对招生工作中的“走后门”现象起到多少遏制作用。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福建省李庆霖的复信中还曾提到“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对“走后门”问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

自1972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多方面工作中，针对招生工作中产生的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对一些地区和学校学生的文化状况开始进行一些必要的考核或“调查”。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意见》要求“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同年5月和6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体育学院运动系和北京外语学院可招收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还曾指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以上各项规定指示实际上突破了1970年以来高校招生中取消或轻视文化考查以及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高校学生的规定。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新招生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旧”招生制度的部分恢复，实际也是对新招生制度的部分否定。

据此，当年许多省市在高校招生中加大了文化考核的分量。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入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也从制度上对当时屡禁

不止的“走后门”风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把希望入学的青年的注意力部分地从“找后门”转到对学业的关注上，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敏感地感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他将原信作了删改，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8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加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红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在同一时间里，张春桥、迟群等人把文化考查说成是“复辟”、“反攻倒算”。江青也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遵照张春桥的旨意，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继张铁生的“白卷”和批判文化考核之后，又掀起了以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对学生的

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学校择优选拔、培养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

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等掀起了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入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再次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抵制。许多学校又恢复或部分恢复了正常的文化考核制度,校园里又出现了文化学习的气氛和较好的学习秩序。不久,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但是,这一次“四人帮”横行的时间更短。1976年4月,正当“四人帮”陶醉于“批邓”的“胜利”中时,伟大的“四·五”运动爆发了。而此后仅半年,“四人帮”就彻底覆亡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路。

也谈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的时间

陈 广 相

《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刊载的《关于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时间考》(以下简称《合并考》)一文,认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的时间应在1940年11月17日。笔者经过分析有关历史资料认为,这一结论似乎难以成立。为求弄清这一重要史实,笔者也想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供参考。

一、合并于1940年11月17日的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从中共中央对此的决策情况看,东南局与中原局的合并并非一经提出便立刻实施,而是有一个酝酿、准备过程的,其间经历了几次反复,才正式合并华中局。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虽有“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一语,但这仅仅是处于拟议阶段,并不是最后决定。因为,就在该电发出不久,12月7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东南局:同意将东南局移苏南,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分局的建议,并称谁去苏南东南局和闽浙边东南分局,由东南局决定后电告中央。根据中央指示,曾山率东南局机关部分人员于12月中旬由皖南移往苏南(笔者注:《合并考》提出的“曾山当时为什么没有去苏南”这一疑问并不存在)。由此不难看出,直到12月间,中央对于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之事仍未定论,东南局既未撤销,也没有与中原局合并。关于这一点,还可从以下文电得到佐证:同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说:“(五)关于小姚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

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中央11月17日电曾说合并后的“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但此电却有让饶漱石前往苏南与曾山会合,共同负责东南局“指导东南各省”的打算。就在中央对东南局是否与中原局合并,如何合并以及何时合并等问题同有关方面频频商议之时,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东南局主要领导成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合并之事也就耽搁下来。尽管1941年1月9日中原局在致叶挺、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有中央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与军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等语,但该电是在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遭受破坏的特殊情况下所发的,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仍有设立东南局的考虑。中央书记处鉴于敌占区和东南国民党区的工作与根据地工作性质不同,中原局难以照顾东南地区工作,遂于2月20日致电中原局,告之中央内定在上海设东南局,管理敌占区及东南国民党区的工作,以饶漱石为书记。3月8日,中央书记处在致刘晓等人的电报中,又重申了在上海成立东南局的决定。

直至3月20日,中央书记处经过重新考虑之后,才最终决定不再设东南局,东南国民党区域秘密党的工作由中原局管辖,原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曾山去苏北加入中原局,饶漱石为副书记,曾山为委员,并指示刘少奇拟定中原局委员新名单报中央通过。3月27日,中央书记处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原局委员新名单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成新的中原局。4月下旬,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和委员曾山相继抵达中原局。4月27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东南局与中原局正式合并后的华中局第一次会议。由此可见,东南局与中原局的合并时间不可能在1940年11月17日。

其次,从两局合并的人员组成看。衡量中央局这样一个领导机构是否建立,不能只看名称的出现,更要考虑是否有人员组成,其

成员是否得到中央批准,并且是否具体实施合并工作。中央1940年11月17日并未提出合并后的中央局由哪些人员组成,只是说“华中局名单可由中原局与东南局共同拟定,由中央审查批准。”由于中央尚未最后确定两局是否合并,故中原局和东南局均没有提出合并名单。相反,东南局倒是几次提出东南局和闽浙边东南分局的组成人选,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关于华中局的组成人员,直到1941年3月下旬才由刘少奇提出并经中央审定。而在此之前,拟议中的由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的华中局连组成人员都未提出,更没有经中央审查批准,故不可能在1940年11月17日成立。

《合并考》认为,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华中局组成人员名单,但1940年11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对东南局领导成员项英、饶漱石、曾山的去向都作了安排,故东南局实际上已与中原局合并,中原局就等于华中局,华中局其实就是中原局。此说不确。(1)如果11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拟让项英到延安,让饶、曾二人分别到闽浙赣和苏南就算是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那为什么中央11月17日电仍要求东南局和中原局共同拟定华中局成员名单上报审查批准呢?可见,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对项、饶、曾这一安排的设想就等于两个中央局的合并。(2)既然是合并,就应当是两个中央局都有人参加,在东南局无人加入的情况下(已在苏北的原东南局委员陈毅在提出合并之前就已加入中原局,不在此例),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合并”二字,只能说撤销东南局,中原局改为华中局。

《合并考》还认为,当时没有提出华中局成员名单,是由于东南局主要领导人对两局合并持有保留态度之故。这也不确。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中局的动议,正是东南局于1940年11月首先提出来的,中央书记处11月17日电就是对此的批复,这里看不出东南局主要领导人有什么保留态度。即使有保留态度,中央也不会听之任之,中原局也没有理由跟着不提名单,更不会不声不响地单独组建华中局,甚至连“由中央审查批准”这一程序也省去。实际上,当时东南局和中原局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出组成华中局的名单,是由

于前面已经提及的中央尚未最后确定是否合并之故。

再次，中央对一份电报的批注不能证明两局合并于1940年11月17日。《合并考》认为，1941年5月19日中央在刘少奇的一份请示电上批注的“上述问题早已电复，现将该电再拍发一次”，其中的“早已电复”就是指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那份电报，并以此作为1940年11月17日合并说的重要证据。事实并非如此。5月19日中央的这个批注所说的“早已电复”，实际上是指对5月1日刘少奇一份请示电的复电，而非他指。证实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分析对照一下“早已电复”的内容就可一目了然。由于批注中有“现将该电再拍发一次”字样，故可以确实“早已电复”的那份电报，就是5月20日“再拍发一次”的中央致华中局及军分会电，《合并考》也认为重新拍发的就是该电。电报全文如下：“（一）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二）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三）中原局改为华中局。”显而易见，该电不仅从文字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与1940年11月17日电是完全不同的两份电报，而且从该电说的以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来看，也完全不符合1940年11月时的背景，那时皖南事变尚未发生，项英、袁国平还未牺牲，中央不可能提出由刘少奇接替项英的职务；而邓子恢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在袁国平牺牲后的1941年1月20日，在此之前，中央也不会提出让邓子恢接替袁国平的职务，更无可能让饶漱石代理邓子恢的政治部主任之职。如若真有此电，那么这一段的历史恐怕就要重新研究了。其实，这一电报是中央书记处对1941年5月1日陈毅、刘少奇、曾山、饶漱石致中央电的答复。陈、刘等人在5月1日电中，向中共中央报告了4月下旬召开的华中局会议所作出的几项决定：将中原局改称华中局、新组成的华中局的组织分工、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人选请中央决定、以及提议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显然，中央书记处5月20日电所说的刘少奇任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及中原局改称为华

中局,就是对陈、刘、曾、饶5月1日电的答复。中央的批注中之所以说“早已电复”,是因为中央收到陈、刘、曾、饶5月1日电后,随即复电作了答复,但刘少奇等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收到复电,于是刘少奇于5月19日再次致电中央请求复示,故中央有此批注。很明显,由于依据不准确,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成立。

《合并考》一文还认为,当中央书记处1940年11月17日电提出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之后,中共中央的指示文电中已不再提及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也未曾发现以原东南局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文电,所以这也是证明11月17日成立的依据。其实不然。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尚未发现的文电是否有存在的可能,只说仅笔者所见到的就有两份:一份是12月7日中央关于同意东南局移苏南等问题致东南局电,另一份是12月18日中央关于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等事项致南方局、东南局电。这两份电报都是在11月17日电之后发出的,故《合并考》的这一论证也站不住脚。

二、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的时间, 是在1941年4月27日

第一,原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曾山是于4月下旬陆续到达中原局,与刘少奇、陈毅一起开始进行合并的具体工作的。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共中央于1941年3月20日才最终决定不再设东南局,原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原局(即后来改称的华中局),并明确提出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和曾山加入中原局,饶为副书记,曾为委员。3月23日,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了一个13人的新中原局委员名单。3月27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新的中原局由原中原局的刘少奇、陈毅,原东南局的饶漱石、曾山四人组成。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分析,那么3月27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应当作为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的时间,然而,凡事又应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是说,中原局与东南局的合并,不只是名称的合并,而

是大江南北两个中央局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工作任务等多方面的合并,这就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说合并立即就能合并,说成立立即就能成立。在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曾山加入中原局,以及3月27日中央书记处明确通知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成新的中央局后,四名成员中的饶、曾二人即动身由上海前往中原局驻地苏北盐城。但由于敌后交通条件所限等原因,他们不可能很快到达目的地(他们到达盐城时已经是4月下旬了);而已在苏北的陈毅这段时间也忙于到前线部队指挥作战、部署防务(陈毅在3月25日至3月29日、4月2日至4月13日、4月17日至23日之间均在外地)。因此,在饶漱石、曾山到达中原局之前,由于四名成员各处一方,不可能立即着手就两局的合并及新的中央局的工作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当然也就不可以说此时两局已经合并,新的中央局已经成立。只有当4月23日至4月26日饶漱石、曾山由上海抵达盐城,陈毅也由前线返回之后,新的中央局四位成员才第一次会合到一起,才有可能实现中共中央的决定,即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新的中央局。就在4月26日新的中央局四位成员全部会合之后,第二天(4月27日)即召开了实现合并的“华中局第一次会议”。

第二,4月27日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会议”是研究讨论、具体实施两个中央局合并的“第一次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会议首先由刘少奇传达党中央关于合并后的中原局(在会上已经改称华中局)所辖地区、人员组成的决定,以及他本人对华中局组织分工、机构设置等问题的考虑。接着,会议分别就新四军政治部问题、华中局问题、新四军军分会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刘少奇说,“关于华中局所辖地区,中央最近已决定(即中央书记处4月8日电——笔者注)将陇海路以北划归北方局,陇海路以南归华中局。现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故东南局所辖地区现亦归华中局管。”关于“华中局分工问题,就只这几个人,一切工作只好由这几个人来分担。目前宣传部最重要,工作亦多,应首先成立宣传

部与组织部,其余以后再建立。”在这里,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1)刘少奇讲到了“现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2)合并后的华中局的分工问题、组织机构设置问题等,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决定。再看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曾山同志任组织部长,饶漱石同志兼宣传部长,彭康同志为宣传部副部长,钱俊瑞为文化事业委员会书记,文委归宣传部领导。组织部将来要管民运工作和政府工作,今天首先要管干部。……其次,华中局将来要成立社会部……”,“华中局正式建立后,关于交通联络问题、招待问题、经费问题、日常问题,需要一个秘书处,温仰春同志或则可以调回来作秘书长,但温仰春已准备要他管党校。此事暂缓决定”。关于“名称问题,决定还是叫华中局。”^①从以上引述的有关会议讨论的内容、作出的决定,不难看出东南局与中原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合并的。

第三,从1941年5月1日陈毅、刘少奇、曾山、饶漱石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看,也可证实是4月27日合并的。该电开头就说:“小姚、曾山已来,我们已开会议,决定如下:“一,中原局改华中局……”,“二,华中局分工,少奇为书记、小姚为副书记……”,这些内容与上述华中局第一次会议记录的内容相一致,可知这显然是指4月27日召开的会议;据此又可以确定,东南局与中原局的合并及华中局的组成,是发生在“小姚、曾山已来,我们已开会议”之时。如若还需佐证的话,再看该电下文:“三,军分会同时成立”,这句“同时成立”,显然是指与新的中原局(即华中局)同时成立。

综上所述,1940年11月17日中央虽有合并之说,但尚未最后定论;1941年3月20日正式确定合并,3月27日决定合并人员名单之后,由于其成员各处一方没有立即具体实施;直至4月27日四位成员会齐之后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会议,才是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并开始工作的标志。

^① 据华中局第一次会议记录,存南京军区档案馆。文中引用的其他中央有关电报,均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限及 该称谓的正确使用

正 平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的 10 余块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又由于它是由赣西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发展而来的，于是就产生了如何划分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限及在史学撰著中如何正确使用“中央苏区”或“中央革命根据地”称谓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均取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客观过程，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则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 1929 年 1 月和 1930 年 3 月为上下时限，阶段的起点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建立新根据地之时；终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构成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区域的赣西南、闽西两根据地的创建形成阶段。

第二阶段以 1930 年 3 月和 1931 年 1 月中旬为上下时限。阶段的起点为赣西南、闽西两根据地的正式形成，终点为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正式成立之时。这一阶段，赣西南和闽西两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发展。在此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革命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划分为六大区域，而以“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① 为实现这一设想以及

① 见《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1931 年 1 月 15 日。

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筹组拟议成立的负直接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领导、指导其它苏区斗争之责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关向应和项英前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部队。其中,项英于1930年底辗转抵达正在胜利组织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作战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其后,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于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宣告成立。随之发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虽然,在此之前的中央若干文电往来中,特别是在有关军事工作的文电中,已经出现过“中央区”的称谓。但事实上,显然只有在苏区中央局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之后,其所驻在地苏区才算是具有了领导全国苏区的“中央苏区”的地位,中央苏区也才算初步形成。只是,由于具体条件所限,赣西南根据地在后来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而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则未能实现联通。

第三阶段以1931年1月中旬和1931年11月下旬为上下时限,阶段的起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终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瑞金成立之时。在这一阶段,红一方面军又相继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使赣西南、闽西两革命根据地于1931年9月联成一片,囊括江西、福建两省18个县(此说据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考证结果,见《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67页)的广大地区,拥有人口达250万。在此基础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赣南的瑞金召开,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于11月27日在瑞金成立。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鉴于以上客观过程以及中共中央赋予中央苏区的具有领导、

指导全国苏区武装斗争的特殊地位,便决定了我们在党史、军史撰述中必须要注意到中央苏区于1931年1月中旬初步形成的历史时限。在这一历史时限之前,凡涉及当时的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时,不宜使用“中央苏区”或“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称谓,也不宜使用“赣西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笼统称谓。在这方面,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该书以1931年9月为时限分野,有区别地使用了“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①两个不同的称谓。这一范例启示我们严谨地使用概念和事物称谓,当是科学的学术著作最基本的基础。

^① 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99、105页。

《中共党史资料》41—50 辑

目录索引^①

文 献

-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罗荣桓(41. 1)
- 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
的党而斗争 叶剑英(42. 1)
- 张闻天文电三篇 (43. 1)
-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毛泽东(46. 1)
- 毛泽东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
封耀松、汪东兴的信 (46. 8)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47. 1)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问题的指示 (47. 5)
- 中财委关于全国进出口会议的报告 (47. 6)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口头报告 毛泽东(48. 1)
-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
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48. 55)
-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48. 61)

① 索引分类文章按发表先后顺序排列；标题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数字代表辑数，圆点后数字代表页数。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刘少奇(50.1)

回 忆 录

终生难忘的怀念 莫文骅(41.6)

走出祁连山..... 赵正洪(41.39)

抗战时期在皖南..... 李一氓(41.60)

北线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41.111)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郭化若(41.130)

党中央的召唤..... 傅 钟(42.11)

中苏文化协会始末..... 张 震(42.26)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熊向晖(42.56)

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赛福鼎·艾则孜(43.6)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傅 钟(44.1)

回忆鲁迅..... 楚图南(44.37)

回忆延安南昌公司 杨 琦(45.1)

隐蔽战线上的一场胜利斗争..... 杨斯德(45.13)

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张蕴钰(45.39)

毛主席关怀身边工作人员的成长 汪东兴(46.9)

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 傅 钟(46.16)

在晋察冀的日子里..... 胡开明(46.63)

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 曹 诚(47.34)

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段伯宇(47.48)

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回忆..... 楚图南(47.77)

缅怀毛泽东同志对湖北人民的关怀..... 曾思玉(48.65)

毛主席指导我们建设江苏..... 江渭清(48.78)

回顾七大对我的深刻教育..... 戴镜元(48.89)

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 张玉美(48.99)

我的革命历程 李 强(49.1)

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 高登榜(49.30)

-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汪东兴(49.56)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历史回顾…… 何启君(50.12)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李 静(50.41)

人物介绍·传略·年谱

- 1973年周恩来回延安…… 刘 静(41.139)
 陈延年同志二三事…… 徐彬如(41.151)
 刘长胜传略…… 江柯林(41.157)
 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 杨万青(42.215)
 毛主席谈方志敏…… 汪东兴(43.24)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 穆 欣(43.29)
 博古传略…… 陈 夕(43.62)
 叶剑英的读书生活…… 张廷栋(44.42)
 记林月琴…… 黄 瑶(44.62)
 彭德怀在三线…… 《彭德怀传》传记组(45.53)
 陈树湘传略…… 朱光梅(45.64)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 宋川 何善(46.89)
 周恩来与人民信访…… 刘春秀(46.109)
 叶剑英的革命诗篇创作…… 张廷栋(47.96)
 延安整风前后的张闻天…… 程中原(47.114)
 叶剑英与毛泽东的交往…… 范 硕(48.112)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余湛邦(48.147)
 李锡九传略…… 刘金田 李月兰(49.83)
 “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 陈志凌(49.102)
 人民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常乾坤和王弼…… 韩明阳(50.69)

专 题 资 料

-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五年斗争概述…… 邓礼峰(41.188)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略工作…… 郑 谦(41.204)

1935 年到 1937 年初的国共关系	李海文	汪 新	(42. 97)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刘凤梅	(42. 147)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策动与夭折		张培林	(42. 176)
天津郊区的土改运动及对全国的影响		徐 行	(42. 187)
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史实述略		林谷良	(42. 198)
一、二战时期的河北农民运动		俞 悦	(43. 99)
赤石暴动始末		林 强	(43. 116)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		夏振铎	(43. 125)
张闻天在东北的知识分子工作		施松寒	(43. 154)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商谈对华 经济援助问题纪事		陈志凌	(43. 193)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	李福泽	李元正	(43. 193)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的始末		陈 虹	(43. 223)
关于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战略思想的历史考察		盖 军	(44. 100)
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邓礼峰	(44. 139)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基本法的诞生		魏 刚	(44. 169)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第一次 国共合作问题的分歧		王德京	(45. 8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 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		杜 松	(45. 108)
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完成		李孝民	(45. 134)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 历史进程	寇清平	王晓伟	李永忠 (45. 186)
人民海关的创建		董志凯	(46. 131)
“大树特树”的由来		陈 虹	(46. 131)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任 涛	(46. 159)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魏新生	(46. 187)
国际友人在延安	袁武振	梁月兰	(46. 210)

新中国外贸方针的制定	之 恺(47.9)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	
文化运动	许翰如 仲秋元 梁泽楚(47.148)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组建新四军中的	
特殊历史作用	贺 琦 洪建军(47.188)
争取昆明起义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47.193)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对	
毛泽东纠“左”的历史考察	刘武生(48.155)
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伟大贡献	顾龙生(48.195)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农业	
合作化思想之比较	孙业礼(48.219)
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毕剑横(48.240)
广东共产党人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过程中	
的历史贡献	周兴梁(49.114)
《甲申三百年祭》的首次发表与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	刘昌亮(49.134)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郑雅茹 柳建辉(49.141)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	
抓革命、促生产	安建设(49.178)
抗战初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	杨德修(50.87)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	
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李东朗(50.105)
毛泽东与信访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信访局(50.116)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	宋金寿(50.132)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几个问题	郑 谦(50.158)

会 议 介 绍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	王秀鑫(43.240)
----------------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 …… 王秀鑫(44. 19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 王秀鑫(46. 228)
1958年北戴河会议 …… 韩 钢(47. 206)

史 实 考 订

关于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行军

- 路线的考察 ……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肃北县委党史办公室(42. 259)

关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

- 成文时间的考证 …… 谢忠厚(45. 239)

关于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扩大为

- 华中局时间考 …… 谢 辉(46. 225)

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部分史实

- 的订正 …… 郭述申 刘震 刘华清 陈先瑞(47. 240)

- 也谈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的时间 …… 陈广相(50. 182)

译 文 选 登

- 去延安 ……〔日〕野坂参三 韩凤琴译(41. 234)

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

- 上海地下党 ……〔日〕田中仁著 张晓峰译(45. 206)

小 资 料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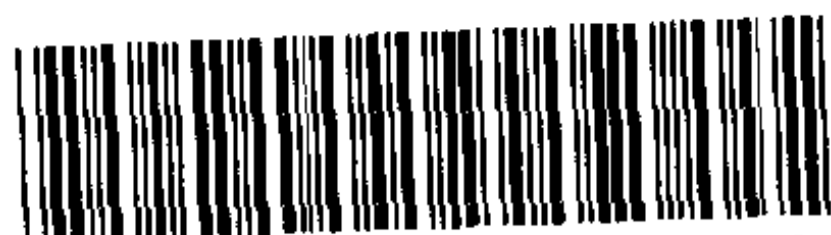
- 《中国工人通信社》 …… 程慎元(41. 253)

- 中央苏区首次“八一”纪念活动 …… 方世藻(42. 269)

-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失败 …… 张光宇(44. 248)

- 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抵达北平的第一站 …… 柳林溪(49. 217)

- “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限及该称谓的正确使用 …… 正 平(50. 189)



国防大学 2 062 2823 2

史料研究

红军长征史料研究概述 曾景忠(44.212)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成员

状况的基本分析 王健英(49.194)

民国史·现代史

黄埔军校沿革述略 刘志青(45.224)

我所了解的张冲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见 西门宗华(49.214)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张庆孚《我的革命生涯》一文的补正 钱听涛(42.275)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辑

作者 =

页数 = 1 9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